民國叢書

第五編
·17·
社會科學總論類

社會主義思想史
陶大鏞著

社會主義討論集
新青年社編輯部編輯

上海書店

社會主義思想史

陶大鏞著

新中國青年文庫

社會主義思想史

著者　陶大鏞

發行者　生活·讀書·新知聯合發行所

基本定價　六元七角　外埠酌加郵運費

出版期　一九四九年八月滬初版

印刷者　中國科學公司　上海中正中路五三七號

(90)[C35]S.00001-10000(P.232)

前記

社會主義在中國，已不算是一個陌生的名辭了。關於社會主義的著述，眞可謂汗牛充棟，有人說，社會主義的派系，有五十七種；也有人說，社會主義的定義，不下百餘種。我們聽到過五花八門的名稱，有所謂烏托邦主義、改良主義、工團主義、共產主義、費邊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督教社會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無政府共產主義、講壇派社會主義……，又有什麼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考茨基主義、托洛斯基主義、韋柏主義、巴古寧主義、柏斯泰因主義、奧文主義、傅立葉主義、普魯東主義、聖·西門主義……；有人告訴我們：甲主義就是乙主義；又有人說，A主義並不是B主義，它使每一個初讀社會主義的人，往往如墮五里霧中。因而，澄清中國社會思想界的錯覺與謬說，實爲一件非常急迫的工作。

抱着這樣的動機，我動筆寫了這一本書。然而，由於篇幅的限制，我不能把每一種社會

主義思想，統統介紹出來。在這本書裏，我比較詳盡地介紹了社會主義思潮的三大派系——空想的社會主義或烏托邦主義，科學的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修正的社會主義或改良主義，並追溯它們的思想淵源（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特另立一章），我們就不難探索一切其他支派的發端與歸趨了。

但，「思想是時代的反映」，每一種社會主義思想，都有着它的特殊的時代背景。爲什麼烏托邦主義出現於不同的時代？爲什麼馬克思主義孕育於革命高漲的時代？爲什麼改良主義盛行於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以後？爲什麼帝國主義時代又產生了列寧主義？祇有認清了它們的時代背景，我們才能尋出各種社會主義思想的來龍與去脈。所以，本書雖分別介紹了好些哲學家、科學家與革命家的社會主義思想，但我並不是把這種思想孤立地看成這些人物的「天才創造」，我主要是以他們的思想，代表他們那個時代的。也就是說，他們的思想，產生於特定的時代，因而，他們的思想，多少可以視爲這個特定時代的思想的總匯。我這種觀點，並非根本否定了社會思想家的「創見」，我同樣承認他們是代表着各種不同的「創見」的；但我所特別强調的，就是：他們的「創見」，絕非完全由於「天才」，如果他們不生長

在他們那個時代，他們就不可能產生這種「創見」了。所以，「思想是時代的反映」，可說是本書的基本觀點。

關於本書的撰寫過程，有幾句話要說一說。首先，我手邊沒有一本有關於社會主義的中文譯本，全書引用的各種著作，多係根據原著翻譯過來，所以，在個別字句上，無法與國內譯本完全一致。這是不得已的。其次，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我必須在二個月內，把全書趕寫出來，如果沒有梆椿幫我校抄全稿，我是不能如期付梓的，謹此向她致謝。再次，編者本來約我寫五、六萬字，我雖曾將原稿刪削，結果仍舊超過了四分之一，這是要向編者致歉的。為了節省篇幅，全書所引原著的章節，均未詳錄，附此聲明。將來有機會，希望設法增補一下。

社會主義真正成為一種科學，到今年剛好是一百年。我願趁這個偉大的年辰，把這本小書，獻給國內的青年朋友，希望它能成為青年思想旅途上的一個指標。如果讀者因而再作進一步的研究，那我就引為無上欣幸了。

陶大鏞一九四八．八．十七於倫敦不列顛博物館

目次

第一章　空想的社會主義——烏托邦主義(Utopianism)

第一節　導言

一部人類的歷史，主要就是一部階級鬭爭史。幾千年來，最大多數被壓迫、被奴役、被侮辱、被統治的人羣，長期掙扎在貧困與饑饉裏。而極少數世襲的、封建的、專制的、獨佔的特權階級，卻過着窮奢極侈的生活。這是社會的不平，這更是社會的罪惡！「不平則鳴」，在每一個時代，就往往有許多大智大勇者，挺身出來，替受苦受難的人羣發出社會改革的正義之聲！

這正義之聲，儘管所要求的，同是自由、平等與公正；儘管所憧憬的，同是一個美麗而理想的將來；但它們所反映的，不能一律的泛稱為近代社會主義思想。有些是空想主義的或改良主義的，有些才真正具有科學性與革命性。它們貌既不合，神亦遠離，絕對不容混為一

義。

誰都知道，『思想是時代的反映』。同樣地，一部社會主義思想史，在本質上，也是反映每個時代的社會背景與社會鬬爭。過去的人類歷史既主要是一部階級鬬爭史，因而，每一個時代的社會主義思想，實可視爲被統治階級對統治階級的一種抗拒。這種抗拒的思想，縱令並不完全屬於社會主義的正派，但它們對於社會革命的啓蒙價値，是不應予以一筆抹殺的。在這一章裏，我們先來介紹空想的社會主義(Utopiar Socialism)或烏托邦主義(Utopianism)。

烏托邦主義取名於『烏托邦』(Utopia)一書，它是英人湯麥斯　謨耳(Sir Thomas More)於一五一六年用拉丁文所寫的。但在謨耳以前與謨耳之後，還流行過形形色色的烏托邦主義。大體上，可歸併爲三種：即宗教的烏托邦主義，哲學的烏托邦主義與政治的烏托邦主義。現在分節敍述如下：

第二節　宗教的烏托邦主義

一　從「王國」到「天國」

在舊約（Old Testament）上，記載有許多預言家的社會理想。牧童阿摩司（Amos，生於紀元前八〇〇年）目擊當時帝室的淫靡，曾高呼過：「我憎恨你們，我卑視你們的晏樂生活。」教士胡西（Hosea，生當紀元前七三五年）也痛憤過以色來（Israel）國王的殘暴與無恥。可是，他們雖憤世疾俗，他們卻不能把古猶太人民，帶出地獄似的王國。雖則，杰列梅（Jeremiah，生於紀元前六五〇年）與伊慈基爾（Ezekill，生當紀元前五九〇年）曾爲人間天堂的誕降而祝禱，然而，他們的一片虔誠，也不能從苦海中超度衆生。這種人道主義的充滿宗致色彩的社會理想，後來由耶穌集其大成。他告訴苦難的人們，在這個地球上，將會出現一個「上帝的王國」（Kingdom of God），這上帝的王國，也就是他所理想的天國。在這個天國裏，一切爲了愛，不會有倚財仗勢，不會有虛僞，不會有自私心，也不會有人壓迫人。生活在這個天國裏的人，會知道自我犧牲，會知道恕有，會知道謙冲，會知道大同主義。從舊約到新約，所謂濟世救民的教旨，無非是些「王國」與「天國」的空想。

二 『上帝城』與『神權政治』

上帝城(City of God)是聖・奧古斯丁(St. Augustine，紀元三五四——四三〇年)嘔了十四年心血的結晶，也是他日夜祈求的理想境界。他生逢亂世，他看到北方異族的進侵，他看到羅馬的淪亡，他看到政治與宗教的紛擾，他憂傷，他焦惱。他發了宏願，要擔起救世的責任。他相信，造物主(Creator)會建起一座『上帝城』，這座城，在天上，也在人間，這座城裏的男男女女，會共守和平，會跪伏在上蒼的面前。他否定自我，他把上帝看成一切希望的泉源。他是中世紀的一盞智慧之燈，他的救世哲學，不過是一種政治宗教學。

然而，這盞智慧之燈，並沒有照亮黑暗時代。聖・奧古斯丁之死，使宗教的烏托邦主義失去了信仰與力量。隔了一千多年，在佛羅倫斯(Florence)又出現了一位聖徒，佛拉・吉羅拉莫・薩伏挪羅拉(Fra Girolamo Savonarola，一四五二——一四九八年)，他生在文藝復興時代，又生在文藝復興的鄉邦。新與舊，正在那裏交戰。藝術、文學以及政治、經濟，都吐出了『變』的芽葉。佛羅倫斯人民也要求變，他們推翻了惡貫滿盈的米狄西(Medici)王

朝，却不曉得建立一個怎樣的國家。薩伏挪羅拉看出了人民的苦悶，就用宗教的藥，來醫治他們政治的空虛。他告訴佛羅倫斯人民，他們需要一個符合上帝意志的憲法，他們需要神權政治（Theocracy）。祇有在一個神權政府下，才會有是非，有正邪，才會有衣有食而無富無貧。雖則，癡迷的善男信女都跟隨着他，把他尊爲人世間的大救主，然而，羅馬的教皇，却指他爲大罪人。最後，他被火焚了，儘管他臨刑時能視死如歸，儘管卡萊爾（T. Carlyle）還稱他爲『英雄牧師』（Hero-Priest），但宗教的烏托邦主義却從此化爲灰燼了！

三 神・不可知論・蒙昧主義

上面這些，就可代表古代與中古的宗教烏托邦思想。不用說，它與近代的社會主義思想，是相距十萬八千里的。他們有理想，他們不滿現狀，他們爲苦難的人羣抱不平，他們希望建造一個合理的社會。然而，他們理想中的社會，是一個『神』的社會，而不是一個『人』的社會。離開了『神』——上帝（God），對他們一切都變成了虛無飄渺。然而，『神』是什麼？

「神」在那裏？他們也無從說起。所以，這種烏托邦主義，是一種不可知論(Agnosticism)，誰也捉不住它，誰也摸不到它！何況，這批空想家並沒有否定王權的存在，並沒有承認私有財產爲罪惡，更沒有肯定人民是一切的主人。他們的悲天憫人，即使值得同情，但他們所倡導的，決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愚昧主義。社會主義是反愚昧的，所以，宗敎的烏托邦主義絕非一種科學的社會主義。

第三節　哲學的烏托邦主義

一　柏拉圖的「共和國」

柏拉圖（Plato，紀元前四二七——三四七年）是希臘的大哲學家，他也生長在一個生與死的決鬥時代。他乳齒尙未脫盡，希臘黃金時代（紀元前四五九——四三一年）的史頁，已經翻了過去；他年剛弱冠（紀元前四〇四年），斯巴達的驕兵，已經踏破了雅典的城頭；他年未而立（紀元前三九九年），先師蘇格拉底(Socrates)又爲眞理而被誣害。他親眼見到昏君的暴政，他發誓要改造人心，改造國家，使人類能够生活在「至高快樂」(Supreme Happi

ness）的社會裏。

這就是他那本『共和國』(The Republic) 著作的理想。他告訴我們，在這個『共和國』裏，不再有暴君，不再有貧富，一切都以公正(Justice)爲依據。他不但主張共產，還主張共妻，他倒不要把婦女驅回廚房去，他認爲女子應該走出家庭，與男子共同擔負建造社會的責任。然而，他理想中的社會，還是有階級的：哲人（他稱爲保護人 Guardian）高高在上，管理政治；武士捍衛國土；工匠專門從事生產。他並沒有想到希臘社會裏的奴隸應該解放，他始終認爲哲人政治是最理想的政治。他所謂的『至高快樂』，並不是無產階級的快樂，而是有閒階級的快樂！他所主張的政治制度，並不是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哲學共產主義者』(Philosophic Communists) 專政。一位希臘哲學的權威歐奈斯脫・巴克(Ernest Barker)畫龍點睛地指出：『在柏拉圖式的制度裏，不會有共同的所有權……祇有在保護人的階層裏，才有共同的消費權。農民階級雖則自耕自食，但要遵守兩個條件：第一，他們要向保護人繳納一定份量的生產品；第二，他們所擁田地面積，要受到嚴格的限制。』所以柏拉圖的『共和國』，充其量，祇能美其名爲『貴族共產主義』(Aristocratic Communism)，它是要建立在奴隸制

度上的！在他的『共和國』裏，我們不但看得到瀟灑飄逸的哲人，並且遍地都是滿身臭汗的奴隸，它代表了最少數的『至高快樂』與最多數的『極大痛苦』—這決不能稱它『共和國』，它不過是失意了的貴族詩人的幻境，它祇是落魄了的貴族哲人聊以解嘲的『理想國』！

二　培根的『新大西島』

從柏拉圖到培根，相隔將近二千年，中間雖曾浮現過一些哲學的烏托邦思想，但它們並沒有了不起的社會影響。像希臘晚期禁慾主義哲學（The Stoic Philosophy）所提到的，也不過是些抽象空洞的自然平等法則而已。直到培根，才算有了比較具體的見解。

培根（Francis Bacon，一五六一——一六二六年）是英國依利莎白（Elizabeth 一五三三——一六〇三年）時代的大科學家兼大哲學家。他曾爲西班牙大艦隊(The Spanish Armada)的潰敗而歡舞，他也曾爲宗教革命的勝利而激奮，他的全神，是灌注在科學，發明，航海探險與工業生產上的。他生長在一個自然科學的勃興時代，他歌頌科學，他研究科學，他認爲科學至上，科學第一。他受過厚祿（曾任英格蘭大公爵 Lord Chancellor of England），也

坐過監獄（曾被控賄賂四萬英鎊而下獄）。到他的晚年（一六二三年），憑着他自已的直覺與感觸，寫了這部寓言體的『新大西島』(New Atlantis，這是一本未完成的著作，一六二七年初版）。

這是一座假想的島，它在南海(South Seas)的中央，島上有位聰明絕頂的國王，憑着他的科學天才，來治理他的王國，王國裏的人民，托科學之福，過着快樂而繁榮的日子。

這是一座美麗的島，島上並沒有實行共產，島上祗有一座大學（他稱爲『沙羅門之屋』Salomons' House），在大學裏，十二位科學家經年累月地在那兒研究，他們正在追尋新的科學眞理，追尋人世間最崇高的眞理。培根認爲：這眞理，就是王國之燈！

所以，這座小島的中心靈魂，就是科學。培根把科學看成了萬能，他認爲祗要有科學發明，人類就永遠會得到快樂。他不像柏拉圖，他不主張『共產』，也不主張『共妻』，却主張『共知』(Communism in Knowledge)！他告訴我們，這座小島雖也與島外通商，但這不是爲了金銀，不是爲了珠寶，不是爲了絲，不是爲了香料，也不是爲了任何商品，而是爲了光，爲了知識。

這就是培根理想中的新世界。他重視科學，他提倡科學，他首先建立了唯物論（詳見第四章），這都是値得頌仰的。但他却忘記了，單靠科學，還不能建造一個理性的社會。在任何進步的社會裏，科學是必要的，却不是唯一的。人類除了知道怎樣生產，還要知道爲什麼生產；除了知道發明，還得知道爲什麼發明。科學可以創造文化，也同樣可以毁滅文化，有了進步的科學而沒有一個進步的社會理想，科學仍舊可能變爲人類文化的敵人。

三　康柏內拉的『太陽城』

在培根著述新大西島的同一年（一六二三年），意大利的一位哲學家湯麥斯・康柏內拉(Tommaso Campanella，一五六八——一六三九年），也正撰寫他的『太陽城』(Civitas Solis）。他是一名飽經憂患的鬥士，他領導過意大利人民反抗西班牙的血腥統治，他受過七次苦刑，他在監獄裏關禁過二十七年。他長年流浪在巴黎，他找不到安身之處，最後他在自已的筆下，找到了一座『太陽城』。他是一個富有革命熱情的空想哲學家。

在這本書上，他告訴我們一個傳奇式的故事：一位熱那亞（Genoa）的艦長，被冲到遠遠

的地方，船靠在一座小島的亂石間，他登了岸，他到處摸索，他發現了一座『太陽城』，築在高山之巔，俯瞰一片平野，建築奐輪輝煌，就像照耀出來的太陽。

這是康柏內拉的理想國家。這個國家裏的人民，過着絕對共產的生活，各取所需，各盡所能，沒有貧，也沒有富，每一個人都沒有自私心，也沒有佔有慾。他們不再是環境的奴僕，而是時代的主人。他們燃燒着愛：愛祖國，愛同胞，愛一切。在這個國家裏，奴隸是沒有的，勞動被看成了神聖，最勤勞者受到最高的社會榮譽。他們都自食其力，互助合作，他們有工作，也有休息，他們每天衹有四小時的正常工作，他們把勞動看成了快樂。他們的家庭生活，也是共同的，實行共產、共妻，把孩子交給了國家。他們痛恨三大惡：暴政、詭辯與僞善。他們提倡教育，普及敎育。在太陽城的七座高牆上，繪着各種各樣的圖書，一個沒有成年的孩童也可從圖案上得到各種知識：歷史，地理，數學與生物學。

然而，這個理想國家的政權，却操在少數賢人貴族的手上。他們要有實學，他們要由人民公選出來，他們靠着專門的知識治理一切國家大事。

所以在康柏內拉的『太陽城』裏，一方面滲混了『共和國』的理想，另方面也同樣地尊

崇知識。儘管這祇能看成夢幻，但他所追求的社會理想，比起柏拉圖與培根來，似乎稍勝一籌。

四　至善論・賢人政治・理想主義

從柏拉圖到培根與康柏內拉，我們知道了一些哲學家的烏托邦思想。他們都博學多才，他們胸中都抱有崇高的理想，他們都像遙見到一個完善無缺的美麗世界。他們的『共和國』、『新大西島』與『太陽城』，都可說是『至高快樂』的天地境界，他們追尋着同一個『善』(Goodness)。但他們的至善論，並沒有建立在一個客觀的眞實上。失去了『眞』，那來的『善』呢？儘管他們追尋着『至善』，他們却永遠得不到『眞善』！（甚至連『僞善』都不可得！）他們所理想的政治，不都是賢人的政治嗎？試問：在貴族寡頭的賢人政治下，那裏會有眞正的全面的平等？他們的哲學烏托邦思想，即使不應稱爲愚昧主義，但最多也祇能稱爲理想主義。它既不是現實主義，更不是社會主義。哲學的烏托邦主義與宗教的烏托邦主義一樣，祇可代表一種啓蒙的社會思想。

第四節　政治的烏托邦主義

一　謨耳的『烏托邦』

湯麥斯．謨耳(Thomas More，一四七八——一五三五年)是十六世紀英國的大政治家，他出使過法國，他曾任英格蘭大公爵與亨利八世(king Henry VIII 一四九一——一五四七年)最親信的御前顧問，他又因反對國王兼爲教主而送上斷頭台。他的一生，交織了理智與情感的矛盾。但他的名著『烏托邦』(Utopia)，却可說是第一部完整的社會主義作品。李桼(S. W. Lilly) 稱他爲『文藝復興時代的一位最完全的人物』。

『烏托邦』一書，出版於一五一六年，它代表了謨耳的政治理想，它描繪出了謨耳理想中的新世界。謨耳寫這本書，倒不是完全憑空臆造的。他幼年讀過柏拉圖的『共和國』，他着了迷，他羨慕過這位先哲的至善論與唯美主義。他的青年時代，又正是一個航海狂的時代，他聽到許多關於新大陸與海島土人的故事，他從當時一位航海家的遊記裏，知道了卡納

雷島(Canary Island)上的共產生活．

『島上的人，過着自然的生活，……他們沒有財產，一切完全公有。他們沒有國王，沒有主權，每個人是他自己的主人，……黃金，珠玉，寶石之類的東西，在我們歐洲當作財寶，他們都毫不在意，他們根本還鄙視這些東西。』

這一個共產理想，從小就印在謨耳的腦門上。他慢慢長大起來，又受到早期理性主義(Rationalism)的陶融。他開始領悟：一個有實學的人，應該替人類找尋一個永恆的理想。他看到英國正從封建社會跨進商業資本社會，正從一個農村經濟蛻變爲都市貨幣經濟，自由企業的種籽，正在撒播開來。他要替蛻變中的英國社會，找一條最理想的道路。他動筆寫了他的『烏托邦』，把他懷抱着的人道主義、唯美主義、理性主義與共產主義的理想，滲合在一起，構成了他的烏托邦主義。

在『烏托邦』上，謨耳借辣非爾．哈司勞代(Raphael Hythloday)爲主人翁，從他的口裏，吐出理想世界的輪廓來。哈司勞代是一位葡萄牙的航海家，博學而精通拉丁文，他拋棄了家庭財產與親友，隨同阿美利哥．范司普西(Amerigo Vespucci)航海到烏托邦島，去尋覓

人間的樂園。這座島，又稱爲無處島(Island of Nowhere)，它有二百英里闊，十五英里長，成一新月形。這上面，共有五十四座城市，城與城之間，有些遠隔二十四英里，有些祇隔一天的路程。島上的首都，在中央，叫阿莫羅脫(Amaurot)。這個城市國家是以農立國的。全島分爲許多村落，每一鄉村，約有男女四十多人。島上的公民，都各盡所能，合作互助，生產按照預定計劃，每人每天工作六小時，休息八小時，其他的時間，可以自由支配，剩餘勞動，用來修築公路。城與鄉之間，每月舉行一次交換，商品的分配絕對平等。雖則沒有私有財產，每個人都過着快樂與不虞匱乏的生活。在這兒，「不必愁自己的生活，不會有妻子的怨咒，更不用擔心兒子的貧苦與女兒的嫁奩。」在這座島上，貨幣失去了存在，金銀被視爲糞土。島上的街衢，秀潔幽靜，兩旁的民屋，華麗眩目。這兒是路不拾遺，夜不閉戶。每隔十年，按戶口分配房屋一次。每一家，都有花園，有菓樹，有葡萄架。每十人至十六人爲一戶，每三十戶爲一保，每保設一公共膳廳，每次進膳，必吹號角。膳廳附設托兒所，有保姆餵養嬰兒。午餐隨便，晚餐另有音樂助興。

這個烏托邦，也有政府。人人參政，每保公選保長一人，每十保，自選縣長一人，由縣長

公推君王（稱 prince）。國王是終身職，倘他專橫，可以罷免。

烏托邦也有法律，冒犯法紀的，罰作苦役。務使每一公民，都能安居樂業。在教育方面，注重個性發展，特別側重自然科學，像算術，幾何之類。農作學也力求普及，賦有天才的孩童，給予特殊敎養，每個人都要養成好學不倦的習慣。

這個烏托邦所追求的，是『最大多數的最大快樂』（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人人都能琢磨眞理，欣賞美術與文藝，享受健康與娛樂。

這就是『烏托邦』一書上的中心內容。今天看來，難免覺得它有些荒誕無稽。其實，謨耳寫這本書，是有着他特殊的時代背景的。在十六世紀初葉，儘管英國的封建社會已經解體，但原始共產體依然遺存於落後的農村裏。謨耳看到當時新興的重商主義，有背乎人道主義，他對專制王朝由愛一變而爲恨，他的烏托邦主義所以帶有濃厚的原始共產主義思想，就是對當時專制主義制度的一個反動。謨耳在『烏托邦』裏所敍述的農村經濟，簡直可說是當時英格蘭農村的縮寫。伊拉司謨司（Erasmus）在他致赫敦（Hutten）的一封信上，說得很對，『他（指謨耳）發表他的烏托邦莫非爲了襯托帝國（指當時英國）所遭遇的不幸，他是特別

着眼於英吉利政府的。』

事實上，在謨耳的心目中，的確是把英格蘭作爲他假想中的烏托邦的。還有兩點證明：第一，他說過從烏托邦島到大陸，中間祇隔一條二十一英里的海峽；第二，在他筆下的阿莫羅脫城，據史圖（John Stow）於『倫敦之測量』（Survey of London）一書上的研究，更判定爲當時的倫敦。

不管謨耳心目中的烏托邦島是不是當時的英格蘭，我們研究了他的『烏托邦』後，總會發現他自我矛盾的地方。就目的而論，謨耳確實抱有共產主義的理想，直到今天，我們還未可厚非；但他所主張的實行共產主義的手段，似乎太近幻想了。他相信共產主義可由一位開明的君王（他稱爲 Prince）來強迫實行。他叫這君王爲烏托普司（Utopus），他認爲除非有一個賢能的君王，否則是進不到烏托邦社會的。

當然，謨耳把烏托邦制度建立在一個君權政治上，也不是偶然的。在謨耳的時代，還沒有政黨組織，還沒有社會主義的革命軍——無產階級，當時的政權，完全操在君王的手裏，在他以爲，如果君王信仰共產主義，祇要舉手投足之勞，就可實現了。他的政治邏輯，在我

們看來，也許覺得幼稚可笑，但謨耳不能跳出他的時代，「存在決定意識」，它的時代也局限了他的思想。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縱令謨耳的烏托邦主義也主張生產手段歸公，廢除私有財產與實行平等的分配制度，但它與現代的科學的社會主義，顯然不可同日而語。後者必須以無產階級專政，工業化與計劃經濟為前提，這些都是謨耳做夢也不會想到的。所以，我們可以稱謨耳的「烏托邦」是第一部偉大的社會主義作品，却不能承認謨耳的烏托邦主義是一種完美無缺的社會主義思想。比起宗教的烏托邦主義與哲學的烏托邦主義來，謨耳的烏托邦主義——亦可稱政治的烏托邦主義——自然更要接近眞理了。

二　唯物論與社會契約說

然而，謨耳時代並不是理性主義的全盛時代，當時所謂的理性，不過是王權意志的集中表現而已。正因為這樣，當他以「我希望烏托邦共和國裏的許多事情見之於我們的政府」為烏托邦的結語，終於帶來了他個人的生命悲劇。

謨耳之後，近代唯物論(Modern Materialism)却在英國勃興起來。馬克思與恩格斯在合著的『神聖家庭』(Die Heilige Familie)上曾這樣寫過：

『唯物論(或唯物主義)是英國的親生子。……英國唯物論的眞正創始人是培根，他把自然哲學看成了唯一眞實的哲學。他認爲物理學是一切感覺經驗的結晶，也就成爲自然哲學的最主要部份。……他認爲一切科學都建立在經驗上。……歸納法，分析法，比較法，觀察法，實驗法，才算是主要的合乎理性的方法。……但在培根的唯物論裏，祗吸收了多方面的胚芽。……到了霍布斯，才把培根的唯物論予以系統化。……霍布斯認爲思想與物質是不可分的。……唯有物質，才能給予我們感覺。……唯有自我的存在才是眞實。……霍布斯雖則系統化了培根的思想，但他並沒有引申培根的基本理論，即感覺世界裏一切人類知識的由來問題。直到洛克，才補充了這個論證。』

在這段話裏，馬、恩兩氏已把一百五十年的人類思想大革命，全盤托了出來。『培根，霍布斯與洛克是十八世紀法國唯物學派之父』(恩格斯語)，如果沒有十八世紀的法國唯物論，近代社會主義思想的形成，怕會經過一度難產。誠如恩格斯所指出：『從理論上看，近

代社會主義的起源，祗是十八世紀法國大哲學家的理論體系的一個更合邏輯的擴延。」在這裏，我們可以尋出從十七世紀英國唯物論到近代（十九世紀）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線索了。

十七世紀時，在歐洲，特別在英國，剛好是商業資本的一個黃金時代，城市經濟蓬勃長成，私人財產的神聖觀念也隨以形成。新興的商業資本家（即當時的資產階級），爲了護衛既得的私人財產，當然要捧出他們的一套民權哲學來，我們可通稱爲『社會契約說』(Social Contract Theory)。

『社會契約說』首創於格勞修斯(Hugo Grotius，一五八三——一六四五年)，再由霍布斯與洛克予以發揚。霍布斯(Thomas Hobbes，一五八八——一六七九年)在他的名著『共和政制』(Leviathan)上曾有不少怪論，他認爲共產主義祗能存在於自然環境(The State of Nature，即指原始社會)中。但人類既有私慾，就不能不爭權奪利，最後，必然導致戰爭。戰爭毀滅了一切，人類重來追求和平。但要和平，不能沒有一個主宰。他覺得到了這個時候，人民定會互相遷就，立約共守，並公推一人爲發號施令的主宰，即使他是一位專制魔王，人民也不願把他驅走。在這個『守約』的社會裏，彼此互不侵犯，私有財產視爲神聖。

儘管霍布斯的唯物論是哲學思想史上的一朵鮮花，然而他的社會契約觀念，却已成爲明日之黃花！他苦口婆心地鼓吹着他的專制政體，但英國查理一世（King Charles 1）還是被英國人民拖上了刑台（一六四九年）！

洛克(John Locke，一六三二——一七〇四年）不僅補充了霍布斯的唯物論，更修正了他的社會契約說。在他的『市民政府』(Civil Government) 一書上，洛克認爲，私有財產並非源於契約，即使在自然環境裏，也同樣存在着私有財產。他首倡了『勞動價值說』(Labour theory of Value)，他覺得一切財產的價值，十九是勞動創造出來的，勞動既與生俱來，那末，在原始社會裏，一定會有勞動，就一定可以創造價值，也必然會有私有財產。所以，他的私有財產說，完全是基於勞動價值說的。

當然，洛克的絕對私有財產說，立論是非常牽强的。因爲，勞動所創造出來的，不一定是私有財產，它同樣可以創造社會價值（即社會財富）。由此可知，洛克的社會契約思想也是偏而不全的。儘管如此，我們對於他的勞動價值說，却不能不承認是偉大的發現。後來由亞丹·斯密(Adam Smith，一七二三——一七九〇年）與李嘉圖（David Ricardo 一七七二

——一八二三年）予以闡揚，至於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經濟學，更是以勞動價值說爲基礎的。所以，十七世紀的唯物論與社會契約說，雖還存在着理論本身的空疏與脫漏，但已開始替近代社會主義思想掃除一些前途的障礙了。

三　墾掘運動與平等主義者

在十七世紀，英國的內戰，蔓延了十年（一六四一——一六五一年）之久。由於政爭不已（國王與巴力門之爭），民怨沸騰。當時以威廉・埃佛拉特(William Everard)與葛拉特・溫司頓萊(Gerrand Winstanley)爲首，領導一種『墾掘運動』(Digger Movement)，主張土地公有。它的歷史影響，不下於中世紀的農民戰爭(The Peasant War，如一三五七年的法國，一三八一年的英國與一五二五年的德國，均會發生農民暴動）。有些社會主義學者(如 P. M. Sweezy)還把英國的內戰時期，看成近代社會主義的發芽期。

墾掘運動者的政治理想，帶有中世紀共產主義(Mediaeval Communism)的色彩。他們所要求的，是理性(Reason)與正義(Righteousness)。他們相信：土地是上帝交給全人類的，

每個人應該是土地的主人，土地應該由全體人民所公有。他們並不主張暴力革命，他們要以身作則，躬自墾掘，把荒田墾爲良田，用和平敎育的方式，使各地農民，相率來歸，自動交出土地，共同從事生產。一六四九年四月一日起，這個土地共產的理想會實驗於英國的聖·喬治山（St. George's Hill，離倫敦不遠）麓。然而，不到一年，這個運動就銷聲匿跡了。

儘管墾掘運動者並不能實現他們的政治烏托邦主義，但他們却留下了許多崇高的平等主義的社會理想。葛拉特·溫司頓萊的『正義新律』（New Law of Righteousness）與『自由律』（Law of Freedom）兩書，是他們所標揭的平等主義的精華。溫司頓萊富有卓見地指出：『就人類歷史發展的全程來看，戰爭與內亂，都導因於社會的分化，社會分化的產生，又由於土地的私有，私有財產不但將社會分裂爲貧富兩大階級，還使富者失去人性，使貧者自暴自棄。所謂政府，不過是用來保護有產階級的既得利益的；所謂宗敎，亦祇是借神權來麻醉貧苦人民的手段而已。』他對歷史進化與階級對立的分析，是與近代社會主義思想非常接近的。

他還再三强調：『人類的尊嚴與平等，必須也祇能建立在土地公有的社會基礎上。』他

說過下面幾句名言：『土地是上帝創造的，它是全人類生計的公庫。』他與他的同情者，不但有理想，還曾以行動來實現過他們的理想。他們稱他們自己是『眞平等主義者』（The True Levellers），他們所唱的『掘歌』（The Digger Song），至今還在民間流傳。然而，他們的和平主義與空想主義，却註定了他們的失敗。舉個例吧：溫司頓萊曾以所著『自由律』一書獻贈英王克倫威爾（Cromwell，一五九九——一六五八年），上面還這樣寫過：『我在你的門前，已插上一支明燭；祗有你願意，你大權在握，你可以頒行公共自由（Common Freedom），然而，我却沒有這樣的權力。』這幾句話，說得何其謙卑？把一切平等主義的理想，寄託在一個專制君王的身上，豈非滑稽？平等主義的幻滅，還不毀於平等主義者自己的幻想嗎？

話要說回來，溫司頓萊的時代，像謨耳時代一樣，還沒有一個壯大的人民力量可以擔起改造社會的責任，他的政治空想，也決定於他的時代背景。不管怎樣，他的社會主義思想，顯然又比謨耳跨前一步。後世的學者，多半忽視了溫司頓萊在社會主義思想史上的供獻，近年來，他的學說，才慢慢被介紹出來。從他的整套社會思想中，我們可以看到從中世紀宗教

的神祕主義演變爲理性的社會主義的發展趨勢。

在黎掘運動前後，英國還出現過不少社會思想家與社會革命家，像哈林頓(James Harrington)，哈脫列勃(Samuel Hartlib)，張柏倫(Peter Chamberlen)，貝勒斯(John Bellers)，普羅克荷(Peter Cornelius Plockhoy)之輩，都別樹一幟。其中，以哈林頓的『大洋共和國』(Oceana，亦可意譯爲『理想國』或『共產國』)與張柏倫的『財產國有化論』(Nationalization of Estate)二書，最負時譽。此外，像貝勒斯的社會革命思想，還受到後世奧文等的景仰。

四　法國大革命與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

到十八世紀，法國變成了空想社會主義的溫床。特別從路易十四(Louis XIV，一六四三——一七一五年)以來，長年的征伐與凡爾賽宮廷生活的豪華，弄得法國民窮財盡。路易十五(Louis XV，一七一五——一七七四年)繼位，社會經濟已瀕崩潰。開明的智識份子，觸目傷心，力倡革新。伏爾泰(F. M. A. de Voltaie，一六九四——一七七八年)鼓吹思想自由，盧梭(Jean Jacques Rousseau，一七一二——一七七八年)又主張推翻專制，回返自

然。即使他倆的認識，都還遠離社會主義的理想；但在當時的法國，他倆的思想，卻像一把火，不但照出了一條啓蒙運動的新路，更燃起了人民的革命熱情。美國獨立運動（一七七六年）的勝利，又給法國人民一個鮮活的榜樣。食不飽、衣不暖的廣大法國勞苦人民，已不能在現狀裏苟活下去了。那時新興的中產階級，爲了發展自由企業，也想從貴族地主階級的手裏，把政權搶奪過來，在「自由，平等，博愛」的大旗之下，他們團結了農民與都市工人，領導了彪炳史冊的法國大革命（一七八九年）。在本質上，法國大革命雖是一次純粹的布爾喬亞革命，但它一方面澈底推翻了封建主義，另方面又淸算了平等主義的最大的思想敵人，這樣，無異替近代社會主義運動與近代社會主義思想拔除了幼苗旁的惡莠！

然而，法國大革命並沒有解決法國的社會改造問題。資產階級是爬上政治舞台了，但人與人間的財產問題，依然沒有變更。法律上的平等，並沒有改善經濟上的不平等。機器生產，帶給城市工人的，祇是失業與更大的貧困。他們對革命開始失望，悲觀主義重復籠罩了法國。許多社會思想家與革命家張大了他們的慧眼，要探索一個新的社會理想，在那個新社會裏，他們希望建立眞正的自由、平等與博愛！這批社會思想家，出身於不同的環境，他們

雖則共同懷抱着大同世界的理想，但他們對於實現大同社會的辦法，却見仁見智，各執一端，在當時，就出現了五花八門的烏托邦社會主義思想。以下各小節，我們分別介紹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的具體主張。

五　莫里萊、巴蒲夫與卡貝脫

莫里萊（Abbé Morelly，生於一七二〇年）與伏爾泰、盧梭同時，他被視爲法國烏托邦社會主義的先驅者。在他的『自然法典』（Code de la Nature 一七五五年版）裏，充滿了偉大的共產主義理想。他認爲人的本性是善的，一切人類的罪惡與嫉妒，完全由於後天環境的不良。他把社會化的唯我主義與開明的自愛感，看成一切高尚社會行動的本源。他又覺得，追求快樂是人的本能，在一個平等社會裏，每個人應該得到最大的快樂。他的人性論，後由傅立葉予以引伸；他的社會環境論，又開啓了奧文的思想之門。

莫里萊對於私有財產制度，抨擊最烈，他認爲私有財產制度是一切社會邪惡與混亂的基礎，他主張廢除私有財產，他堅信廢除私有財產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辦法。他更主張實現

「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理想。正因爲這樣，恩格斯也把他的思想譽爲「眞正的共產主義學說」（見「烏托邦的與科學的社會主義」）。

巴蒲夫（Francis Noel Babeuf，一七六四——一七九七年）的共產主義理論體系，可說完全取之於莫里萊的「自然法典」的。他不僅是一個社會思想家，還是一個實際行動家。他創辦過第一份鼓吹共產主義的報紙（名「人民論壇報」(Tribun du Peuple)，他曾祕密組織過人民武裝（一七九六年，已達一萬七千人），他曾企圖推翻當時的恐怖統治，最後，由於祕密洩露，他被逮捕，並爲革命而犧牲於斷頭台上。

說到巴蒲夫的平等哲學，是始終不朽的。他的「平等宣言」(Manifeste des égavx)上，寫得極其熱烈動人：

「平等！這大自然的第一個恩賜！它是人類的第一個需要，與一切法令結合的基本的紐帶！……今天我們要求平等的聲浪，比過去還要嘹亮！……法國大革命祇是一次更偉大更神聖的革命的先聲！……我們要求更永恆更平等的理想：這就是一切共有。沒有土地的私有權，土地不屬於任何人，地上產生出來的果實是全體的！」

他還給我們指出：「社會的最大目的，在求全體人民的快樂，這快樂必須包含着平等！」他又覺得，一切罪過、壓迫與戰爭的原因，完全由於人類違背了這個自然法則。所以，他所謂的平等，無論在質的方面與量的方面，都是絕對的。

儘管巴蒲夫的平等哲學，激昂慷慨，但他對實現平等的方法，又主張中庸之道。他認爲一步步的國有化，可以達到最後的平等。他主張等大公司與大企業國有化了以後，再把私人財產收歸國有。但他又反對同時沒收私人財產，他祇主張廢除遺產制度，他認爲祇要這樣，約過五十年，一切私人財產，就可歸公了。

在巴蒲夫所理想的社會裏，生產是有計劃的；政府組織有些類似今天的蘇維埃制度；雖也有家庭生活，但孩子從小就由國家撫養，灌輸共產思想與平等主義的教育；生活在這個社會裏，衣、食、住人人一樣，不必有藝術與文學，但必須提倡實用科學。——所以，巴蒲夫的社會理想，也不是怎樣健康的。

巴蒲夫之後，有卡貝脫(Etienne Cabet，一七八八——一八五六年)繼承絕學。卡貝脫出於書香之家，受過古典教育，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富有詩人的想像力。年剛三十，他就

出任考西卡省(Corsica)的檢察長，後因攻擊政府，被免官職。旋又擔任『人民報』(Le Populaire）編輯，復因批評國策，判刑二年。後來，潛居英國；讀到了謨耳的『烏托邦』，也不禁在他自已的腦海裏，浮現出一個理想社會的泡沫。他寫了『伊卡里遊記』(Voyage en Icarie)。這是一本社會羅曼斯，他也從書中主人翁威廉·卡里斯達爾(William Carisdall)的日記裏，描出他所理想的社會來。

——照這本日記上所載，伊卡里是一個工業化的國家，全國分爲一百省，每省再分爲十縣，省會在各省中央，每城的建築，一模一樣，有大街，有公園，有民房。人人都有工作，黎明即起，每晨六點鐘，共進科學化的早餐。夏天七時上工，冬季較遲。一切工廠屬於國家。人民各盡所能，從事生產。工廠由專家管理，專家有最高權力。全國男女，均穿制服，實行一夫一妻制。子女五歲開始上學，男孩十八歲，女孩十七歲學業完成，一律須爲社會服務，到六十五歲，始可退休。這個社會，尊重女性，提倡文學與藝術，無報紙，但有公共集會。卡貝脫還告訴我們，要實現這樣的社會理想，也得經過五十年的努力。

這當然是一個烏托邦，然而，卡貝脫却相信會有實現的可能。他先在美國的塔克薩斯

（Texas）地方親自實驗，後因黃熱病流行，再搬到伊里諾（Illinois）去，僅有一千五百人跟隨着他（他原來計劃五十萬人）。不過幾年光景，這座依里卡烏托邦裏，終於發生內鬨，使它化歸烏有了！

六　聖・西門的『新基督教』

聖・西門（Comte Henri de Saint-Simon，一七六〇——一八二五年）出身貴族，幼有大志。他曾囑咐僕從每晨這樣喚醒他：『起身吧，孔德先生（孔德是他的名字），偉大的工作等着你做！』十九歲時，他在美國，參加了美國獨立戰爭，還榮獲勳章。法國大革命時，他又與革命志士站在一邊。他爲法國革命事業下過獄，他又爲法國大革命的變質痛心過，所以恩格斯稱他爲『法國大革命之子』。

從一八〇三年起，他埋頭著述。他與貧困戰，與病魔鬭。爲了糊口，他曾每天替人繕寫九小時。爲了買稿紙，他曾典質掉身邊僅存的外衣。在他臨死前，他終於完成了三部巨著：『工業制度』（Du Système Industriel）、『工業問答錄』（Catéchisme des Industriels）與『新

基督教』。他臥在病榻上，還諄諄教諭一羣門生（實證主義哲學家孔德 Auguste Comte 亦在）：『你們要記得，你們必須拿出熱情，來完成你們的偉大事業。我的一生，始終抱着這樣的信念，你們要努力，保證全人類都能自由地發揮他們的才能。』。

聖．西門是一個社會階級論者。他認爲社會上對立着的階級，並不是貴族特權階級與小資產階級，而是有閒階級與勞動階級。有閒階級不但包括了貴族特權階級，也包括了不勞而獲的資產階級。他覺得有閒階級已失去了智慧的與政治的領導，勞動階級應該團結起來，建立一個新的社會。他是喊出無產階級心聲的第一個人，所以，布司（A.J. Booth）在所著『聖．西門與聖．西門主義』(Saint-Simon and Saint-Simonism)一書上稱『聖．西門主義是無產階級的第一個表現（The first expression）』。

但聖．西門與巴蒲夫一樣，他反對暴力革命，他主張慢慢通過一種建設性的改造工作，再踏進理想的『合作共和國』去。在這個共和國裏，封建主義與神權制度將被工業與科學所替代。他說，在過去，工業與戰爭是結合起來的，可是到將來，戰爭必須消滅。他又說：從前，信仰是最大的力量；但到將來，知識會來替代信仰。他更認定：工業與知識（科學）必須

結婚，這樣，才能在這個世界上，孕育出和平與合作之子！

聖．西門的最高理想，就交織在『新基督教』(Nouveau Christianisme)裏，它可說是聖．西門主義的聖經。他這樣告訴我們：

『在新基督教之下，一切道德都依據於下面這條原則：人類應該親如弟兄。這雖是原始基督教的教條，現在也值得發揚光大，並予以新的內容，就是，宗教是協助社會改造的，它要使最大多數窮人的生活得到最快的改善。』

聖．西門對於近代社會主義思想，還有兩點極可寶貴的提示。首先，他在『日內瓦通信錄』(Lettres de Genèva，一八〇三年)裏，曾主張『所有的人都應工作』。在一八一六年，他又發現了『政治學祇是一種生產的科學』。從他以後，『經濟是政治的基礎』這一科學概念，開始懷胎了。

此外，聖．西門也主張工業公有，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值』，主張廢除遺產制度，主張維持家庭制度，主張男女在社會上絕對平等。

當然，我們不應過份重視聖．西門的社會主義思想，但他對近代社會主義的貢獻，是絕

對不可磨滅的。

儘管他是一個工業主義與新基督教的空想家，但他對未來的無產階級世界，已遙見一個光明的遠景了。他爲發掘社會主義的眞理而死，他的精神將偕社會主義而長存！

七　傅立葉的『小公社』

傅立葉（Franc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一七七二——一八三七年）與聖·西門同爲法國大革命的產兒，又同爲法國大革命的戰士，然而，他倆的身世、主張與社會影響，都各有千秋。傅立葉出生於布商之家，是在一個市儈氣的環境裏長大起來的。他五歲那年，爲了向顧客坦白說出了布樣的品質，曾受到嚴父的毆打；他十九歲那年，適逢國內饑荒，他正在馬賽的一家米號經商，他老闆爲了壟斷市價，會命他把米一袋袋丟到海裏去！這兩件事，深深地銘入他的心腑，他對這個唯利是圖的市儈社會，從小就痛恨入骨，他立志要洗滌資本主義社會裏的罪惡。

他不像聖·西門，他並不要跳出這個黑暗的社會，去找尋『新基督教』的理想；他要鑽

進這個現實社會裏去，發現一條歷史進化的軌跡。『他無情地揭發了布爾喬亞世界裏的物質的與精神的悲慘。』『他不僅是一個大評論家……並且是一個大諷刺家，甚至可說過去時代的最偉大的諷刺家。』（均見恩格斯：『烏托邦的與科學的社會主義』）

傅立葉的最大貢獻，就是他的社會史觀。他是第一個人，把過去社會的發展過程，分爲四個歷史階段：蒙昧時期、野蠻時期、家長制度時期（即貴族封建社會）與文明時期（即布爾喬亞社會）。他非常敏銳地指出：文明時期的每一種罪惡，都是野蠻時期低級方式的更高或更僞道的表現。他斬釘截鐵地說過：『在文明社會裏，貧困是從富裕本身產生出來的。』他的社會史觀，完全是帶有辯證法的，他承認在每一個歷史階段，有它的繁盛時期，也有它的沒落時期。他還用這一辯證史觀來解釋人類社會的將來。恩格斯說得很對：『康德(Kant)在自然科學方面發現了地球最後毀滅的概念，就正如傅立葉在歷史科學方面發現了人類最後毀滅的概念一樣。』（前揭書）

傅立葉的社會理想，完全匯集在三本著作上：『四種運動與一般命運原理』(La 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一八六八年），『宇宙統一原理』

(La Théorie de L'Unité Universelle，一八二二年）與『工業的與社會的新世界』(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re，一八二九年）。他理想的社會單位，是一個『小公社』(Phalange)。這個『小公社』共分二十四至三十二個組，每組由七至九人組合而成。（小公社最適當的人數爲四百人至二千人）。這個小公社裏的公民，都集居在一所『公社大廈』(Phalanstery)裏，共餐分宿，過着自由、樂羣的生活。每一小公社，由全體公民推出一位社長，處理社內行政。全社公民，都要從事生產，生產所得，分配給勞動、資本與才智。勞動得十二分之五，資本得十二分之四，才智可得十二分之三。所以，傅立葉的社會原則是：『各盡所能，各依勞動、資本與才智取其所值。』他還把勞動分爲三類：必要勞動、使用勞動與快樂勞動。必要勞動的酬勞最高，快樂勞動的酬勞最低。他認爲這個小公社的理想，可以從小規模推行到全世界，到那天，由全世界小公社社長，公推萬能社長，並設世界首都於康斯坦丁堡(Constantinople)。

傅立葉於一八〇八年就把他的『小公社』理想發表出來了，然而，各方的反響，都很冷淡。他很窮，他沒有那樣的財力來實驗他的理想。據說有十二年功夫，他每天中午總等在家

裏，希望有一位百萬富翁，能慷慨地捐出一筆款來。但他並沒有等到，他幾乎失望了。到一八三二年，他的一批朋友（多爲當時的國會議員）湊了一筆錢，讓他在凡爾賽附近置地實驗，但祗過了幾年，他那美麗的希望，又終因公社管理無方而成爲泡影了！

此外，傅立葉又是一個極端的女權運動者，他替婦女喊怨，他把女權解放看成一切社會解放的尺度。他的名句是：「女權的擴張是一切社會進化的基本原理。」

雖則，傅立葉的「凡爾賽之夢」是幻滅了，但對後世的影響，却遠在聖・西門之上。他死以後，傅立葉主義曾從法國傳到了美國（一八四〇年後），還在美國實驗過三十四處（以馬薩諸塞州 Massachusetts 勃洛克農莊 Brook Farm 的實驗最著名於世）。他們雖都沒有實現傅立葉的理想，總算已能引起社會的同情與注意了。

整個說來，傅立葉的社會理想，比聖・西門要更接近科學與理性。他與聖・西門一樣，因爲看到法國大革命的血與恐怖，所以他也反對暴力革命，他主張用感召、吸引與同情。他的失敗，在於他不了解資本主義社會（即他所謂的文明社會）裏的罪惡已經根深蒂固，單靠和平與說服是不能改造這個社會制度的。這刻褒（Thomas Kirkup）對他的批評，頗爲公允：

「我們相信傅立葉制度是完全空想的。……但這個制度可說是他以前的最有天才最苦心孤詣的烏托邦理想。」（『社會主義史』）

八　勃郎的「社會工廠」

勃郎（Louis Blanc 一八一三——一八八二年）的時代，不再是聖·西門與傅立葉的時代了，他眼看拿破侖王朝的崩解，他親見城市工人的慘苦，他又敏感到社會革命的到來。他的壯年，又正當革命巨浪在歐洲激盪，他認清了社會變革的主流，他要替騷擾不安的社會開闢一條新的出路。

他年剛廿六，就創辦了「進步雜誌」(Revue du Progres)，鼓吹了他的社會改革思想，一八四〇年，發表了他的名著「勞工組織」(Organi ation du Travail)。一八四八年，當選為國會議員。富貴淫亂了他的革命理想，從那時起，他時常站在反動陣營的一邊了。他不同情巴黎公社 (The Commune of Paris)，他還攻擊過國際勞工協會(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即第一國際)，他可說是一個典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

儘管如此，他的社會主義思想，顯然又比聖．西門與傅立葉接近現實。他是第一個人，認爲政權的民主化是社會改造的前提；他又是第一個人，認爲祇有勞工階級才能眞正担負起社會革命的責任。所以，他代表了社會主義從烏托邦主義到馬克思主義的過渡思想。

然而，他的社會思想的出發點，與其說是唯物論，不如說是唯心論。他認定人格的發展是人生的至高目標。他又覺得，在這一個競爭制度的社會（即資本主義社會）裏，不可能保證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所有的祇是『全體對全體的戰爭』（Bellum omnivm contra omnes）。他相信，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結果不過是貧乏與悲慘。他主張改造這個社會，按照上帝的意志，使全人類都變成同胞手足，這就是他的唯心論的社會哲學。

但在另一方面，他又發揮了一個偉大的『社會工廠』（The social workshop）的理想。他認爲在一個理想社會裏，必須以社會工廠來替代私人工廠。在這個社會裏，一切生產手段，必須歸於國家。由國家將生產手段借給社會工廠，國家就好比是貧者（即無產階級）的銀行。每座社會工廠，可以自選廠長，全國社會工廠，再結爲一個聯盟，由聯盟創辦保險公司，以補足個別社會工廠的虧損。在個別社會工廠每年的盈餘中，必須撥出一部份來，作爲

這個保險公司的基金。他不主張一下子廢除私人工廠，他覺得社會工廠制度一旦實現，私人工廠必然無法競爭，最後，不是倒閉，就是自動參加，過了相當時期，全國盡是社會工廠。照他看來，用這種方式，不必流血，不必武力革命，就可實現社會主義共和國的理想。他既不像巴湍夫那樣主張絕對平等，也不像聖·西門與傅立葉那樣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值」，他却主張「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他的分配學說，在後期烏托邦社會主義思想家中，算是進步的了。

他像其他的社會空想家一樣，也希望實驗自己的理想。一八四八年，他是當時臨時政府的閣員，他正式提請政府設立國有工廠，受到了反對派（以湯麥司 Emile Thomas 爲首）的全面攻擊。經過他的努力，在巴黎附近，前後雖曾出現過一些國有工廠，終因客觀形勢沒有成熟與資本集團的死命破壞，勃郎始終不能在國有工廠與社會工廠之間，架起一座社會改造的橋樑。

九　普魯東的無政府主義

普魯東（Pierre Joseph Proudhon ，一八〇九——一八六五年）與傅立葉是同鄉（同在Besançon），在他的青年時代，他看到小公社的失敗，他譏嘲傅立葉主義，他反對當時法國的空想社會主義，他憑着個人的愛與恨，個人的直覺，個人的想像力，發揮了他那套古怪的無政府主義思想。

他出身貧賤，從小苦工苦讀。他有文學的才華，他特別喜歡神學，他還懂拉丁文、希臘文與希伯來文。一八四〇年，他發表了一本轟動的作品：『什麼是財產？』(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 ？）他的結論是：『財產是盜刼』（La propriété c'est Le vol）。六年以後，他又發表了『貧困的哲學』(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他批評了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哲學思想，但他並不能建立自己的哲學體系來。

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之火，並沒有燃起他的熱情，他根本反對政府，他認爲推翻了一個再來一個，好比換湯不換藥。他沒有投身到革命隊伍裏去，他却狂論無政府主義。他告訴我們，『每種形式的人治人的政府，都是一種壓迫。社會的最高理想，在於秩序與無政府的結合。』他的無政府主義(Anarchism)，是廣義的，不僅沒有政府，並且沒有主權，沒有財

產，沒有一切形式的權力。他又是一個絕對平等主義者，但他並沒有告訴我們：怎樣才能在一個無政府社會裏達到絕對平等。他異想天開地把政治學看成了統計學，他說在一個無政府社會裏，每一個國內的政治問題，應按國內統計局的實際數字來解決；每一個國際政治問題，也不過是一個國際統計問題。所以，他認爲無政府社會裏的一切政治問題，將來統由科學院來處理。科學院的常務祕書，猶如一國元首。他反對『權力』，在這兒又提出了一個『科學院』，他的理論，顯然是自相矛盾的。

他唯一的貢獻，當推他的『勞動時間價值說』。他覺得一切生產品的價值，都以所耗勞動時間的多寡，來計量它的價值。換言之，勞動時間是一切價值的尺度。

他也曾做過美麗的夢，夢想實現他的社會理想。他反對革命，他主張社會改造的第一步，要先成立一個國家銀行，由國家銀行把生產手段借給每一個勞動者，不取分文利息，這樣，可使全國利率慢慢下跌，利息會等於零。到那時，地租與利潤，必然也會無形消滅。他曾想募股五億法郎來創辦一座這樣的放款銀行，但他東奔西走，也祇募足一萬五千法郎。無情的現實，對普魯東的無政府主義就是一個最大的諷刺！

所以，在社會主義思想史上，普魯東的實際影響，是非常有限的。他的整套思想，破壞性與消極性的成份，遠過於建設性與積極性的成份，嚴格說來，他的無政府主義甚至是反社會主義的。

一〇 奧文與奧文主義

當法蘭西的大地濺遍了革命鮮血的時候，水汀與機器也正在革英國社會的命。從一七六〇年起，英國經歷着一次更大的經濟革命——工業革命（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工業革命給英國勞工階級帶來了悲苦：失業、饑餓與貧窮。生產資本與社會財富的集中，使貧富對立更趨尖銳，階級鬥爭的火星，已在那兒閃爍了！

英國社會呈現着不安，如果不變，就一定會亂。許多社會改革家與社會思想家都獻出他們的智慧，想使英國平平穩穩地再來一次『光榮』的社會革命。洛克的勞動價值說與邊沁(Jeremy Bentham，一七四八——一八三二年）的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成為時髦的話題，斯朋司(Thomas Spence，一七五〇——一八一四年）的單一稅說與奧基爾維（William

Ogilvie，一七三六——一八一三年）的地權改良說，也被視爲治療社會不平的靈藥。此外，佩因（Thomas Paine，一七三七——一八〇九年）主張開徵遺產稅，高德溫（William Godwin，一七五六——一八三六年）又主張廢除私有財產，豪爾（Charles Hall，一七四五——一八二五年）更指出了階級對立，階級鬥爭與戰爭的經濟根源。當時的詩人，像華次華斯（William Wordsworth，一七七〇——一八五〇年）與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一七九二——一八二二年）也都控訴着社會的黑暗與不人道。『在這個時候，出現了一位改革家，一位製造商——一位卓越而富有純白樸質性格的人才，同時也可說是少有的天生的領導者。』（恩格斯語）他就是奧文。

奧文（Robert Owen，一七七一——一八五八年）是『英國社會主義之父』（Father of British Socialism），他的一生，反映了一個時代——一個工業革命後的社會大動盪時代。他是一個富有理想的實行家。他並沒有受過古典教育。他剛十歲，就進布廠當了學徒，九年的艱苦勞作，把他磨鍊成一位堅強如鐵的工人領袖了。十九歲那年，他已經在曼徹斯特的一家紡織廠裏擔任總監，管理五百多名工人。在一次旅途中，他獲識并傾愛了他未來的妻子。她

的父親是蘇格蘭新拉拿克（New Lanark）地方的紡織廠老闆，她勸他接辦了這座廠。從一八〇〇年起，他慘澹經營，到後來，竟能名滿全歐。他剛到新拉拿克廠的時候，工人過着非人的生活，他們沒有衞生的住宅，他們享受不到家庭的溫暖，他們的子女失去了教養，他們對生命的前途毫無一點樂趣。奧文接辦之後，一切都改變了。他不僅改造工廠的技術設備，更改善了廠方的人道設備。他建築了新式的工人住宅，他創辦了嬰兒教養院，他提倡職業教育，他使二千五百名狂飲濫賭的工人，都能安於居，樂於業，都能燃起事業的熱情。他與工人親愛如弟兄。儘管當時別廠的工人，每天仍要工作十三小時乃至十四小時，但奧文祗要他們工作十小時半。一八〇六年，經濟恐慌像風掃落葉，也使新拉拿克廠停工了四月之久，但奧文仍舊照付全月工資。即使在那一年，他還替股東賺了加倍的利潤！

在當時，新拉拿克曾被歐洲看成了工業的聖地，各國社會改良家都跑來觀光（俄國沙皇尼古拉也曾跑來），美人葛里斯康（Griscom）曾寫下過這段印象：

『在一個工業社會裏，會有這樣的秩序，這樣完善的行政，這樣的安靜，這樣的洋溢着合理的快樂，我相信，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是找不到的。』

奥文不僅是一個社會改良家，還是一個唯物論的社會改良家，他認爲人的性格與意識是受遺傳與環境決定的，而在個性的發展過程中，環境尤其重要。到後來，他的思想，才一天天接近於共產主義。他早年，深受邊沁的影響，邊沁是他的好朋友，也是他事業的合夥人，他倆都以「最大多數的最大快樂」看成人類社會的最高目標的。但邊沁主張維持現狀，而奥文却覺得應該逐漸過渡到共產社會去。從一八一五年到一八一八年，奥文曾領導過勞工立法運動，他當時認爲通過議會立法的方式，可以改善工人生活與工廠制度。然而，一八一九年所通過的社會立法，祇是一紙具文，使他大失所望。他對當時的社會制度，開始懷疑起來，他終於轉向到烏托邦的共產主義了。

奥文的烏托邦思想，可說與傅立葉一脈相承。他覺得機器生產的結果必然會造成失業，而救濟失業的根本辦法，是逐步實現共產主義。首先要建立許多「統一與合作村」(Village of Unity and Coorperation)，每村佔地一千至一千五百英畝，足以容納五百人至二千人。全村中央，建有四方大屋一幢（稱爲 Parallelograms）。村民共產分住，屋內設有公共餐室，公共圖書館，公共學校。嬰孩滿了三歲，移交社會撫養。村民各安所業，而以農業爲

主，工業次之。各村爲一獨立的經濟單位，在村內，無階級，無剝削，充滿了同胞之愛與合作的精神。從一村可普及到一國乃至全世界，再以聯盟方式，合爲一個整體。

奧文的思想轉向共產主義之後，一方面，個人的思想與行動發生了矛盾，他深覺自己的新拉拿克實驗，幷非根本之道；另方面，他那偏激的言論，已引起特權階級(資產階級)的仇視。一八二一年，他發表了『社會制度』(Social System)，他痛斥了私有財產、個人主義經濟學與分配不均。由於工業資本家的圍攻、中傷與誣蔑，他竟不能在自己締造起來的『工業聖地』就留下去了。

但他幷沒有心灰意懶，一八二四年，他湊集了三萬英鎊，又在美洲印第安那(Indiana)購置了三萬英畝的地產，想在那兒實驗他的共產主義，他稱它爲『新和諧村』(New Harmony)。在舉行開幕禮的那天，他充滿信心地向村民宣佈：『我到這裏來，要建立一個全新的社會制度，使它從一個愚昧自私的制度變成一個開明的社會制度，它要把全體的利益慢慢結合爲一，還要剷除掉人與人間的一切競爭。』然而苦鬪了三年，奧文的實驗又不得不告破產，失敗是痛苦的，但從失敗中，奧文認識了一個眞理：共產主義的理想，是不能與勞工運

動說節的。從一八三二年起，他幾乎直接領導了英國的工會運動。一八三四年，他促成了一個全國性的工會組織。一八三五年，他在全英組織了社會主義研究會，從那時起，『社會主義』這個名辭，對英國人民才慢慢熟悉起來。

不用說，在一切政治的烏托邦主義中，奧文主義是最接近現實的。奧文的不朽，不但因爲他有共產主義的思想，而且因爲他是一個實際行動家，他給後世的社會主義者樹立了一個模範。從奧文的富有戲劇性的一生中，我們可以深切的認識到：社會主義并不是一種空想，而是一種革命行動。空想的社會主義，由奧文集了大成，也由奧文的革命行動，使它後來能够跨進科學的社會主義的新階段去。

一一　理性主義·直覺·浪漫運動

從謨耳到奧文，我們敘述了各式各樣的政治烏托邦主義，有些是完全空想的，像謨耳的『烏托邦』；有些是接近現實的，像勃郎的『社會工廠』與奧文主義。儘管這批社會空想家都沒有實現他們的理想，但他們的一片救世之心，多少是值得後世景仰的。他們生長在理性主義

時代的前後。他們熱愛理性，追求理性，歌頌理性。他們爲理性而生，也願爲理性而死。他們都可說是理性主義者。可惜，他們的理性主義，多遲主觀的直覺，他們沒有擁抱客觀的現實。他們沒有想到：一個超乎現實的純粹理性（像康德所說的那樣）永遠祇是一個空想的理性或理性的空想！唯其因爲他們太主觀，太相信自己的直覺，他們的一切社會改革運動，本質上，表現爲一種個人主義的浪漫運動。浪漫運動的革命性、創造性與自發性，都是難能可貴的，但浪漫運動的本身，不一定會合乎社會革命的要求。如果說，宗敎的烏托邦主義與哲學的烏托邦主義都代表了一種啓蒙的社會思想，那末，政治的烏托邦主義就可說代表了一種啓蒙的社會行動，到了科學的社會主義，才眞正變成一種指導行動的科學。

第五節　烏托邦主義的批判

概括說來，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以前，一切社會主義思想都可稱爲烏托邦主義。早期的宗敎烏托邦思想家，可稱爲救世主義者，他們的主義，不是社會主義，而是愚昧主義；中期的哲學烏托邦思想家，可稱爲人道主義者，他們的主義，也不是社會主義，而是理想主義；

晚期的政治烏托邦思想家，可稱爲理性主義者，他們的主義，雖多少接近了社會主義，但還祇能稱爲理性主義（或像 W. Sombart 所謂的「理性主義的社會主義」），而不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在今天，我們對於這類烏托邦主義，也許覺得幼稚，荒誕，甚至把它比作「天方夜談」，但我們必須切切記住：「思想是時代的反映」，他們的思想也祇能反映他們的時代。在他們的時代，能有他們這樣的思想，已不能不算是鳳毛麟角的了。他們共同的缺點，就是把他們的社會理想，完全建立在絕對眞理、絕對理性與絕對公正上。恩格斯曾有一段透澈的評語：

「所以這些空想的社會主義，都是絕對眞理，絕對理性，絕對公正的表現。……然而，絕對眞理是超乎時間、空間與人類的歷史發展的。它會在什麼時候與什麼地方發現，也祇能是偶然之事。加以，這些絕對眞理、理性與公正的內容，還因各派創導人而異。每一位創導人所抱的特殊的絕對眞理、理性與公正，又是決定於個人的主觀認識，存在條件，智識範圍與學術修養的。在這種絕對眞理的衝突狀態下，它唯一可能的結局，就是交互排斥。」

因爲他們固執於絕對的眞理，他們捉不住歷史進化的眞理！因爲他們迷惑於絕對的理

性，他們就認不清社會發展的理性！因爲他們癡待着絕對的公正、他們幾乎沒有想到應該用階級鬬爭來爭取社會公正！他們都懷抱一個美麗的空想的將來；却不能把他們的革命理想，完全溶解在革命事業的聖水裏。所以，空想的社會主義，充其量祇算是一套「社會哲學」，還不能稱爲實實在在的「社會科學」！

第二章　科學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Marxism)

第一節　馬克思的時代、生平與著述

一　革命高漲的時代

從空想的社會主義發展到科學的社會主義，是有着它的時代背景的。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與四十年代，反專制的革命高潮，已在歐洲大陸上洶湧澎湃起來。英、法兩國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已經高度發展，它們國內勞資雙方的生產關係也日益惡化，勞工運動的巨浪，正滾滾而來。烏托邦的社會主義思想，已經落在時代的後頭，它不能適應一個革命高漲時代的社會要求了。在當時，出現了許多革命的社會思想家，給烏托邦主義以無情的批判，但還不能捉住時代的靈魂，來建立一套完整的社會革命的思想體系。

馬克思生於一八一八年，恩格斯生於一八二〇年，在他倆年青力壯的歲月，剛好是一個革命運動繼續高漲，而革命思想體系尙未完全建立的苦鬪與苦悶的時代。他倆參加了實際的革命鬪爭，他倆認識了社會的思想苦悶，他倆滙合了一切最進步、最革命的思想精華，予以綜合，予以闡揚，終於發現了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社會革命眞理。它就是本篇所要介紹的馬克思主義（亦可稱馬、恩主義）。

由此可知，馬克思主義所代表的，是一個時代的眞理。唯其因爲馬克思與恩格斯都生長在一個革命高漲的時代，他們才能發現這個革命時代的眞理；更因爲他們的革命眞理是革命時代的具體反映，所以，馬克思主義才能成爲社會革命的南針。這點基本的認識，是異常重要的！

二 馬克思的生平

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一八一八——一八八三年）的幼年生活，是很平靜的。他稟賦很厚，家庭境況也算富裕，他是從一個有敎養的環境裏長大起來的。十七歲，他進了波

昂（Bonn）大學，讀一年，轉學到柏林大學，他父親命他研究法律，而他在課餘却專攻歷史、文學與哲學。他像浮士德那樣的渴愛眞理。他十九歲那年，就寫信給他父親，說他厭惡康德與斐希德（Johann Gottlieb Fichte，一七六二——一八一四年）的唯心論，他想鑽進黑格爾的哲學體系裏去追尋他的眞理與智慧。一八四一年，他大學畢業，他的博士論文的題目是『德謨克里西與伊壁鳩魯自然哲學之差異』（Differenz der demokritischen und epikureischen Naturphilosophie）他當時熱愛黑格爾的辯證法，他與柏林那批『左翼黑格爾派』（Left Hegelians）的激進自由主義份子，往還極密。

大學畢業後，他想當一個教授，但在普魯士政府的反動統治下，講學是沒有自由的，他不能實現自己的願望。一八四二年一月一日，萊茵省的少數激進資產階級份子，創辦了『萊茵日報』（Rheinische Zeitung），馬克思初爲該報撰稿，到十月，被聘爲該報總編輯。他那支犀利的筆，刺痛了統治階級，一八四三年一月一日，報館被封，在馬克思的心的深處，又一次燃起了對舊社會的仇恨。

這一年，他與衞司弗倫（Jenny Von Westphalen）結了婚。他倆恩愛終身，長年在國外度

着艱困戰鬥的流浪生活。婚後不久，他倆移居巴黎，他計劃與朋友羅格(Arvold Ruge)合辦『德法年鑑』(Deutsche-Französische-Jahrbücher)，後因意見不合，祇出一期，卽告停刊。馬克思的思想，到這時更趨激進。他讀到了費爾巴哈(Ludwig Audreas Feuerbach，一八〇四——一八七二年)的『將來之哲學原理』(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der Zukunft)，他立刻醉心於費爾巴哈的唯物論，並且『立刻變成了費爾巴哈主義者』(恩格斯語)。在這段時期，他研究了各種空想社會主義的作品，特別是卡貝脫、傅立葉與普魯東的著作。

一八四四年九月，恩格斯(Frederick Engels，一八二〇——一八九五年)也到了巴黎，他結識了馬克思，眞理與事業，使他倆的友誼終身結合在一起，成爲人類歷史上的佳話與驕傲。第一年，他倆合著了『神聖家庭』，在這本書裏，已經孕育了唯物史觀與階級鬭爭的胚胎。當時的法國，普魯東的『什麼是財產』與『貧困的哲學』二書最爲風行。在感情上，馬克思與普魯東是朋友；然而在理想上，他們却是敵人。一八四七年，馬克思出版了『哲學的貧困』(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給普魯東主義一個嚴厲的駁正。從一八四五年到一八四八年，馬克思與恩格斯一面公開發表革命學說，一面又祕密進行革命工作。一八四五年，馬

克思被逐出巴黎，流亡到比京布魯塞爾。一八四七年春，『共產主義聯盟』(Bund der Kommunisten）祕密成立；同年十一月，由馬克思與恩格斯領導，『共聯』又在倫敦舉行二次大會。一八四八年二月底，在他倆合作下，社會主義最偉大的歷史文獻——『共產黨宣言』（詳見下節）終於在倫敦首先出現了。

那時馬克思仍在比京。二月革命從法京燃燒到比京，又加罪到他的身上，三月四日，他再被逐出比境，避居巴黎。德國『三月革命』爆發後，馬克思暫時獲得了自由，他重回祖國的懷抱。從一八四八年六月一日到一八四九年五月十九日，他擔任了『新萊茵日報』(Neue Rheinische Zeitung) 的主筆。反革命的逆流，捲土重來，馬克思不得不避難異域。初到巴黎，祇歇了歇脚，又被驅逐到倫敦（一八四九年六月十三日）。所以從一八四三到一八四九年，馬克思一直在被迫害與流亡中，爲革命工作奮鬥不懈。

一八四九年後，馬克思的生命力，可說全部是用來發掘與發揚科學的社會主義眞理的。不過，在這三十多年間（僅短期離英養病），他雖經常埋頭於大英博物館的圖書室裏，但他并沒有把自己與工人運動孤立起來。一八六四年九月廿八日國際勞工協會（International

Workingmen's Association 的成立，實際是他主持的。巴黎公社失敗後（一八七一年），許多革命志士逃亡到倫敦，也都得到馬克思的照護與義助。一八七二年，由於歐洲政治形勢的不利，第一國際移設紐約。從此以後，馬克思就聚精會神，潛心著述了。然而，貧困與勤奮，奪去了他的健康，如果沒有恩格斯的資助，他甚至還無法完成「資本論」第一卷。一八八一年十二月二日，他愛妻不幸與他永別，過份的悲悼，使他半病的身體，失掉了康復的可能，一八八三年三月十四日，他靜靜地躺在那張舊椅上與世長辭了。

三　馬克思的著述

馬克思是近代社會主義（即科學的社會主義）之父。由於他的博學，深思，明辨，才替社會主義眞理建立了一個完密的科學體系。「馬克思是一個天才，他繼承了并匯合了十九世紀的三大思想主潮——德國的古典哲學，英國的正統政治經濟學與法國的社會主義。」（列寧語）馬克思主義是近代思想的精華，也可說是近代社會科學的總結晶體。因而，我們研究近代社會主義，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爲基本核心，以它爲出發點，我們才能探索出社會主

義發展的來龍與去脈。

馬克思主義的具體根據，就是馬克思本人的著作。下面所列舉的，都是馬克思的重要著作。

（一）「神聖家庭」(Die heilige Familie)、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一八四五年初版。

（二）「德意志意識形態」(Die Deutsche Ideologie)，一八四五年初版。

（三）「哲學的貧困」(Misère de la Philosophie)，一八四七年初版。

（四）「共產黨宣言」(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n Partei)，馬克思與恩格斯合著，一八四八年初版。

（五）「法國之階級鬪爭」(Die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一八五〇年初版。

（六）「政治經濟學批判」(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一八五八年初版。

（七）「法國之內戰」(Der Bürgerkrieg in Frankreich)，一八七一年初版。

（八）「資本論」(Das Kapital)第一卷由馬克思完成，初版於一八六七年；第二卷與第三卷由恩格斯編成，初版於一八八五年。

(九)『哥塔社會民主綱領批判』(Zur Kritik Sozialdemokratischen Programms Von Gotha)，一八七五年初版。

(十)『價值價格與利潤』(Value, Price and Profit)，這是馬克思的演辭，後由他女兒整理發表。

由於馬克思與恩格斯的革命事業是不可分的，所以，恩格斯的許多著作，也被看成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主要有下列幾種：

(一)『英國勞工階級狀況』(Die Lage der Arbeitenden Klassen in England)，一八四五年初版。

(二)『反杜林論』(Herr Eugen Dührings Umwälzung der Wissenschaft)，一八七七年初版。

(三)『家族、私有財產與國家之起源』(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hums und des Staats)，一八八五年初版。

(四)『費爾巴哈論』(Ludwig Feuerbach)，一八八六年初版。

（五）『辯證法與自然』（Dialektik und Natur），此書寫於一八七二年—一八八二年，是未完成的著作，一九二七年始由 Riazonov 代編問世。

第二節 『共產黨宣言』

一 『共產黨宣言』的歷史意義

『共產黨宣言』發表於一八四八年，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年頭。在一八四八年以前，一切社會主義的思想，都是空想的，形而上的，有些甚至是反動的；『共產黨宣言』發表了以後，它不但使社會主義思想起了革命，并且給社會主義者帶來了一套革命科學，它指出了革命的方向。正如英國拉斯基教授(H. J. Laski)所說：『「共產黨宣言」是一部人類的書，使我們從一個高高的地方，觀望過去歷史的全部過程，從那裏，我們會發現無可逃避的一課。「共產黨宣言」既是一個收場，又是一個預言——一七八九年革命詭計加於工人階級的痛苦的收場與工人階級所憧憬的理想世界的預言。』

所以，『共產黨宣言』是社會主義思想史上最偉大的文獻，從它以後，社會主義才不再是一種社會革命的空想與教條，而變成了革命行動的南針。也就是說，從它以後，社會主義思想才眞正發展爲一種革命科學，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自然並不是互相排斥的，共產主義祇是社會主義的更高形態，這篇宣言發表時，馬、恩兩氏所以名之爲『共產黨宣言』而不稱爲『社會主義宣言』，也有着它的客觀背景。首先，這篇宣言是馬、恩兩人負責替『共產主義聯盟』起草的；其次，在當時，社會主義的思想，極其混雜，爲了別於其他不倫不類的主張，也有另標新辭的必要，同時，共產主義除了主張政治革命，還特別强調社會革命，共產主義既是一種更遠大更崇高的追求，那末，取名爲『共產黨宣言』顯可產生更大的歷史價値與影響。

當然，『共產黨宣言』的歷史意義，決不是三言兩語所能概括的。有一點，我們特別値得指出，就是：從一八四八年到現在，已整整百年了，我們今天再讀『共產黨宣言』，不僅覺得內容猶新，幷且有了更深的了解。如果說，『共產黨宣言』還祇是資本主義喪鐘的第一響，而現在已喪鐘亂鳴了！『共產黨宣言』所指引出來的，就是一條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

與共產主義的歷史道路，經過百年來的大考驗，已鐵定爲歷史進化的偉大眞理了。

二　『共產黨宣言』的中心內容

『共產黨宣言』全文約二萬餘字，共分四節。第一節題爲『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第二節爲『無產階級與共產主義者』；第三節爲『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著述』；第四節爲『共產主義者在各種反對黨派中的地位』。它的中心內容，可以歸納爲三大要點：

第一，從社會經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說明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興起與對立。『宣言』上開宗明義地指出：『一切過去社會的歷史，就是一部階級鬥爭史。』在奴隸社會，有奴隸與奴隸主之間的階級鬭爭；在封建社會，有農奴與封建地主之間的階級鬥爭；到了資本主義社會，又有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鬭爭。

近代資本主義的興起，是直接由於新大陸的發現，亞洲門戶的開放，機器生產與工廠制度的發展，以及世界商品市場的追逐。新興的資產階級，一方面掃清了封建經濟的障礙，另方面又把社會財富集中到他們的手上來，他們不但成爲社會生產手段的所有者，并且操縱了

實際政治。因爲「近代國家的執行當局，不過是替資產階級處理日常事務的委員會」。然而，由於資本主義生產的盲目性，終必帶來了經濟恐慌，資產階級自己假造了自殺的武器。同時，由於工廠制度與機器生產的高度發展，勞工變成了機器的附屬品，他們祇能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換取聊以糊口的工資，他們集體地爲資本家所搾取，所奴役，他們遲早會結成工會，爲改善生活向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鬭爭。所以，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無產階級的力量也日益膨大。再因生產資本的集中，「大魚」吃盡了「小魚」，使中、小資產階級也慢慢降爲無產階級。所以，「各種階層的人口，都會參加到無產階級的隊伍裏來。」到那時，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對立與鬭爭，益趨尖銳。由於無產階級隊伍的壯大，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無產階級的。

第二，在階級鬭爭的客觀形勢下，提出共產主義者的一般政治綱領。「宣言」上明確地宣稱：共產黨就是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不分國別，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應該團結一致，爲共同的目標而奮鬭。「勞工階級革命工作的第一步，必須使無產階級升爲統治階級的地位，必須贏得民主主義的勝利。」這句話也就是說，要推翻資產階級專政，而由無產階級自己執

政。無產階級專政後，在經濟比較發展的國家，「宣言」上主張以下列十項作爲一般政治綱領：

(1)廢除土地私有制，一切地租歸公。

(2)實行高額累進的所得稅制。

(3)廢除一切遺產制。

(4)叛徒財產，一律沒收。

(5)信用事業一律收歸國有。

(6)交通，運輸事業，一律國有。

(7)擴大工廠與生產手段的國有領域。

(8)工作義務，一律平等。

(9)農業與工業合作，逐漸消除城市與鄉村間的隔閡。

(10)普及義務國民教育，廢除童工制，教育與工業生產取得合作。

第三，根據科學的時代的眞理，批判各式各樣似是而非的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思想。在

『宣言』的第三節內，前後駁斥了三種謬說：第一種斥爲『反動的社會主義』，包括了封建的社會主義（即貴族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與德意志社會主義（或稱所謂『眞』社會主義）；第二種斥爲『保守的或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以普魯東爲首）；第三種則斥爲『批判的烏托邦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以聖・西門，傅立葉與奧文爲主）。

『共產黨宣言』的中心內容，不外上述三點。但『共產黨宣言』的眞精神，倒不是純粹爲了確立教條，以煽動革命。它最偉大的地方，在於指明了歷史發展的眞理與歷史前途的歸趨。如果說它是『教條』，那它決不是一種『死』的主觀的教條，而是一種『活』的現實的教條。這個活的教條，是可隨着每個國家的特定歷史傳統和經濟條件而靈活運用的。

第三節　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

一　唯物的哲學觀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是建立在唯物論上的。在一八四四——四五年間，馬克思是一

個費爾巴哈主義者，他認爲費爾巴哈的主要貢獻，在於發揮了唯物論的哲學觀，以抗拒黑格爾的唯心論。從十七世紀起，唯物論不但是抗拒宗教與神學的，也不但是抗拒形而上學的，并且是抗拒舊政治制度的武器。唯心論與唯物論的思想鬪爭，形成了兩大對立的哲學陣營。恩格斯非常英敏的指出：

「一切哲學，特別是近代哲學最基本的問題，就是關於思想與存在的關係問題，……也就是精神與自然（即物質）的原始問題。……哲學家對於這個問題的答案，分裂爲兩大營壘。那些認爲精神先於自然者，屬於唯心論的陣營；而認定自然先於精神者，則屬於唯物論的各派。」（見「費爾巴哈論」）

馬克思在「資本論」上，更自述了不同於黑格爾唯心論的地方：

「黑格爾把人類的思想過程（即概念）看成了一個獨立體，認爲它是實在世界的創造主，而實在世界不過是概念的外鑠的、表面的形式。可是，我（馬克思自稱——著者）卻剛剛相反，我覺得概念唯不是別的東西，它祇是物質世界在人類心靈上的反映，再把它轉化爲一種思想的形式。」（引自卷一中的「序言」）

關於這點，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上，曾予以引申，他說：

『世界的統一體並不包含在它的存在裏，……世界的眞正統一體是包含在它的物質性裏。很久以來的哲學與自然科學發展史，已證明了這點。運動祗是物質的存在形式。任何地方，沒有了運動，就不會有物質；任何地方，沒有了物質，也不會有運動。……有物質而無運動與有運動而無物質，同樣是不可思議的。……然而，倘使要問：什麼是思想與意識呢？它們是從那裏來的呢？這就非常明顯了：它們都是人類頭腦的產物；而人類又是自然的產物，自然的發展更爲環境所左右。由此顯然可見：人類頭腦的產物（即指思想與意識），歸根結底又是自然的產物，它非但不會與自然矛盾，並且是一致的。』（見『反杜林論』）

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哲學。馬克思不但反對唯心論與唯神論，他還反對康德（Immanuel Kant，一七二四——一八〇四年）的批判論(Criticism)，孔德的實證主義（Positionism），與一切其他的不可知論。同時，馬克思與恩格斯對當時的庸俗唯物論（Vulgar Materialism，以步克湼（Büchner。一八二一——一八六二年）及伏格特（Carl Vogt一八一七——一八九五年）爲首）與費爾巴哈的唯物論，也有所批判。他倆認爲這些都是一種機械的

(Mechanistic)唯物論，因爲它們並沒有吸取近代化學與生物學的成果，同時，他們又沒有歷史的與辯證的觀點，違背了自然進化的法則。再加，他們把人類看作孤立的存在體，而不是當成一切社會關係的綜合體的。

總之，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哲學，是把物質認爲宇宙的本體的。恩格斯這樣說過：

『宇宙的本體，就是物質。宇宙間的各種現象，構成了物質運動時的各種形式。各種現象間的交互影響與聯繫，就是物質運動時的發展法則。宇宙的發展，也是符合這個物質的運動法則的。』

（見『費爾巴哈論』）

馬克思更一言道破：『思想與所思想的物質是分不開的。物質才是一切變化的下層建築。』又說：『不是意識決定存在；而是存在決定意識。』

二

但馬、恩兩氏的唯物論，既不是庸俗的唯物論，又不是機械的唯物論，而是辯證的唯物論(Dialectical Materialism)。馬、恩兩氏雖與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一七七〇——一八三一年）的唯心論站在完全對立的地位；但他倆却承認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一種博大深邃的進化學說（The Theory of Evolution），幷且認爲這是德國古典哲學的最高成就。恩格斯曾說：

「唯有馬克思與我，才挽救了自覺性的辯證法（從黑格爾主義的唯心論泥沼中），把它運用到自然的物質表象上去。……自然是辯證法的考驗。我們必須說：近代的自然科學已經給這種考驗，提供了非常豐富與日益累聚的材料（鏞按當時鐳、電子等尚未發現）。所以，歸根說來，自然的過程，是辯證的，而不是形而上的。」（『反杜林論』）

儘管馬、恩兩氏接受了黑格爾哲學的革命的一方面——辯證法，還幷不是說，馬、恩兩氏的辯證法與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一模一樣的。因爲，馬、恩兩氏所吸取的，仍爲黑格爾主義裏的精華。這一點，馬克思曾有極明晰的自白：

「我自己的辯證法，不僅與黑格爾的根本不同，並且完全相反。對於黑格爾，思想過程(概念)是實體的創造主，對於他，實體祇是概念的外鑠的表象。而對於我，却剛剛相反，概念並不是別的東西，祇是反映與轉移到人類的頭腦裏面的物質。雖則，黑格爾把辯證法弄得神祕化了，但我們却

不能把他的貢獻一筆抹煞，因爲，他還是第一個人，以一種最淵博、最完密的方法，解釋了辯證運動的一般形式。在黑格爾的著述裏，辯證法是站在前頭的。如果你想在神秘化的外衣裏，發現隱藏着的合乎理性的核心，你必須把它倒正過來。』（『資本論』卷一中的第二版序）

由此可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祇是一種『一般運動法則的科學』（恩格斯語），這個運動法則，對客觀宇宙與人類思維都可同樣適用。唯其因爲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是一種思維的科學，所以，它必然把認識論也包括進去。也就是說，祇有通過辯證的方法，才能認識客觀宇宙裏的一切存在。

因爲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是從一般運動法則來認識客觀存在的，所以它決不會把客觀存在的事物看成孤立的或偶然的現象，而是把它們看成一個『相關的統一的整體』的。辯證法與形而上學不同，後者認爲自然是靜止的，而前者却認爲是繼續變化的。恩格斯曾說：『一切自然現象，是在一個經常流通，不停變化的狀態中。』（見『辯證法與自然』）同時，辯證法所謂的變化，并不指一種單純的生長過程，它除了承認量變（Quantitative change），還承認質變（Qualitative change），它不把變化看作循環或重演，而是認爲一切變化都是從低級

階段發展到高級階段，從簡單階段發展到複雜階段，也就是從一個舊的量變階段發展到一個新的質變階段。這種變化，不僅是外鑠的，幷且是內在的。辯證法認為自然裏的一切事物與現象，都包蘊着內在的矛盾。由於這種內在矛盾的存在，才能使舊的死亡，新的誕生，也就是說，事物的本身，存在着它自己的否定與肯定，否定就是一種更高度的肯定。

這些，就是辯證法的具體內容。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方法論，就是以它為根據的。

三　唯物史觀

以上兩小節，分別敍述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與辯證法。儘管馬、恩兩氏的哲學思想深受費爾巴哈唯物論與黑格爾的辯證法的影響，但他倆祇攝取了費爾巴哈與黑格爾哲學體系裏的科學成份與革命成份，因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並不是費爾巴哈式的唯物論，而是辯證唯物論；同時，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也不是黑格爾式的辯證法，而是唯物辯證法。對於馬克思主義，唯物論與辯證法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我們稱它為辯證唯物論，一方面因為它研究自然（宇宙）現象的方法是辯證的；另方面又因為它對自然現象的解釋，也就是它對自

然現象所有的認識，是唯物的。整個說來，辯證唯物論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世界觀（World Outlook of Marxism)。

如果把辯證唯物論的原理，擴大用來研究社會生活，那它就是歷史唯物論了。換言之，歷史唯物論(Historical Materialism)就是用來研究人類社會與人類歷史的辯證唯物論。我們通常稱歷史唯物論爲唯物史觀(Materialist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亦有人稱爲『經濟史觀』(Economic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其實它和經濟史觀是不能混同的。

馬克思主義從辯證唯物論擴大爲歷史唯物論，可說是一種必然的邏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論既承認『存在決定意識，而不是意識決定存在，那末，用這種唯物論來解釋人類的社會生活，就必然會是：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而不是社會意識決定社會存在』。

所謂歷史唯物論或唯物史觀，簡單說來，就是指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是一切社會發展的基本動力。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上，曾提綱挈領地說：

『在人類從事社會生產時，他們會進入一種特定的關係，這種關係，不但必要，并且是超乎他們的意志的。這種生產關係，將與物質生產力的某一發展階段相適應。這種生產關係的總和，就構

成了這個社會的經濟結構——在這個眞實基礎上，確立了法律的與政治的上層建築，它們又與特定形式的社會意識相適應。物質生活裏的生產方式，決定了社會生活、政治生活與精神生活發展過程的一般性質。』

又說：

『在大體的輪廓上，可把社會經濟構成的發展階段，分爲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與近代布爾喬亞式的生產方法。』（『序言』）

所以，馬克思認爲：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如果改變，一切社會關係也將跟着發生變化。馬克思還說過兩句名言：『風車建立了一個封建社會；蒸汽機又建立了一個資本主義社會。』（見『哲學的貧困』）唯物史觀之所以成爲一種革命的社會科學，就因爲它不但解釋了社會怎樣構成，而且解釋了社會怎樣發展。馬克思說得非常肯定：『暴力（Force）就是從一個舊社會孕育出一個新社會的接生婆。』（見『資本論』）

上面這些，就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要義。這是一個偉大的發現，對歷史科學而言，它至少有兩點不朽的貢獻：

第一，過去的歷史學，祇討論人類活動的意識動機（Ideological motive），幷沒有進一步探究這些意識動機的根源，也沒有抓住社會關係的發展法則，更沒有理解社會關係與物質生產之間的關係。而唯物史觀却能把握住社會發展的基本法則。

第二，過去的歷史學，並沒有把羣衆（Masses）看成歷史活動的主體，祇有歷史唯物論才以科學的眼光，分析了羣衆活動在社會生活中的主導影響。

總之，在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理論體系成立以前，一切的社會科學都祇能說是一種「材料的堆砌」。它們是孤立的，零星的，它們並沒有把社會生活當作一個有機的發展的整體，它們祇是一種主觀觀念的闡揚，而不是對於社會客觀的科學研究。所以，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帶來了哲學思想的大革命，同樣地，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論又帶來了社會思想與社會認識的大革命。

最後，我們必須指出，儘管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承認社會的物質生活條件是決定歷史發展的基本因素，然而，他沒有認爲經濟因素是決定歷史發展的唯一因素。恩格斯在給他學生的一封信上，曾這樣說過：「根據唯物史觀，決定歷史的根本因素是實際生活中的生產過

程與再生產過程。我與馬克思的立論，僅止於此。如果有人要把它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的因素，那他把我們的立論顛倒爲無意義的、抽象的與荒謬的辭彙了。經濟條件是基礎，但其他各種上層建築——如政治組織，憲法，……政治，法律與哲學理論以及宗教信仰等……對於歷史鬪爭都有所影響，並且在好些場合，還能決定歷史鬪爭的形式。』（該信發表於一八九五年十月一日）

第四節 階級鬪爭與無產階級專政

一 階級・階級意識・階級鬥爭

——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與歷史觀，都是辯證的。它認爲自然與社會的發展，同樣合乎辯證的邏輯。自然界既充滿了內在矛盾，人類社會裏也同樣存在着內在矛盾。這個社會發展的辯證邏輯，就是馬克思主義階級鬪爭（Class struggle）學說的理論根據。

——在馬克思與恩格斯以前，雖早已有人認定社會上存在與對立着不同的階級（如溫斯頓萊

與聖・西門），但他們沒有把階級鬪爭與社會發展聯貫來看，更沒有把階級鬪爭看成社會發展的主要特徵。祇有到『共產黨宣言』發表了以後，階級鬪爭的歷史眞理，才有了科學的發現。『共產黨宣言』上說：

> 『一切過去社會的歷史，就是一部階級鬪爭史（除了原始共產社會的歷史——恩格斯附語）。自由人與奴隸，貴族與平民，封建地主與農奴，基爾特雇主與手工業者，換言之，壓迫者與被壓迫者都經常對立，不停地進行着祕密的或公開的鬪爭。每次鬪爭的結局，不是整個社會經歷革命性的改造，就是對抗階級兩敗俱傷。』

這個階級鬪爭，照馬克思看來，是愈演愈烈的。他認爲法國大革命，一八四八年歐洲各國的革命，拿破侖第三（Napoleon III，一八〇八年——一八七三年）的政變與巴黎公社（一八七一年），就是近代階級鬪爭的更露骨的表現。馬克思認爲在資本主義社會裏，主要分化爲兩大階級：一是出賣勞動力換取工資的無產階級，二是獨佔生產手段、不勞而獲的資產階級。所以，馬克思所謂的『階級』，是指經濟利益相同的社會集團。他相信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是永遠無法調和的。因爲：工資勞動者（即無產階級）出賣勞動力的

時候，希望所得的工資愈高愈好；而工業資本家（即資產階級）購買勞動力的時候，又希望支付的工資愈低愈好。『無』的集團與『有』的集團的階級意識永遠發生衝突，這衝突遲早會演爲實際的社會鬬爭。『共產黨宣言』上接着說：

『近代布爾喬亞社會是從封建社會的廢墟上生長出來的，它並沒有消滅階級對立（Class antagonism）它造成了新的階級，新的壓迫條件，因而，新的鬬爭也替代了舊的鬥爭。我們的時代是一個布爾喬亞時代，它具備了這樣的特徵：它使階級對立更簡單化了！整個社會漸漸分裂爲兩大敵對的陣營，也就是分化爲兩大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Bourgeoisie）與無產階級（Proletariat）。』

這個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對立形勢，隨着資本主義商品生產的高度發展，而日趨惡化。因爲，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愈發展，資本就愈集中，資本的有機構成也愈提高。資本集中，使小生產者降而爲無產階級；資本有機構成提高，不僅對工資勞動者加强了剝削，更使產業後備軍的隊伍日益擴大。這個時候，無產階級一定會團結起來，通過工會組織或其他方式，向資產階級進行鬬爭。馬克思認爲：資本主義愈發展，工資勞動者的組織就愈强大，那

時，工資勞動者的階級意識也一定會更加濃烈。他們必然會意識到：祇有社會革命，祇有生產手段公有，才能把他們眞正解放出來。於是，階級鬪爭就變成了一種政治鬪爭。無產階級要通過政治解放，來達到他們的社會解放。馬克思預言，在這次鬪爭中，唯有無產階級是眞正革命的，因而，最後的勝利也必然屬於無產階級。他說：

『在今天布爾喬亞社會裏，一切階級都面面相對，祇有無產階級是眞正的革命階級。在近代工業的發展過程中，其他階級都會衰亡，到最後，定會消滅，而無產階級却是它的特殊的主要產物。』（見『共產黨宣言』）

所以，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鬪爭學說，是一種社會辯證法。資本主義把無產階級孕育出來，無產階級却又把資本主義埋葬下去。資產階級剝削了無產階級，最後，剝削者（資產階級）又爲被剝削者（無產階級）所『剝削』了！剝削是『正』，反剝削是『反』，到一切社會剝削都消滅了（卽生產手段都公有了），才進到更高的辯證階段——『合』。到那時，人類才眞正跨進了理想社會——一切公有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社會。在那個社會裏，沒有了私有財產，就不會產生階級與階級意識，當然不會有階級鬪爭了。因而，馬克思主義的階級

鬪爭學說，是針對私有財產社會（包括古代社會或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并不是針對公有財產社會（包括原始共產社會與社會主義社會）而言的！

二　無產階級專政

如果說，辯證唯物論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那末，階級鬪爭學說就可說是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基礎。在馬克思以前，一切政治思想與政治鬪爭，主要是環繞於少數政治領袖與政治集團的，英雄崇拜與教條主義支配了一切。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思想，是與階級意識及階級鬪爭貫串在一起的。從階級意識及階級鬪爭出發，很自然地會主張：『勞工階級革命工作的第一步，必須使無產階級升爲統治階級的地位，必須贏得民主主義的勝利。』（『共產黨宣言』）所以，馬克思不但把政治鬪爭看成階級鬪爭，並且把無產階級專政看成無產階級贏得民主主義的必要條件。一八五二年三月五日，馬克思在致一位美國朋友（卽衞德邁亞（Weydemeyer）的信上，曾提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與必然。他這樣說

『就我個人而言，我不敢說，我第一個發現在近代社會裏存在着階級或階級鬪爭。有些中產階

級的歷史學家，在很久以前，已經闡揚了階級鬭爭的進化學說；同時，有些政治經濟學者也曾說明過階級的經濟構成。我所添加的新貢獻是下面幾個論點：（一）階級的存在是與物質生產的某一階段所適應的。（二）階級鬭爭必然會導致『無產階級專政』(The Dictatorship of Proletariat)。（三）無產階級專政是消滅階級與建立一個自由平等的社會的過渡時期。』

恩格斯也說過：

『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可把生產手段變成國家的財產。』（引自『烏托邦的與科學的社會主義』）

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戰略方式，在馬、恩兩氏的『通信錄』(Briefwechsel) 裏，載有許多珍貴的資料。馬克思並不是盲動主義的階級革命論者，他認為革命應該顧到客觀的政治形勢，有時應該攻，有時也應該守。譬如，一八四八年時，他贊成波蘭黨發動農民革命，他也贊成德國激進派發動民主革命，因為，那是一個有利於勞工階級進行革命鬭爭的時代。然而，一八七〇年九月九日，馬克思在第一國際發表演說，卻曾警告法國的無產階級暫緩發動革命，因為他覺得當時法國的政治形勢，將不利於一次沒有成熟的階級鬭爭。

下面這段話，可說是馬克思主義革命戰略的最好注釋：

『共產主義者爲爭取當前的任務而鬭爭，爲增進勞動階級的目前利益而鬭爭。然而，在現階段的鬭爭運動中，他們同時要關切到鬭爭運動的將來。』（『共產黨宣言』）

其次，馬克思又不是一個和平主義的革命論者，他對資產階級革命的積極性與澈底性，一點也不信任；他對中、小資產階級革命的動搖性與投機性，也始終提出警惕。他認爲祇有無產階級自己來領導與進行革命，才能眞正達到解放。他在『哥塔綱領批判』裏，曾對德國社會民主黨作了無情的指責，說他們『盜用了國際人民友誼一類的辭句』。接着，他又一次強調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意義：

『介乎資本主義社會與共產主義社會之間，存在着一個革命過渡階段，使它從這個社會過渡到那個社會。它相當於一個政治過渡階段，這個階段不是別的，祇是革命無產階級的專政時期。』（見『哥塔綱領批判』）

所以，馬克思不但認爲階級鬭爭是私有財產社會的歷史發展的必然，並且認爲無產階級專政是從私有財產社會過渡到公有財產社會的政治發展的必然。階級鬭爭與無產階級專政是

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基礎，也是馬克思主義根本不同於烏托邦主義的地方。烏托邦主義雖也有一個社會主義理想，却沒有把社會主義看成一個以無產階級爲基幹的革命事業，因而，它祇能是一種空想。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就在它把社會主義與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看成了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因而，它是可能也必然會實現的。

第五節　馬克思的經濟學說

一　「資本論」——「勞動階級的聖經」

「資本論」是馬克思最偉大的著作，也是社會主義思想史上最輝煌燦爛的成果，它往往被稱爲「勞動階級的聖經」。

這部鉅著，幾乎消磨了馬克思半生的光陰。馬克思在青年時代（一八四四年）已經覺得：社會經濟制度是近代布爾喬亞社會的基礎。從那時起，他開始研究古典經濟學，他特別喜歡西斯蒙第（Jean Charles Leonard Sismondi，一七七三——一八四二年）與李嘉圖的經

濟著作。他立志要寫本書，對過去的政治經濟學給予一個總批判。一八五五年後，他自已的經濟理論體系漸漸形成。一八五九年，『政治經濟學批判』出版，這是『資本論』的雛型。以後幾年，由於病貧交迫，他無法如期完成他的著述，直到一八六七年，『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版）才告問世。第二卷與第三卷，是他身後由恩格斯代爲編印的。

『資本論』或馬克思經濟學說的『最後目的，在揭發近代社會經濟的運動法則』。（『資本論』）所以，在第一卷裏，他敘述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從商品貨幣的價值形態到資本累積的一般法則，都作了詳盡的分析。在第二卷裏，他對資本流轉的過程，給予更細緻的發揮。在第三卷裏，又把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作了一番總的考察。

當然，在有限的篇幅裏，要把『資本論』的內容完全介紹出來，簡直是不可能的。下面，我們取其精義，分別敘述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說、剩餘價值說與資本累積說。

二　勞動價值說

前面說過，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是以研究『近代社會經濟的運動法則』爲最後目的的。

所謂近代社會當然是指資本主義社會。而資本主義社會最基本的社會經濟運動，就是商品生產。所以，馬克思的經濟理論，是以商品分析爲出發點的。

商品是什麽？馬克思認爲：商品一方面可以滿足人類的需要；另方面又可以用來交換其他的東西。商品的效用創造了它的使用價值。商品的交換性，即一種商品與另一種商品的交換比率，又創造了它的交換價值。每種商品，一定都有它的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或簡稱價值）的。

商品的使用價值，既是代表一種滿足人類需要的效用，所以，一種沒有使用價值的商品，是不能交換的。同時，每種商品的使用價值，在質的方面，都是不同的，決沒有人會以一斗米去交換另一斗米。交換的發生，必然是以一種商品的使用價值交換另一種商品的使用價值。但各種不同的商品，既有不同的使用價值，它們之間，又怎麽能够建立一個等價的交換關係呢？換言之，在它們之間，怎麽可能確立彼此的交換比率呢？這是因爲：它們都是勞動的產物。每種商品既然都是勞動創造出來的，它們一定包含了或多或少的勞動量，它們交換價值的大小，就決定於勞動量的多寡。馬克思會說：

『一切商品的共同的社會物質，就是勞動。……商品有價値，就因爲商品是社會勞動的結晶體。商品價値的大小或商品的相對價値，決定於商品裏面所包含的社會物質（指勞動——鏞）量的多寡。也就是說，決定於商品生產所必需的勞動量的多寡。所以，商品的相對價値，是由投放、體現與確定在商品裏面的相對勞動量所決定的。』（見『價値、價格與利潤』）

這就是馬克思的勞動價値說。但這兒的勞動是指的抽象勞動，而不是具體勞動。因爲，馬克思認爲在商品生產過程中，由於社會分工，每種生產者生產一種特殊的商品，也就創造了一種特殊的使用價値，每種特殊的使用價値，要由一種特殊的具體勞動來創造。米與布的使用價値不同，就因爲農夫種田與工人織布所用的具體勞動，完全不同。所以，一種具體勞動與另一種具體勞動存在着質的差異，使它們分別創造出來的使用價値也必然存在着質的差異，因而，商品交換價値（或簡稱價値）的大小，就不能以它所包含的具體勞動來決定。然而，儘管如此，儘管商品生產時投用了不同的具體勞動，但它們畢竟都代表了或多或少的體力勞動（代表或多或少的勤勞與辛苦），也就是說，在任何一種商品裏，都包含着或多或少的勤勞與辛苦，這就是抽象勞動，亦卽一般的社會勞動。每種商品所包含的抽象勞動，

並沒有質的差異，祇有量的差異。這一般的社會的抽象勞動（或稱一般的人類勞動），才是決定價值或交換價值的尺度。如果就整個社會來說，那末，全部商品的價值，應該等於全社會的人類勞動量。每種特殊的商品，祇代表了一部份的社會必需勞動量(Socially necessary labour)，或社會必需勞動時間 (Socially necessary labour time)(社會必需勞動量是相對於社會必需勞動時間而言的)，因而，每種商品的價值，就決定於這種商品生產時所支付的社會必需勞動量或社會必需勞動時間。馬克思這樣說：

「我們說，一種商品的價值決定於商品裏面所包蘊與結晶的勞動量，那是意味着：在一個社會的特定階段內，商品生產所必需的勞動量而言的。所謂一個社會的特定階段，是指它在一種平均的社會生產狀況之下，並使用着平均的社會勞動強度與平均的勞動技巧。」(「價值、價格與利潤」)

由此可知，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說，雖導源於古典經濟學，却不可與披蒂 (William Petty，一六二三——一六八七年)、李嘉圖等的勞動價值說，混爲一談。馬克思不但認爲一切價值均由勞動所創造，並且更進一步地指出：一切交換價值全由社會必需勞動時間所決定。這是一個偉大的發現。這個發現，不但使政治經濟學起了革命，並且把勞動者提高到社

會主人的地位。從『勞動創造價值』這一眞理，可以演繹出『勞動者創造一切社會價值』。一切社會價值既由勞動者所創造，勞動階級自然應該成爲社會的主人了。

三　剩餘價值說

從商品的交換價值出發，馬克思進而分析貨幣的價值形態，他從交換的歷史發展過程中，探究了貨幣價值形態的起源。他認爲交換的歷史過程，是從簡單的價值形態發展爲擴大的價值形態，再發展爲一般的價值形態的。一斗米換二匹布或二匹布換一斗米，稱爲簡單的價值形態；一斗米換二匹布或換三斤柴或換四兩茶或換其他數量的商品，則稱爲擴大的價值形態。反過來，二匹布或三斤柴或四兩茶或其他數量的商品都與米發生交換關係，並且都以米爲價值的尺度，假定說都祇能換到一斗米，這時，就稱爲一般的價值形態。這一般的等價物——米（或任何其他商品），就是貨幣的前身。到後來，由一種貴重的金屬品（卽一種特殊商品）來充當一般的等價物，交換就從一般的價值形態發展爲貨幣的價值形態了。所以，馬克思認爲貨幣是一種特殊的商品，金屬品之所以成爲貨幣，就因爲它本身是一種商品。也

是說，在本質上，貨幣就是商品。

然而，在商品生產的發展過程中，貨幣又會轉化爲資本。馬克思的商品流通公式是C—M—C（即商品——貨幣——商品），它表示一種商品的販賣是爲了購買另一種商品，亦即『爲買而賣』。但是，資本流轉的公式剛剛相反，它是M—C—M（即貨幣——商品——貨幣），它表示購買一種商品，是爲了再賣出去，亦即『爲賣而買』。『爲買而賣』的目的，是爲了消費；而『爲賣而買』的目的，顯然不是爲了消費，它最後還是爲了得到貨幣。但是，一個人以一元買進一斤棉花（即M—C），如果他仍以一元賣它出去（即C—M），那不是在開玩笑嗎？所以，『爲賣而買』，不僅爲了貨幣，並且爲了利潤，即希望以較少的貨幣，通過『爲賣而買』，收回較多的貨幣，它的公式應爲M—C—M（M＋m）。這兒所增加的貨幣（m），即馬克思所謂的『剩餘價值』（Mehrwerth，英名Surplus-Value）。在資本主義社會裏，貨幣就是以這樣的方式增殖起來的。而這種專以增殖剩餘價值爲目的的貨幣，已經轉化爲資本。所以，剩餘價值是不能從商品流通過程中產生出來的；它祇能從資本流轉過程中，才能產生出來。

從M—C—M（M＋m）的公式中，我們祇知道剩餘價值是從資本流轉過程中產生出來的，但爲什麼從資本流轉過程中可能產生剩餘價值呢？

馬克思告訴我們：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勞動力是一種商品。勞動者既沒有生產手段，他祇好以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來維持生活。資本家有了錢（M），就到商品市場上購買各種商品（C），來從事生產。在各種商品中，有原料、機器、房屋、勞動力等。但從生產過程來看，這筆錢（M）——即資本——可分爲兩部，一部份用來購買機器、房屋、原料等，稱爲『不變資本』（Constant Capital），另一部份用來購買勞動力的，則稱爲『可變資本』（Variable Capital）。不變資本在生產過程中所喪失的價值，會全部轉化爲生產品（即製造出來的商品）的價值，它既不會減少，也不會增加。而可變資本的價值，却是會增加的，它在生產過程中，還增殖了剩餘價值。因爲，勞動力既是一種商品，它一定有使用價值，而勞動力的使用價值就是勞動，勞動又是可以創造價值的。資本家購買勞動力的時候，雖也像購買其他商品一樣，以勞動力的價值（或交換價值）爲準。換言之，即由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社會勞動時間，來決定勞動力的價值。如所週知，要使勞動力再生產出來，必須先要讓勞動者能够生

活下去。（勞動力與其他商品不同，它不是從生產過程中生產出來，而是從生活過程中生產出來的。）所以，勞動者（及其家屬）的生活費用，就相當於生產勞動力（或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社會勞動時間。這筆生活費用的多寡，是因各國經濟水準的不同而異的。資本家買到勞動力後，當然要利用它的使用價值（即勞動），就命勞動者從事生產，假定說，要他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本來，勞動者每天工作六小時，他所生產出來的價值，已經相當於資本家給他的生活費用了，這部份勞動稱爲『必要勞動時間』（Necessary labour time）。然而，資本家猶不以爲足，要他再繼續生產六小時，這六小時，則稱爲『剩餘勞動時間』（Surplus labour time）。在剩餘勞動時間內所生產出來的商品，當然也創造了同樣的價值，但資本家對於這部份剩餘勞動，并不給予工資，這未付工資部份的剩餘勞動，就盡爲資本家所剝削，馬克思稱這剝削的部份爲剩餘價值

　　至於剩餘價值的剝削程度，可從可變資本（已付工資者）與剩餘價值（未付工資者）的比率中求出。照上面的例子，可變資本與剩餘價值的比率爲六．六，所以，它的剩餘價值率即爲百分之百。如果以V代表可變資本，以S代表剩餘價值，則剩餘價值率即爲S/V。這

就是馬克思剩餘價值說的基本公式

四　資本彙積說

剩餘價值既只能從資本流轉過程中產生出來，因而，資本的存在，是產生剩餘價值的前提。馬克思認爲：資本的成長，具備着兩個必要的歷史條件：第一，在一個比較發達的商品生產制度下，少數人彙聚了大宗的貨幣。第二，「自由」勞動者的存在。這兒所謂的「自由」，意味着二個特點，一方面，在出賣勞動力的時候，他們沒有一點約束，亦即勞動力的出賣是自由的；另方面，在從事生產的時候，他們既沒有土地，也沒有一般生產手段，換言之，他們是無產階級，除了出賣勞動力外，他們就無法取得生存，他們可被資本家自由地利用。因爲在客觀上存在着這兩個歷史條件，才使資本的成長，有了實現的可能。由此可見：資本的流轉過程，就是剩餘價值的剝削過程。馬克思認爲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剩餘價值的剝削形態（即增殖過程），不外兩種：一種是延長工作時間；另一種是縮短必要的工作時間。前者的剝削所得，他稱爲「絕對剩餘價值」(Absolute Surplus Value)，後者的剝削所得則稱

爲『相對剩餘價值』(Relative Surplus Value)。但不管資本家採行那一種剝削形態，他們剝削的目的，無非爲了資本累積，也就是說，爲了把一部份剩餘價值轉化爲資本。

在這兒，馬克思指出了庸俗經濟學上的謬論。他認爲所謂剩餘價值轉化爲資本，並不是指它全部轉化爲可變資本，而是說它以一部份轉化爲可變資本，以另一部份轉化爲生產手段（不變資本）的。所以，資本愈累積，不變資本在全部資本中所佔的比例也愈高（亦即馬克思所謂『資本的有機構成』Organic Composition of Capital 愈高），機器慢慢替代了人力。於是，一方面，資本與財富高度集中在少數人手裏，另方面，又產生了貧困與失業。在資本主義社會裏，『產業後備軍』的隊伍就愈擴愈大，造成了『相對的勞動過剩』或『資本主義的人口過剩』現象。這就是馬克思的資本累積說。在『資本論』中，他有這樣一段：

『這個產業後備軍的隊伍愈廣，全部的剩餘人口也愈大。困窘的勞工階級與產業後備軍愈多，公開的貧窮現象也愈深刻。這就是資本累積的絕對法則。』（『資本論』卷一）

因而，馬克思的資本累積與貧窮累積說是並立的。他告訴我們：在資本主義制度裏，勞工階級是永遠被奴役，永遠沒有翻身機會的。他說：

「在資本主義制度裏，……一切發展生產的手段，都變成了奴役與剝削生產者的工具。‥。它們使勞動者降爲機器的附屬品，：．使他們在勞動過程中，屈辱於一種專制主義之下。」（見『資本論』卷一）

又說：

「剝削剩餘價値的方法，同時，又變成了纍積剩餘價値的方法。剩餘價値的纍積每擴大一次，剝削剩餘價値的方法也發展一次。所以，隨着資本的纍積，勞工階級的命運將日趨惡劣，不管他們的工資所得究有多少。……相對於資本的纍積，就是貧困的纍積。所以，在一個極端，是財富的纍積；同時，在相反的極端，是貧困，勞苦，奴役，愚昧，粗魯與智力墮落的纍積。」（同上）

然而，資本通過這種方式而成長或纍積，是假定已經具備了上述二個歷史條件的。現在應該追問上去：第一，爲什麼少數人會纍積大宗貨幣呢？也就是說，這少數人的大宗貨幣是從那兒得來的呢？第二，爲什麼大批無產階級除了出賣勞動力以外，就無法取得生存了呢？這兩個問題，就歸結到一點：資本家從那裏得來這筆原始資本的呢？

馬克思在這方面，又發掘出一條偉大的社會經濟眞理。他認爲原始的資本，不是由於節

慾，不是由於儲蓄或由於個人的勤勞，而是由於暴力的刼掠。暴力(Force)刼去了勞動者的生產手段，暴力刼去了農民的土地。暴力使少數人累積了大宗貨幣，暴力使多數人降爲『自由』的無產階級，暴力創造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兩個前提條件。這就是馬克思的原始累積說(Primitive Accumulation)或原始資本累積說。

從資本累積的一般過程，馬克思又申述了資本主義累積過程的歷史趨勢。他最後的結論是：資本主義必然自掘了坟墓。他說：

『在資本累積過程中，由於盤剝與壟斷，資本家的人數逐漸減少，而羣衆所受的貧苦，壓迫，奴役，凌辱與剝削却隨着增長，同時，勞工階級的叛抗情緒也日益高漲。這個勞工階級的人數一直在增加，他們就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這個機構裏，把自己訓練、團結與組織了起來。資本的獨佔變成了生產方式的桎梏。而生產方式又是伴隨着資本獨佔而發育成長的。到最後，生產手段的集中化與勞動的社會化就發展到一種程度，使它們與資本主義的外殼變成不能相容了。資本主義的外殼終於爆裂開來。這時，資本主義私有財產的喪鐘敲響了，剝削者被剝削了！』（『資本論』卷一）

所以，馬克思認爲，根據資本主義累積的一般法則，可以斷定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是

五　馬克思經濟學說的貢獻

前述三節，僅祇介紹了馬克思經濟學說的精義。他的經濟理論體系，不僅博大深邃，並且天衣無縫。『資本論』之所以成爲『勞動階級的聖經』，決不是因爲馬克思用了巧辭妙語，來替勞動階級說話；而是因爲他有無比的聰穎、才華與眞知灼見，他眞正洞察了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他把客觀存在着的社會經濟法則一點也不歪曲地敍述了出來。馬克思所敍述的，不僅是他個人的經濟理論，並且是社會的全體的經濟理論。這才是『資本論』不朽的地方。美國一位權威敎授薛里格曼（F. R. A. Seligman），也不得不這樣承認：『馬克思對於工業社會的分析，不管我們承認與否，但我們可以確定地說，也許除了李嘉圖以外，在經濟科學的全部歷史上，再沒有人比他有更多的創見，更多的卓識與更多的眞知了！』（見薛氏所著『經濟史觀』）

第六節　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價值

上面三節，我們分別敍述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體系，政治學體系與經濟學體系。當然，這三者是渾然爲一，不可割裂的。馬克思主義所以成爲一種科學，就因爲它是一套貫串全宇宙、全世界、全人類現實境界的眞理。所以，社會主義發展到馬克思主義，已不再是一種烏托邦，而是一種科學了！誠如列寧所說：

『馬克思是第一個把社會主義從一種烏托邦變爲一種科學！它使這個科學奠下了堅實的基礎，它指示了這個科學必然趨向的道路，它更使這個科學在每個細節上都有了更大的發展。』（見氏所著『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主義』）

其次，馬克思主義之所以成爲一種社會主義的科學，也不僅因爲它昭示了『社會改造的必要』，並且因爲它把社會主義的實現，看成『歷史發展的必然』。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一種抽象的理想主義或絕對的理性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理想，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馬克思主義的理性，也不是絕對的，而是現實的。具體的理想主義與現實的理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

根本不同於烏托邦主義的地方。因爲馬克思主義是具體的，現實的，它才會變成客觀的眞理，而不是一種主觀的空想！

馬克思主義旣是客觀的眞理，因而，它是唯一科學的社會主義。離開了馬克思主義，任何社會主義的思想，不是一種『空想』，就是一種『妄想』，不是『無知的幼稚』，就是『故意的歪曲』。馬克思主義所以經得起時代的大考驗，就因爲它是眞正反映時代的科學思想。馬克思主義不僅是一大套社會哲學，更是名符其實的社會科學。馬克思與馬克思主義在社會主義思想史，甚至在科學思想史上的地位，是無與倫比的。拉斯基敎授說得很對：『在社會思想史上，沒有人的地位會比馬克思更卓越了。』

第三章　修正的社會主義——改良主義（Revisionism）

第一節　費邊主義

一　費邊社的成立及其時代背景

從『共產黨宣言』發表（一八四八年）到俄國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年），這整整七十年間，一方面，科學的社會主義像初升的旭日，照耀全歐，另方面，各種修正的社會主義思想，又像黃昏的夕陽，射放各色的晚霞。

在許許多多畸形的社會主義思想中，有些自命爲馬克思主義的正統，也有些狂稱爲最科學的社會主義；有些是和平主義的，有些是機會主義的，有些是冒險主義的，也有些是中庸主義的。其中，影響最大者，當推英國的費邊主義（Fabianism）與基爾特社會主義（Guild

Socialism），德國的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與改良主義（Revisionism），俄國的無政府主義（Anarchism）與法國的工團主義（Syndicalism）。本節介紹費邊主義，以下四節再分別敍述其他各種修正的社會主義。

到十九世紀八十年代，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種籽，已在英國慢慢散播開來。但當時實際接觸得到馬克思的著述的，還限於少數能讀德文或法文的智識份子。一八八一年，在漢德曼（Henry M. Handman，一八四二——一九二一年）努力之下，成立了『社會民主聯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鼓吹社會主義思想。所以，從九十年代起，英國才眞正進入馬克思主義的啓蒙時期。

就在這個時候，一批熱情好學的知識青年，常常聚在一起，共同研究倫理問題。一八八一年，湯麥斯・戴維德森教授（Thomas Davidson）從美國回來，在倫敦碰到這批青年，深受他們的愛戴。他是蘇格蘭人，他抱有無政府共產主義的倫理思想，由於他的影響，他們在一八八三年創立了『新生活聯誼社』(Fellowship of the New Life)。他們的宗旨，在替人類的生活，找尋一個最高的倫理原則。過了幾個月，這十幾位青年，覺悟到社會改良工作的重

要，並作一番自我的改造。他們開始研究社會問題，他們想再成立一個組織，來發表他們的社會主張。

一八八四年一月四日，他們正式創立了費邊社（The Fabian Society）。該社定名為『費邊』，是想學取古羅馬費邊阿司大將（Fabius，紀元前？——二〇三年）的戰術。他們的信條是：『你必須等待着成熟的時期，就像費邊阿司抗禦漢尼拔（Hannibal，紀元前二四七——一八三年）的時候那樣的堅韌，儘管許多人譴責他的迂迴；然而，當時機一到，你必須也要像費邊阿司那樣的猛力作戰，否則，你的等待將會化為泡影而沒有一點收穫。』

簡而言之，費邊社的信條，不外『欲速不達，伺機而發』。從字面看，似乎娓娓動聽，但在實際上，正如英國近代大歷史學家威爾斯（H.G. Wells）所指出：費邊阿司就從來沒有猛力作戰過！

費邊社成立不久，當代文豪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一八五六——）就參加進來。第二年，韋柏（Sidney Webb，一八五九——一九四七年）也繼蕭翁之後，列為該社社員。他倆才氣縱橫，不僅在社內領導羣倫，並且向社外宣揚費邊主義。圍繞着蕭、韋兩氏

的，還有不少優秀的碩學之士，如奥列維（Sidney Olivier），華拉斯(Graham Wallas)。貝桑夫人（Mrs. Annie Besant）、勃蘭德（Hubert Bland）與克拉克（William Clarke）等。直到今天，費邊社的主張，還足影響英國的文壇與思想界。許多知名的學者，如拉斯基、柯爾(G.D.H.Cole)等，現在都是費邊社的社員。

在二十世紀以前，像蕭、韋之輩，雖接觸了馬克思主義，但對馬克思的經濟學說，還理解得不够深切，他們甚至對於勞動價値說，尙表反對。他們深受十九世紀哲學激進派（The Philosophical Radicals）的薰染，想使英國的自由主義從功利主義裏解放出來。有好些地方，初期的費邊主義，竟可視爲邊沁主義的拷貝。邊沁反對地主寡頭政治，蕭、韋兩氏也反對資產階級寡頭政治；邊沁主義的公式是『最大多數的最大快樂』，費邊主義的公式也是『最大多數的最大效率』（The greatest efficiency of the greatest number）。但費邊主義畢竟不同於邊沁主義，因爲，它除了囿於傳統的自由主義，還多少標榜了一些社會主義。一八八七年，該社所訂的宗旨的第一句，就說『費邊社由社會主義者所組成』，另外還有下面五大要點：

一、社會的改造，賴於土地與工業資本的解放，以謀全體的福澤。

二、廢除土地私有權及地租。

三、工業資本設法移歸社會所有。

四、確立男女平等的公民權。

五、研究並宣揚社會主義。

這些基本宗旨，至今還是費邊社的綱領。它雖也捧出了社會主義，但沒有提到階級鬪爭，沒有提到無產階級專政，甚至也沒有乾脆地提到推翻資本主義社會來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所以，費邊主義，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一種，它是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思想的滲合。如果稱它爲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或個人主義（自由主義）的社會主義，倒是十分恰當的。

當然，費邊主義的調和傾向，也有着它的特殊的時代背景的。因爲，在十九世紀末葉，個人主義的功利思想，還支配着當時英國的知識份子；同時，社會主義的革命思想，也隨着興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散佈而普遍起來。少數敏感的開明知識份子，一面矜持於個人的社

會身份，一面又痛惜工業資本社會的罪惡，在心理與時代雙重矛盾的交戰下，終於孕育出半自由主義與半社會主義的費邊主義來了。關於這點，在下文還要補充說明。

二　奧文・馬克思・韋柏

蕭伯納與韋柏雖同為費邊社的台柱，但費邊主義的理論體系，却是韋柏夫婦所建立的。韋柏主義在奧文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之後，我們可把他的思想源流追溯出來。

在奧文時代，英國的勞動階級還沒有完全組織起來，他們並沒有濃烈的階級意識。當時的政府，又盡為地主寡頭所操縱，國家變成了統治階級剝削工具——一種戰爭與徵稅的工具。社會改良與公共福利事業，並不是國家份內的工作。國會與工會，都不能真正擔負起民主改造的重任。在當時，奧文痛恨現狀，却不能領導一支聲勢浩大的社會力量（他曾這樣努力過），來改變現狀。他雖認為一個合理的社會，應該從競爭進為合作，應該從私有財產制度進為共產制度，然而，他覺得這個社會改造的責任，應該落在一個理性主義的英雄身上。這個英雄要多才多藝，要為人民所敬愛，才能完成他的時代任務。

到馬克思時代，英國的勞動階級，不僅有了團結，並且有了統一的工會組織（英國總工會成立於一八六八年），勞動階級的階級意識已經非常强烈。爲了爭取政治的與經濟的解放，勞動階級已經表現了無比强大的力量，在工廠立法與社會立法上，勞動階級已經贏得了某種程度的勝利。再加社會財富日益集中，階級對立日益尖銳，無產階級陣營日益壯大，在說明了階級鬪爭的不可避免、資本主義的必然崩潰與無產階級的最後勝利。

從馬克思時代到韋柏時代（約從十九世紀中葉至十九世紀末葉），英國社會經濟顯然起了巨大的變化。一方面，英國已從工業資本主義發展爲金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它意味着獨佔資本勢力的伸長；另方面，勞動階級已爭取到選舉權與工會的合法地位（一八七一年，『工會條例』正式在國會通過），無產階級的力量也已相對地强壯起來，並且形成了一支不可動搖，不可壓服的社會力量了。換言之，英國階級鬪爭的形勢，已快發展到短刀相接的階段了。對獨佔資本集團而言，這當然是一個極其險惡的形勢，在韋柏那本『資本主義文明的衰亡』(The Decay of Capitalist Civilization) 上，也曾予以無情的揭穿。爲了拯救破產了的資本主義制度，資產階級不惜在政治上與經濟上作了較大的讓步，要想冲淡勞動階級的

鬬爭意識，減少絕對剩餘價值的剝削，加强相對剩餘價值的剝削。在表面上，工人的生活，似乎有了部份的改善，然而，在骨子裏，剩餘價值剝削的總和，並沒有實質的減少。可是，費邊主義者即抓住了表象，自作聰明地『修正』了馬克思主義，以爲用不着社會革命或階級鬬爭，勞動階級的經濟生活，同樣可以改善。他們把形式看成了內容，更將資本主義最後掙扎的狡黠技倆當成了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理想手段，豈不等於『守株待兔』嗎？

這就是費邊主義所反映的英國社會經濟的時代背景。如果說，奧文主義代表了人類理性的覺悟運動；馬克思主義又代表了勞動階級的解放運動；那麼，韋柏主義可說代表了中、小資產階級的妥協運動！

三　費邊主義的理論基礎

上文提到，費邊主義的理論體系，是由韋柏夫婦所建立的。但韋柏主義還沒有系統化，在他倆卷帙浩瀚的著述中，最主要的，有『工業民主主義』(The Industrial Democracy)、『工會主義史』（或譯『工會運動史』）(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消費者合作運

動』（The Consumer's Cooperative Movement），『英國社會主義共和國憲章』（A Constitution for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of Great Britain），『英國地方政府』(English Local Government）與『蘇維埃共產主義』(Soviet Communism）等。除了他倆的著作，『費邊社小冊子』（The Fabian Tracts）共有幾百冊，也是研究費邊主義的直接資料。

費邊主義的中心理論，主要不外三點：它的歷史演化論，它的工業民主主義與它的社會改良主義。現在分別敘述如下：

第一，費邊主義的歷史觀，並不是唯物史觀。韋柏認爲：『歷史上並沒有突變』，從一個舊社會到一個新社會，不過是一個徐緩的演化過程。他雖說過『這個世紀的經濟史幾乎可說是社會主義繼續進化的記錄』，但他始終覺得：社會主義的發展，祇是民主主義勝利的後果。他以爲通過政治的改進，可以實現經濟的平等。他曾提出社會改造的四大原則：（一）民主的（Democratic），（二）漸進的（Gradual），（三）和平的（Peaceful），（四）合乎憲政的（Constitutional）。因而，他反對推翻現狀，主張在現社會裏從事改革。換言之，他覺得應該在資本主義社會裏慢慢推動社會主義的改革工作。他甚至把『民主主義理想的經濟方面』，

看成了『社會主義的本體』！他雖指陳了工業革命後個人主義的專橫，但他並沒有把私有財產的否定視爲社會改造的先決條件。他覺得國家經濟的强化，就是私人經濟的削弱。他甚至認爲米爾(John Stuart Mill，一七七三——一八三六年)『政治經濟學原理』(The Principle of Political Economy)的問世，已給個人主義經濟學作了一次淸算(該書初版於一八四八年)。從那時起，英國政治已經慢慢轉向了社會主義。所以，他以爲英國將來完成社會主義的建設，不會是社會突變的結果，而是民主主義發展的結果，這就是韋柏主義的歷史演化論。

第二，費邊主義的工業理論，可名之爲工業的民主主義。韋柏夫婦的『工業民主主義』一書，雖說是『對英國工會的一個科學的分析』(該書『自序』)，但他倆似乎太冷靜了，他倆既沒有重視無產階級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憎恨，也沒有明朗地繪出工業民主主義的具體面貌，祇是含糊其辭地得出一個這樣的結論：『根據我們的分析，可知工會運動不僅是現在階段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偶發事件，並且是一個民主國家裏應有的永久機能。如果資本主義朝着大托辣斯化的方向發展，那麼，每個國家的工會組織，將是抗拒社會壓迫的唯一有力的堡壘。』儘管費邊主義者同情工會運動，那也祇是『同情』而已。因爲，他們祇同情工人『抗

拒』大托辣斯化，却不同情工人『推翻』大托辣斯化！他們認爲工廠立法（Factory Legislation）是保護工人利益與剷除資本主義的唯一合法手段，也就是達到工業民主主義的最有效的程序。他們雖也攻訐資本主義的工業制度，却不主張馬上工業國營，他們並沒有把一切生產手段的國有作爲工業民主主義的最大保障。總之一句話，費邊主義的工業民主主義，祇是英國巴力門主義（Parliamentarianism）的擴大而已。

第三，費邊主義的經濟綱領，決不能稱爲社會革命主義，它是一種澈頭澈尾的社會改良主義。在費邊主義的經濟學裏，一方面，土地私有權被視爲萬惡之源；另方面，地租（即經濟地租）又被認爲最高的剝削形態。費邊主義者不僅沒有意識到剩餘價值的眞理，甚至對勞動價值說與工資鐵律亦深表懷疑。因而，他們反對無產階級革命與階級鬭爭，他們主張用和平的方式從事社會改良。他們把社會主義看成工業與社會發展的一種『趨勢』，並不認爲無產階級專政是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階段。有些人還把費邊主義另稱爲『溫和的社會主義』（Mild Socialism）。

上述三點，就是費邊主義的精髓。這種修正的社會主義思想，似乎頗爲英國甚至世界少

數智識份子所歌頌，但它的實際政治影響，總是有限的。因爲，這種和平主義的學說，是絕對不能取信於勞動階級的！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工廠立法與巴力門主義由來久矣，但工人階級的經濟生活與政治生活，實質上並無眞正的改善，費邊主義者硬把舊調重彈，又怎麼打得動勞動階級的心弦呢？

此外，費邊主義還有『一個更大的缺點，就是沒有一種國際主義的想法。』(見『費邊小册子』)對於這一點，韋柏也不得不加承認，他說：『我們旣沒有關心到歐洲大陸上的社會主義運動，也沒有一點國際上的聯繫，……我們除了研究普魯東、拉薩爾與馬克思以外，……在實際上，幾乎對國際社會主義所發生的事件茫然無知。……我們有自己的國際主義，我們很少同情天下一家的大同主義。』(見『費邊小册子』)韋柏的自白，也就是費邊主義的自我諷刺。社會主義並不是狹義的韋柏式的工會主義，它更是廣義的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費邊主義旣得不到國內無產階級的支持，又沒有天下一家的大同主義，它之爲一種社會主義，顯然是自相矛盾了。所以，我們說它是一種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調和思想。至於在實際政治上，英國工黨就是費邊主義的具體標誌。

第二節　社會民主主義與改良主義

一　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與拉薩爾

在各種修正的社會主義中，國際影響最大的，當推德國的改良主義。它與英國的費邊主義一樣，也產生於十九世紀九十年代。在說明改良主義的時代背景以前，應把德國的社會民主運動追敘一下。

德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實際始於一八四八年的革命時代。從一八四八年至一八六二年，是德國革命運動的高潮時期。誠如道森(W. H. Dawson)所說：『德國的社會主義是從這幾年的痙攣與騷亂中孕育出來的。』（『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與拉薩爾』German Socialism and F. Lassalle)

在這些年頭，工會運動與合作運動，風起雲湧，聲勢日益壯大。一八六二年，一個統一的進步政黨，在拉薩爾（Ferdinand Lassalle，一八二五——一八六四年）的領導之下，終

於正式出現了。

拉薩爾是德國社會民主運動之父。他出身富商之家，學生時代，偏愛神學與哲學，曾被目爲『神童』。德國詩人海涅（H. Heine，一七九七——一八五六年）還這樣寫過：『我的好朋友拉薩爾是一位具有最傑出的智慧的靑年。』

一八四八年時，拉薩爾認識了馬克思，並替『萊茵日報』撰稿，普魯士政府視爲叛徒。一八四九年，被捕下獄，囚禁半年。五十年代是一個革命低潮的時代，他閉戶著述。一八六二年，他在柏林演講『憲政的本質』，公然指斥在普魯士專制政治下是以『權力作爲憲政的基礎的』。他號召進步的自由主義者用行動來推翻專制政府，再重建民主憲政基礎。同年四月十二日，他又在柏林技工協會演說，演辭後以『工人綱領』爲題，印成一本小册子，流行極廣。這本小册子的內容，頗多取自『共產黨宣言』，同樣强調了無產階級在未來政治上的領導地位。所以，一八六二年四月十二日，常被稱爲『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的誕辰』。到一八六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全德勞工協會始告成立，拉薩爾是該會的實際領導人。祇有一年光景，會員已增爲十萬人，在德國政治史上，它可說是第一個最大的政黨組織。道森說得很對：

「在拉薩爾參加政治生活以前，德國工人還沒有什麽組織，他們就像失了羣的羔羊。拉薩爾把他們團結起來，第一次成立了一個名符其實的工黨。」

然而，拉薩爾的社會民主主義，並不是科學的社會主義。拉薩爾有革命的熱情，有社會的理想，也有政治的組織力，但他缺乏冷靜，缺乏理智，缺乏客觀。他還迷信資本主義式的議會制度，他更認爲工廠制度的發展，足以增强勞工階級在政治上的潛在力量，祇要時機成熟，無產階級就可依循憲政常軌，取得政權。他雖創立了『工資鐵律』（謂工人所得的工資，永遠不會超過一個維持最低生計的水準，李嘉圖也有此說），但他與羅德柏特（Karl Johann Rodbertus，一八〇五——一八七五年）一樣，反對階級鬥爭，主張普選運動。所以，拉薩爾主義代表了浪漫主義、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調和思想，熱情有餘，而理智不足。試問：在俾斯麥（Otto Eduard Leopold Bismarck，一八一五——一八九八年）的獨裁統治下，拉薩爾侈談普選，豈不等於與虎謀皮嗎？

一八六四年八月，拉薩爾因失戀而與情敵決鬬，傷重致死。這不僅是拉薩爾個人的生命悲劇，並且是德國社會運動的無可補償的損失。

二 從哥塔綱領到埃福綱領

拉薩爾的驟逝，使德國的勞工運動失去了中心的領導，一切革命工作，幾陷停頓。直到一八六六年，在老李卜克尼希（Wilhelm Liebknecht 一八二六——一九〇〇年）與貝貝爾（August Bebel，一八四〇——一九一三年）奔走之下，全德勞工協會才重獲生氣。一八六九年，該會解散，正式改組爲社會民主勞工黨，並與第一國際發生聯繫。

從一八六九年起，社會民主勞工黨一直受到黑暗政治的迫害，少數該黨領袖，或屈於威武，或淫於富貴，漸與國際勞工運動疏遠起來。一八七五年，該黨發佈了頗爲轟動的『哥塔綱領』（Gotha Programme），其原旨如下：

（一）勞動是一切財富的來源，一切生產應歸社會所有。人人工作，各取所需。現在，資產階級掌有一切勞動工具，爲求勞動解放，須使一切勞動工具變成社會公產。

（二）在這些原則下，本黨主張採用一切合法的手段建立自由國家與社會主義社會，推翻工資鐵律及一切社會上與政治上的不平等。本黨的工作，限於國內，但對勞工運動的國際性

與人類同胞愛的實踐，亦不忽視。我們要求建立社會主義的生產合作社，該社應由國家予以協助，並在勞工階級的民主管理之下

(三)本黨以下列諸點爲基本政綱：

(A)實行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選舉投票制。

(B)由人民直接立法。戰爭與和平問題，由人民公決。

(C)實行普遍軍訓，建立人民軍。

(D)取消有違出版自由、工會自由與集會自由的法令。

(E)實施普遍的、平等的與强迫的教育制。

(F)由人民管理司法。

(四)本黨的其他主張如下：

(A)擴大選舉權。

(B)實行單一累進所得稅制。

(C)結社絕對自由。

(D)斟酌社會需要情形，規定正常勞動時間。

(E)廢除童工制與有礙健康的女工制。

(F)創制工廠調查法，煤礦調查法等。

(G)立法保護勞工的生命與健康。

這個『哥塔綱領』，可謂『四不相』，它滲合了國家主義與民主主義的思想，也夾雜些社會主義與拉薩爾主義的原則。一方面，它超然於國際勞工運動之外；另方面，它又不安於國內的現狀，充份顯示了機會主義的作風。它本想左右逢源，結果兩不討好。馬克思曾予以無情地揭穿：

『運動朝前多走一步，比有一打的政綱，還要來得重要。……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與共產主義社會制度之間，存在着一段革命轉變的時期。這段時期，相當於政治的過渡時期，除了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外，就再沒有其他方式。』（見『哥塔綱領批判』）

嚴格說來『哥塔綱領』的本質，祇能說是一種國家社會主義，它與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顯然是背離的。由於俾斯麥政權的極度反動，甚至連這樣落後的社會主義政綱也深懷戒

心。於一八七八年。普魯士政府頒行了『反社會主義法』，德國社會民主黨又進入一個新的考驗時期。

從一八七八年到一八九一年，社會民主黨內部裂成兩派。一派主張維持現狀，與政府妥協；另一派堅持革命立場，奮鬪不懈。羣衆永遠站在革命的一邊，老李卜克尼希與貝貝爾又告勝利，一八九一年，黨內革新，並發表了『埃福綱領』(Das Erfurter Programme)。儘管這個綱領並沒有接受剩餘價値學說，但它所指出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法則，顯然依據馬克思的經濟學說的。茲將這個綱領的要義，摘譯如下：

『布爾喬亞社會的經濟發展，必然導致小生產制度的崩潰。結果，勞動者將與生產手段分離，使他們變成了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同時，生產手段則爲極少數大資本家與大地主所壟斷。隨着大生產制度的發展，生產手段將愈形集中。無產階級的人數日增，過剩勞動愈多，剝削者與被剝削者之間鴻溝愈深，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鬪爭也愈烈，遂使近代社會裂爲兩大敵對陣營，它變成了一切工業國家的共同特徵。

『資本主義生產方法所帶來的經濟恐慌，將使貧者更貧，富者更富。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已經

跨越了現階段的社會發展，生產手段的私有已經不能與生產力的合理使用與充份發展相適應了！祇有把私有的生產手段——土地、礦坑、原料、工具、機器、交通工具——變爲社會財產，祇有把商品的生產變爲社會主義的生產，才能使繼續增大的社會勞動生產力，成爲最高幸福與和諧發展的泉源！

『這個社會改造，不僅意味着無產階級的解放，並且意味着全人類的解放。然而，勞動階級抗拒資本主義剝削的鬪爭，必然是一次政治鬪爭。沒有政治權力，勞動階級就無法進行經濟鬪爭，也無法發展經濟組織。勞動階級如果得不到政權，是不可能把生產手段轉爲社會公產的！』

最後，這個綱領也像『共產黨宣言』一樣，强調階級意識，强調勞工運動的國際性。然而，在另一方面，這個綱領的具體政治主張，又有許多地方是抄襲『哥塔綱領』的，祇是條目更其詳密而已。所以，『埃福綱領』把『共產黨宣言』與『哥塔綱領』併湊在一起，也未免有些不倫不類。

從拉薩爾主義到哥塔綱領，再到埃福綱領，象徵了德國社會經濟的動盪和社會主義思想的掙扎與徬徨。這徬徨的社會主義思想，就匯成了柏斯泰因的改良主義。

三　柏斯泰因的改良主義

柏斯泰因（Eduard Bernstein，一八五〇——一九三二年）是德國改良主義的理論家，他畢業於體育專科學校，十六歲時進銀行工作。一八七二年，加入社會民主黨，從那時起，就替德國社會主義報紙『將來報』（Die Zukunft）撰稿。一八七八年，離開銀行，爲該報負責人的私人祕書。這一年，『反社會主義法』頒佈，他潛逃出境，在國外過了二十年流亡生活。他一直担任沮利區(Zurich)的『社會民主報』編輯。該報偷偷運德暢銷，影響極大。普魯士當局轉請瑞士政府，逐他離境，他再到倫敦。在倫敦的這段日子裏，他潛心研究社會主義的理論與歷史。他結識了恩格斯，他與費邊社的人物過往甚密。一八九九年，他發表了『社會主義的前提』(Voraussetzungen des Socialismus)，混雜了馬克思主義與費邊主義的思想。一九〇〇年，他重回德國，儼然爲改良主義學派的大師。在當時的歐洲，激起了猛烈的社會思想論戰。站在柏斯泰因這邊的，有桑巴特(Werner Sombart)、奧本海茂（Franz Oppenheimer）與吐根·巴倫諾夫斯基(Tugan-Baranovsky)；而站在反改良主義那邊的，

有考茨基(Karl Kautsky)、漢德曼。盧賓諾夫(I. M. Rubinov)等,這個論戰,一直延續到上次大戰前夕。

柏斯泰因改良主義的要旨,可以歸納爲下列六點·

第一,關於唯物史觀。柏斯泰因認爲『歷史的發展,不僅決定於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並且決定於法律,道德,歷史與宗教傳統以及地理與自然環境』。

第二,關於價値學說。柏斯泰因認爲馬克思的勞動價値學說不僅『抽象』,且與『現實脫節』。他覺得剩餘價値在社會裏是一種經驗的事實,它可從少數人的不勞而獲中看出,用不着其他的理論說明了。

第三,關於財富集中。柏斯泰因認爲工業生產資本還沒有完全集中。他一方面承認財富集中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趨勢』,說·『利潤率的下降是事實,生產過剩與經濟恐慌的存在是事實,資本的週期減退是事實,工業資本的集中也是事實』;然而,在另一方面,他竟認爲『普通所謂的托辣斯,並不是屬於極少數資本家,而是屬於成千成萬的股東的』!

第四,關於社會進化。柏斯泰因認爲社會還沒有進化到階級敵對的階段,他說:『社會

財富的鉅量增加，並沒有伴隨着大資本家數目的減少，而是伴隨着大、小資本家人數的增加。中產階級改變了他們的性格，但他們並沒有從社會裏消滅掉。』他又覺得，勞工運動的高漲，足以抗拒資本階級的剝削。他說：『工廠立法，地方政府的民主化與其職權的擴大，工會運動與合作制度的自由……都顯示了這一階段的進化。所以，近代國家的政治制度愈民主化，政治大變亂的機會與要求，也就愈加減少。』

第五，關於資本主義危機。柏斯泰因認爲資本主義制度還不會崩潰。他甚至還說道：『至少再隔一個時期，還不致於爆發從前那樣的經濟恐慌。』

第六，關於實現社會主義。柏斯泰因認爲大工業全部社會化與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都還沒有成熟，祇有合作制度（包括生產合作及消費合作）與民主政治，才足實現社會主義。同時，他又覺得『一切社會主義政策的目的……都爲了發展與保障一個自由的人格』。換言之，他把社會主義看成了自由主義的邏輯發展。他還這樣說：『我不能相信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但我堅決相信社會主義運動與勞工階級的前進，他們一步步從事解放，使社會從一個資本地主的寡頭政治改變爲一個眞正的民主政治。』（以上引語均見『社會主義的前提』）

上面六點，就是柏斯泰因的社會主義思想。他並沒有完全『否定』馬克思主義，而是站在自由主義的觀點，『修正』了馬克思主義。以他為首的這一派，自命為改良主義學派，他們以為自己的社會主張較馬克思主義為『良』！然而，我們細細推敲一番，就會發現，原來所謂改良主義，不過是東抄西襲，七併八湊的雜貨！講到唯物史觀，馬、恩兩氏也沒有忽視過經濟以外的因素，祇是把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認為決定歷史發展的主導因素而已。講到價值學說，馬克思的抽象勞動是相對於具體勞動而言的，這個學說，非但沒有與現實脫節，並且是社會現實的反映。講到財富集中，柏斯泰因一方面承認有這樣的『趨勢』，另方面又說托辣斯不為少數人所獨佔，眞可謂自相矛盾。講到社會進化，他更信口雌黃。明明『大魚』在吃『小魚』，他却說『小魚』會變『大魚』；明明勞工運動的高漲，意味着政治變亂的滋長，他却硬把因果倒置。講到資本主義的危機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崩潰，這已經變成了一種常識，他偏偏裝聾作啞。再講到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關係，這更不是柏斯泰因的創見，英國的費邊會與德國的社會民主黨已經有言在先了。

所以，柏斯泰因的改良主義，既不能自圓其說，亦不成一家之說。改良主義之所以風靡

一時，無非它是各種修正的社會主義思想的總匯，也就是因爲它能反映各式各樣的小資產階級的社會幻想。唯其如此，它才受到小資產階級的普遍寵愛。然而，科學的社會主義眞理，祇有一個。儘管有人稱柏斯泰因的改良主義爲『進化的社會主義』(Evolutionary Socialism)，可是，半個世紀以來社會主義的發展史，已把改良主義證明爲『退化的社會主義』了！

四　考茨基的社會化綱領

考茨基(Karl Johann Kautsky，一八五四——一九三八年)曾經是反改良主義的主將，他的早期著作，每被視爲馬克思主義的正統。他的主要著述，有『無產階級專政』(Die Diktatur des Proletariats)，『無產階級革命』(Die proletarische Revolution)與『馬克思的經濟學說』(Karl Marx, Okonomische lehren)。他在一九〇二年，曾大刀闊斧地予改良主義者一個迎頭痛擊。他說：『馬克思與恩格斯所指出的經濟發展的方向，這許多年來，從事態的發展過程中，已經有了偉大的證實。』(見『社會革命』)又說：『勞動價值說是經得起考驗的。它使我們對於資本主義的生產法則有一個深入的認識，遠過於任何其他學說。

所以，我們必須承認勞動價值是一個現實。』（見『無產階級革命』）

儘管在馬克思經濟學說方面，考茨基與改良主義者站在完全相反的地位，然而，在革命戰略方面，考茨基又調和了馬克思主義與改良主義。考茨基認爲社會主義的實現，也須經過一次革命，這一點，與柏斯泰因的和平改良說，稍有不同。然而，考茨基的所謂革命，不一定就指一種暴力(Violence)，而指一切形式的政治改造，但這種改造的結果，必須使被壓迫者控制政權。他甚至認爲，無產階級與其用暴力革命，還不如用和平手段從事革命。他覺得巴力門主義、罷工與言論自由，反使革命的成功有着更大的可能。基於這樣的觀點，他設想一旦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首先要把選舉權擴大給每一個公民，保障言論自由與集會自由和廢除一切遺產制與軍國主義。』(見『社會革命』)到那時，他認爲租稅制度將根本改造，政府的支出，將靠累進所得稅與財產稅的收入。同時，教員待遇要提高，孩童也將受到平等的教養。最後，他提出了一大套『社會化綱領』(Sozialisierung)，主張一部份廠礦應由國家賣給生產者，用生產合作方式來經營。而鐵路、航運、鋼鐵廠、機器廠等獨佔企業，則歸國家所有，至於其他企業，統歸地方政府所有。他把合作社與地方企業列爲首要，國有事

業列爲第二，對於收歸公有的企業，考茨基反對沒收，主張以公債或證券予私人以補償。此外，在考茨基所理想的社會主義社會裏，不但有貨幣，並且還有小規模的私人企業；至於農業生產，也將經過一個長時期的私人經營。

所以，考茨基的『社會化綱領』，祇能稱爲一種『漸進主義』（Gradualism），決不能稱爲一種『革命主義』。在經濟理論上，考茨基曾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而在經濟政策上，他又是馬克思主義的『異端』。他的基本錯誤，在對無產階級領導社會革命缺乏信心，他仍憧憬於中產階級所偏愛的選舉制度。他左手指罵改良主義的邪說，右手又與改良主義者握了起來，難怪列寧要斥他爲『叛徒』（renegat）了。

(b)從拉薩爾的社會民主主義到柏斯泰因的改良主義再到考茨基的漸進主義，足以顯示七十年間（約從一八六〇年至一九三〇年）德國社會主義思潮的起伏與社會主義運動的搖擺。從十九世紀中葉起，德國是社會革命思想的搖籃，也是專制反動政治的溫床。思想的鬬爭反映了革命的鬬爭；思想的掙扎與徬徨，反映了革命戰略的掙扎與徬徨。這些非驢非馬的社會改良主義既不是一帖眞正的社會革命的『良藥』，當然不能治愈德國社會的病痛。剛剛相反，由

於庸醫誤人，藥石亂投，竟使德國社會病入膏肓，終於給希特勒打出一面『國家社會主義』的旗子來，而使德國人民嘗盡了苦難！如果說，英國的費邊主義是欺騙英國人民的包着糖衣的苦丸，那末，德國的社會改良主義可說是麻醉德國人民的包着糖衣的毒丸了！

第三節　無政府主義

一　巴古寧的國家觀

直到十九世紀中葉，雖則經過了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一六八二——一七二五年）與喀德林二世（Catherine II，一七二九——一七九六年）的西方化運動，俄國還是一個經濟落後的國家。一八六一年的農奴解放令，也祇是沙皇制度下的一些粉飾的開明。這時西歐的社會思想，已經潛入帝俄的農村。然而，在絕對主義的專制統治下，不用暴力是不可能推翻現狀的。所以，恐怖的虛無主義的革命運動（一八六〇年——七〇年），就可說是沙皇政治的一種反動。這種虛無主義的革命行動滲雜了社會主義的革命思想，就形成了俄國的無

政府主義。

在第一章裏，我們曾經提到過普魯東的無政府主義。可是，無政府主義祇是首創於普魯東，到巴古寧與克魯泡特金才把它發展為一套極端主義的革命哲學。

巴古寧（Michael Bakunin，一八一四——一八七六年）是一個熱情永遠炙手的革命家。他的家庭，是顯赫一時的帝俄貴族。他的青年時代，消磨在聖彼得堡的陸軍炮兵學校裏。畢業後，服役於波蘭，他目擊沙皇統治的殘暴與士兵生活的慘苦，他不願為虎作倀，一八三八年，辭去了官職，到各國去留學了。一八四一年，在柏林專攻哲學。一八四七年，在巴黎，晤見了普魯東，深受後者的影響。從一八四八年起，他參加各國的革命運動，前後入獄八年之久。一八六〇年，逃到倫敦，繼續策劃反沙皇制度的革命工作。他曾參加第一國際，因為鼓吹國際無政府主義，終為馬克思主義者所遺棄，後被第一國際開除。他晚年多病，一八七六年死。

他的一生，不斷地遭遇着驚濤駭浪，所以，他的許多著述都中途而廢。『上帝與國家』（Dieu et L'Etat）一書，可算是他的代表作。這雖是一册薄薄的小書，却包容了一套無政府

主義的哲學。巴古寧認爲：『人類的自由，主要地包含在一點，就是：服從自然的法則。這是因爲人類自己這樣服從它，並不是任何外界的意志來强迫人類服從它的，不管這個外界的意志是人類意志抑神聖意志，也不管它是集體意志抑個人意志。』（見『上帝與國家』）他覺得祇有這樣，才能使自由問題得到澈底的解決。自然法則既是人類自己要服從它，那末，這個法則就是人類本性的法則，有了它，一切政治制度都成爲多餘的，違反自然的了。這就是巴古寧無政府主義的哲學基礎。

所以，巴古寧反對一切外鑠的權力。他把任何形式的特權地位或階級，都看成了一種『屠殺人類智慧與心靈』的特權。他憤憤地說過：『特權階級者，不管他們有政治上的或經濟上的特權，他們的智慧與心靈都是卑劣的。』根據這一點，他又說：『我們反對一切立法、一切權威與一切勢力，不管它們是不是特權的、專利的、官方的或合法的。即使它們是經普選制度產生出來的，我們也要反對，因爲它一定會變成少數統治者與剝削者的漁利工具，來奴役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的。』

因而，巴古寧始終認定：國家是一種罪惡。他根本否定國家的合法性。他把國家看成一

種宗教的產物。他認爲國家的存在，祇能代表一種比較低級的文化階段，國家是自由的否定，國家是公共幸福的敵人，國家是過去歷史上的必要的罪惡，因而，它的完全消滅，也是將來歷史的必要。

巴古寧既把國家看成了一種宗教，所以他對『上帝』一辭，也深痛惡絕。他說：『上帝這一個概念，是用來拋棄人類理性與公正的，它是人類自由的最大的否定，它必然會在理論上與實際上導致人類的奴役。』（見『上帝與國家』）

由此可知，巴古寧不但否定國家，更否定上帝。在它的無政府主義裏，是沒有一點調和色彩的。爲了達成無政府的理想，他主張採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最好一下子就把現狀推倒，再按照人類的自由意志，重建自由自治的聯盟。

嚴格說來，巴古寧主義並不算是一種近代社會主義思想。但他的國家觀與自由平等的絕對觀，對於各國的社會革命運動，也發生過一些實際的影響。一八七三年的西班牙革命與一八七九年的法國產業工人起義，都可說由於巴古寧主義的傳播。然而，這種冒險主義與死硬主義的社會革命思想，早被嚴酷的社會革命現實所揚棄掉了。

二　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共產主義

近代的無政府主義，與巴古寧主義顯有很大的差別。巴古寧主義多少帶有個人主義或自由主義的傾向，而克魯泡特金所創導的無政府主義，却是帶有共產主義色彩的。

克魯泡特金（Peter Alexandriewitsch Kropotkin，一八四二——一九二〇年）也是帝俄的皇裔。他幼年喜歡數學。青年時代，曾到西伯利亞一帶遊歷。一八七二年，他旅行到瑞士與比利時，結識了好些巴古寧主義者。返國後，因爲參加虛無主義運動，被捕入獄。在監牢裏，他孜孜不倦地研究科學。一八七六年，越獄逃至瑞士，致力革命工作。他正式參加了無政府聯盟，他創辦了『反叛報』（Revolté），他到處奔走，籌設各地的支部。一八八三年，法國無政府主義者革命失敗，他被牽連，又度了三年鐵窗生涯。釋放後，飄居英倫。他像巴古寧那樣，生命之火永遠在燃燒，祇有被囚禁時，他的生活才得到片刻的寧靜。他有科學家的氣質，他把科學研究與革命工作，都視爲第二生命。他最主要的著述，有『麵包的略取』(La Conguete du Pain)、『無政府主義的道德』(la Morale Anarchiste)、『無政府

共產主義』(Anarchist Communism)、『互助論』(Mutual Aid)與『農場、工廠與作坊』(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等。

克魯泡特金是一個科學家，他說他自己的無政府主義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他曾努力在近代自然科學與無政府主義之間，找出邏輯的相關。他認爲無政府主義祇是把近代科學上的成果，適用到社會科學上來。他覺得無政府主義應該包含下面三點：第一，生產者從資本奴役中解放出來，實行公有生產制；第二，每個人從一切政府的覊絆中解放出來，讓每個人自由結成團體，讓每個團體自由組成聯盟；第三，每個人從宗教道德中解放出來，讓每個人享受自由的道德，沒有任何義務與祈求。因而，克魯泡特金也反對國家，反對一切權力。他認爲國家祇是一個完全腐爛了的『布爾喬亞的概念』(L'idée Bourgeoise)，它是傳染着法律的瘟疫的。所以，克魯泡特金主張廢除一切法律與統治，甚至主張廢除議會政府，另以一種『沒有政府的制度』(System of no Government)來替代它。他這樣說過：『你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你怎樣想，就怎樣想！因爲，我們相信：最大多數的人類所要做的，一安會有益於社會的，就好像一個孩子學走路，他並不會用四肢，而祇會用雙脚的。』在這兒，我們看出了

克魯泡特金與巴古寧的基本差異。他們雖都反對國家與政治制度，但克魯泡特金的出發點是愛，他相信人性本善，而巴古寧剛剛相反，也却以恨爲出發點，認定人性本惡。所以，克魯泡特金主義的積極性與巴古寧主義的消極性，形成一個强烈的對照。

此外，克魯泡持金還是一個極端的共產主義者。他非但反對私有財產，甚至反對一切勞動的酬報制度，不管是『各盡所能，各取所值』，還是『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他的信條是：『一切屬於全體』(Tout est átous)。他的經濟理想，亦可稱爲『貯積經濟學』(Econo nics of the Heap)，因爲，他主張沒收一切私人財產，貯積起來，統歸社會所有，然後按照各人的實際需要，再行分配。他主張每個人可以在貯積的財貨中，自由選擇各人需要的一切。他以爲在這樣的社會裏，由於科學發達與人性解放，生產一定超過消費，所以決不會發生匱乏的現象。這就是克魯泡特金理想中的共產社會。

克魯泡特金雖是一個唯物主義的科學家，他多少還不免帶有唯心主義的錯覺。他認爲如果今天發動革命，推翻政治制度，實行了共產主義，那末，每一個人的心理，明天就會根本改造，人人都將有『人類團結』(The Solidarity of the Human Race)的意識。他把互助看成

了動物進化的一種本能，他實在是一個澈頭澈尾的性善論者。

最後，克魯泡特金還把無政府主義與共產主義當作一個完整體，他認爲兩者爲人類進化上的一對伴侶，形影不離，亦步亦趨。在他心目中，好像祇有無政府的共產主義，才是眞實的共產主義。

所以，從理論上看，克魯泡特金主義當較巴古寧主義來得細緻與愼密。然而，從革命實踐上看，兩者的幻想成份，却是半斤八兩。因而，從二十世紀以來，無政府主義的社會運動已消沉下去了。

第四節　工團主義

一　工團主義的時代背景

在十九世紀五十年代以前，法國曾是空想社會主義的家鄉。馬克思主義誕生後，慢慢把法國的勞工運動，帶上一條社會革命的新路。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就是這條革命新路上

的第一塊里程碑。

雖則，巴黎公社是失敗了，但是法國工人的革命意志，也鍛鍊得更堅强了！一八七一年以來，他們看到議會政治的破產，他們看到賄賂與貪污，他們對法蘭西式的民主傳統已經失去了信心。他們意識到團結就是力量，他們充滿了自信，他們天眞地接近了無政府主義，他們認爲：國家應該廢止，一切生產工具應該收歸公有，由工人階級結成自由的集團，再由工會來管理政府。工團主義的思想，就從這時懷胎了。

一八七六年，法國總工會在巴黎正式成立，曾出席四百位各地工會的代表，但他們仍爲少數工人貴族的集會，他們一點沒有强調工人階級在政治上的領導地位。第二次大會（一八七八年在里昂）的情形，依然如此。一八七九年，在馬賽舉行第三次大會，重新把社會主義列爲工會運動的基本原則，並且創立了『法國社會主義工人聯盟』，它是法國的第一個社會主義政黨。它在葛德（Jules Guesde，一八四五——一九二二年）領導之下，發表了一個富有戰鬥性的革命綱領，公開宣稱：『工資勞動者的社會解放與政治解放是分不開來的。如果自摒於政治行動以外，將會發生不幸的結局。』

從一八七九年到一八八四年，在社會黨內部，也分成兩派。葛德領導的左派始終堅持革命立場；而布勞斯（Paul Brousse）領導的機會主義派，則主張用和平方式爭取政權。前者深受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思想的影響；後者則帶德國社會民主主義與改良主義的調和思想。然而，在這幾年內，法國的工業生產，突飛猛普，資本家結成了聯盟，以與工人階級對抗。這一客觀形勢，是絕對不利於勞工運動的。工人羣衆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對於工會領袖的意氣用事再不能保持緘默了，他們要求新的領導。何况，當時法國工人的階級意識已經非常强烈，他們的革命經驗又很豐富，他們自己會有一個明智的抉擇的。

一八八四年，由於工會運動的普遍高漲，法國政府不敢再施高壓手段了。這一年，『工會法』正式頒行，法國工會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對工人運動起了極大的鼓舞作用。經過了兩年的呼籲與奮鬬，法國工人終於團結在一條戰綫上。一八八六年十月，『全法工團聯盟』在里昂正式成立。成立宣言上，曾這樣寫道：

『同是資本家的奴隸……慘遭同樣的苦難，有着同樣的熱望、同樣的需要與同樣的權利，我們決定提出我們的政治要求與其他要求。讓我們攜手前進，集合我們的力量來抗拒共同的敵人。勞工

運動問題常常是要把勞工階級的力量集合起來！』

僅隔一年（一八八七年），在官方津貼之下，法國各地又出現了許多『勞動交易所』（Bourses du Travail）。它的成立，主要爲了分散『全法工團聯盟』的力量，鼓吹總罷工的理論，來轉移法國工人階級的政治鬪爭的方向。一八九二年，『法國勞動交易所聯盟』亦告成立。一八九三年，該聯盟正式宣佈了總罷工的經濟綱領。

九十年代，可說是法國工會運動的全盛時期。一八八四年時，全法還祇有六十八個工會，到一八九四年，已增爲二千一百七十八個了。在同一時期，個別會員也從十餘萬人增爲四十餘萬人。『全法工團聯盟』與『法國勞動交易所聯盟』，在運動方略上也逐漸接近起來，但仍未合併。一八九五年，工團聯盟擧行大會，改稱總工會(La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簡稱C.G.T.），並且通過了總罷工綱領。從這時起，法國的工團主義才演變爲有組織的工人運動。

同時，由於運動方略的不同，法國的社會主義者（卽蓋德派）宣佈退出總工會。蓋德派認爲總工會的工團主義的運動方略，已經歪曲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他們反對以總罷工

來代替政治鬭爭，他們始終覺得：總罷工祇是一種經濟鬭爭，決不可能用它來完成一次社會革命。他們駁斥這種方略的幼稚與不切實際，因爲，總罷工最多祇能使資本家『挨餓』，而工人階級却可能因而『餓死』！在經濟鬭爭上，工人階級絕非資本家的敵手，祇有用政治鬭爭，工人階級才能取得決定性的勝利。

所以，從一八九五年起，法國的工團主義者，已與馬克思主義分手了。到一九〇二年，法國勞動交易所聯盟竟與C.G.T.合併，在同一時期的前後，法國的無政府主義者也放棄了他們的政治主張，與工團主義者站在一起了。一九〇六年勞動節那天，C.G.T.宣佈總罷工，要求八小時工作制。參加罷工的，有二五八五個工廠單位，共約二〇二、五〇七工人。罷工風潮，拖了好幾個月，據官方統計，這次罷工的結果，僅有四十五名工人獲得完全勝利；另有一萬工人爭取到九小時或十小時的工作時間。此外，五萬八千工人僅獲得一點改善，更有十三萬四千工人完全失敗。一九一〇年，由於鐵路工人大罷工，法國政府派遣軍隊接管鐵路，並宣佈罷工爲非法。從一九一一年到上次大戰爆發，C.G.T.曾領導好幾次罷工，當然都沒有使工人階級取得政權。這些活生生的事實，可說是工團主義運動方略的最客觀的評語了。

二　工團主義的理論基礎

根據前文所述，可知法國工團主義的時代背景，是異常複雜的。從它的發展來看，我們可說它是無政府主義、馬克思主義與工會主義（Trade Unionism）的混合。爲什麼呢？因爲：

第一，工會主義者與無政府主義者一樣，認爲「叛抗」（Revolt）是一種革命道德。他們把罷工看成一種最理想的「叛抗」手段，不管罷工的結局將是成功還是失敗。他們甚至把總罷工就當作一種社會革命。他們也與無政府主義者一樣，主張以自由結合的方式建立一個工人政府。

第二，工團主義者也像馬克思主義者一樣，他們肯定階級鬬爭，他們主張生產手段公有，主張實現「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的社會理想。

第三，工團主義者又是一個工會主義者，他們認爲工人的解放，不一定要通過政治鬬爭。他們覺得工人階級各守自己的崗位，自助互助，利用工會把自己團結起來，就一定可以

戰勝資本集團了。

所以，工團主義者是一種階級意識還不甚成熟的社會主義者，因而，他不可能是一個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者。他不是和平主義的費邊主義者，也不是機會主義的改良主義者。他與無政府主義者一樣，是一個冒險主義者。冒險主義者是不擇手段的，不擇手段的結果，不一定勝利，卻可能慘敗！儘管工團主義者倡導階級鬬爭，但他們所領導的階級鬬爭的方略，卻不是一種必勝的方略，常常是失敗的方略。這不是太冒險，太衝動而幼稚了嗎？

法國工團主義的理論家，也着實不少。最聞名的，有披羅蒂（Fernand Pelloutier，一八六七——一九〇一年），普齋（Emile Pouget），蘇耳（Georges Sorel），拉加德耳（Hubert Lagardelle）與柏司（Edouard Berth）等，而以蘇耳的理論體系最爲完備。他的主要著作，有『暴力雜感』（Réflexions Sur la Violance），『進化幻想』（Les Illusions du Progre's）與『現代經濟概論』（Introduction á Léconomie Moderne）。他是一個書生，他沒有實際的鬬爭經驗，他的理論可說是閉戶造出來的。他認爲工團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更高發展，他稱工團主義者爲『新馬克思主義者』（Neo-Marxists），他稱工團主義者的哲學是『左

良的改良主義』。他同意馬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他相信新社會是從舊社會的子宮裏孕育出來的。所以，他認為工團主義者的最大急務，莫過於在資本主義的工廠裏把勞工階級的力量培育起來。

蘇耳的總罷工論，變成了工團主義者的宗教。他認為總罷工這一概念，是組織與教育工人階級的最好的武器。他說，有了總罷工這一個概念，不一定要有總罷工這一個行動。他把總罷工看成一種『社會神話』（Social Myth）。他說基督教耶穌再生的神話，既發生過這樣偉大的宗教力量，同樣地，總罷工這一個社會神話，也可能發生無比的革命影響。他覺得神話與每一種革命運動是不可分的。有了神話，可以鼓舞革命的勇氣與熱情，因而，他相信，以總罷工作為神話，就可煽起工人階級的革命狂熱。

其次，蘇耳又以他的暴力說，來聳人聽聞。他認為無產階級的暴力，是對資產階級的一個最有力的威脅。一方面可使資產階級對社會和平不再抱存幻想，另方面又可刺激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使他們意識到罷工與暴力是完成無產階級歷史使命的必要手段。蘇耳是把暴力看成柏格森（Henri Bergson ，一八五九——一九四一年）所謂『生之衝動』的一

由此可知，蘇耳的工團主義哲學，充滿了唯心的幻覺。誠如萊芬納(Louis Levine)所指出：「蘇耳先生與馬克思從一個起點出發，却又與柏格森站在一個終點上。」（柏格森爲近代法國大哲學家，主張唯生論。）

總之，工團主義作爲一種革命行動，會導致左傾幼稚病，而走上失敗之路；工團主義作爲一種革命理論，又會陷於激情的主觀主義，而不能自拔於唯心論的深潭！所以，工團主義決不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支派，更不能稱爲「新馬克思主義派」，它也是一種變態的改良主義——左傾的改良主義。

第五節　基爾特社會主義

一　基爾特社會主義的時代背景

前面四節，我們介紹了英國的費邊主義，德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與改良主義，俄國的無政府主義與法國的工團主義。它們的產生，都具備了特定的歷史條件——產生於特定的時間與

特定的空間。費邊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與改良主義都偏於『溫和』，而無政府主義與工團主義則偏於『激進』。到二十世紀初葉，在英國又新興了一種基爾特社會主義，它不像前者那樣『溫和』，也不像後者那樣『激進』，它可說是介乎兩者之間的中庸主義。它也像其他各種社會主義思想一樣，是有着特殊的時代背景的。

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英國的工會運動，已與社會主義運動分不開來了。社會民主聯盟與費邊社的成立，也多少給工會運動盡了些刺激作用。一八九二年，礦工哈地當選為國會議員，翌年，他與少數國會議員，成立了獨立工黨 (The Independent Labour Party)，標榜社會主義。但該黨沒有鮮明的政治綱領，在許多地方，調和了社會民主聯盟的革命主義與費邊社的改良主義，一方面同情工會運動，另方面又忌用馬克思主義的一切字眼。因而，它得不到廣大工人羣衆的支持。到一八九九年，經種種努力，一切民主團體，祛除異見，重新攜起手來，由英國總工會、社會民主聯盟、獨立工黨與費邊社聯合組成了『勞工代表委員會』(The Labor Representation Committee)，集中力量準備競選。一九〇〇年，英國舉行大選，勞工代表委員會共推十五名候選人，結果，僅哈地與貝爾 (Richard Bell) 當選。到一九〇六年，再

度參加競選，勞工代表委員會大獲勝利，五十位候選人，當選了廿九位，在國會裏聲勢大壯。這一年，該會就正式改名爲英國工黨（The British Labour Party）。

這批社會主義的新貴，都興高彩烈，以爲這一來，一定可以通過國會立法，逐步走向社會主義了。在政治目標上，他們同情工團主義，他們也完全站在工業生產者的一邊；然而，在運動方略上，他們却不同意採行總罷工或暴力之類的直接行動。他們固執地相信和平主義與漸進主義的政治改良。

然而，這祇是他們的希望。儘管大選是勝利了，但從一九〇六年到上次大戰爆發，他們祇能在國會裏通過一個『英國勞工的大憲章』——『職業爭訟法』(The Trade Disputes Act)。這一個有限的怠工自由權，並不能把英國工人從經濟苦難裏解放出來。這個法案剛剛通過，經濟恐慌的魔手已抓住英國工人的髮根了！失業，高物價，饑餓……威脅到每一個工人。這個資本主義社會裏的醜惡的現實，再加上機器生產的單調與死板，不禁使人追慕到中世紀的基爾特制度來了。於是，盧斯金（John Ruskin，一八一九——一九〇〇年），謨列斯（William Morris，一八三四——一八九六年）與卡萊爾（Thomas Carlyle，一七九五——一八

八一年）諸氏歌頌中世紀的作品，就傳誦一時。基爾特社會主義運動，從而發展開來。（按基爾特 Guild 一辭，亦可譯義爲『行會』。）

基爾特社會主義的重要人物，爲潘蒂（A. J. Penty）、奥拉治（A. R. Orage）、霍布生（S. G. Hobson）與柯爾（G. D. S. Cole）四氏。一九〇六年，潘蒂出版了他的『基爾特制度的復興』（Restoration of the Guild System）後，一種『基爾特復興運動』就開始在那兒醞釀。這個運動的最大目的，在把中世紀的基爾特精神復活過來。到一九一五年，在奥拉治與霍布生努力之下，才正式成立了『全英基爾特聯盟』(The National Guilds League)。該盟的宗旨，爲『廢除工資制度，通過全國基爾特組織，建立工業的自治政府』。後來，柯爾想把費邊社改組爲基爾特社會主義社，並未成功。又另組『基爾特社會主義宣傳會』，專門從事鼓吹工作。在實際上，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的政治影響，也僅限於宣傳而已。

二　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

根據上文所述，我們可知基爾特社會主義的基本宗旨，爲廢除工資制度與建立基爾特自

治政府。現在詳加介紹如下：

就廢除工資制度一點而論，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是一個激進主義者。他們認爲，無論在經濟上，道德上，心理上，美學上與精神上，工資制度都是一種罪惡，一種欺騙。它產生一種「奴隸心理」，使工人階級永遠自卑。它會抹煞勞動者的創造本能，它更可使資本家不勞而獲。因而，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主張根本廢除工資制度。

再就建立基爾特共和國一點來說，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又是一個復古主義者和盲目主義者。他們認爲在基爾特社會主義社會裏，應以基爾特爲社會單位。所謂基爾特，則指：「一個自治的團體，由互助合作的人民結合而成，爲了負責處理社會內的特殊工作。」（奧拉治語）換言之，基爾特是指一個職業部門裏的全部職工，就像中世紀的那樣。這個基爾特的組織，合乎民主原則。基爾特領導人按照民主方式選出，但有特殊技能者，將被尊崇。全國可因職業性質不同，分成各種基爾特組織：工業基爾特，農業基爾特，分配業基爾特，公務員基爾特等。各個基爾特，都能享有自治權，但全國基爾特，則有極高度的中央集權，在各基爾特之間，成立聯合指導機構，保持密切合作。關於基爾特的國家形態，衆說紛紜。有人肯定國

家存在，也有人否定國家存在，改稱公社，它的職務，限於維持社會秩序、外交與國防。全國公社由全國性的各種基爾特派員組成，各地公社則由地方基爾特派員組成。關於政治方略方面，基爾特社會主義者介乎費邊主義者與工團主義者之間。他們信賴工會運動，反對政治鬬爭。在過渡期內，有人主張採行國有化政策，也有人主張馬上由基爾特接辦私人企業。所以，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的國家觀，簡直沒有一個中心的主張，就像盲人騎瞎馬一樣！

由此可知，基爾特社會主義的理論，比任何一種修正的社會主義都要來得龐雜。唯其如此，它就極難取信於人。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祇能『紙上空談』，作爲一種『知識的點綴』。全英基爾特聯盟的盟員，也不過五百人左右，它的社會影響，自然渺不足道了。

第六節　改良主義的批判

以上五節，我們分別敍述了英國的費邊主義與基爾特社會主義，德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與改良主義，俄國的無政府主義以及法國的工團主義。整個說來，『到十九世紀後半，由於馬克思主義的存在，發生了一種鬬爭的傾向，就是與馬克思主義敵對起來。』（列寧：『馬克

思主義與改良主義』）然而，這種敵對的鬪爭，並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損失，而是馬克思主義科學價值的更大考驗。經過了七十年的大考驗，不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一點也沒有動搖，並且由於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更使它從科學的眞理變成了革命的實踐。它像初升的旭日，愈照愈紅！相反地，各種修正的社會主義，根本經不起時代的考驗，它們就像斜照的夕陽，眼看着失去光彩了。

這兒所要特別指出的，就是：不管是和平主義的費邊主義也好，不管是機會主義的社會民主主義與改良主義也好，不管是冒險主義的無政府主義與工團主義也好，也不管是中庸主義的基爾特社會主義也好，它們都或多或少地、有意無意地『修正』了馬克思主義，並且都自命爲最完美，最健全的社會改造的理想。這種錯綜複雜的意識形態，當然不是偶然的。誠如列寧所指出：

『在廣大的工業階層裏，小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將會繼續出現，這本來是很自然的。』（見『列寧選集』，卷一）

又說：

『改良主義的不可避免性是爲現代社會裏的階級基礎所決定的。改良主義是一個國際的現象。』

（見『馬克思主義與改良主義』）

正因爲如此，我們才把一切右傾的改良主義（費邊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柏斯泰因主義，考茨基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與一切左傾的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與工團主義）都泛稱爲修正的社會主義或改良主義。當然，這裏所謂『修正』與改良，是一種反面的意義，並不是正面的意義。因爲它們並沒有把社會主義『修正』，反而把社會主義『修歪』了。它們並沒有把馬克思主義『改良』，反而把馬克思主義『改壞』了。所以，如果從修辭學上來講，它們應該改稱爲『修歪』的社會主義或『不良主義』！在前一章裏，我們已經說過：馬克思主義的本身，就是眞理，就是科學；馬克思主義既是眞理與科學，當然用不着『修』，更用不着『改』。我們這樣說，絕不是把馬克思主義當成一種死的敎條。馬克思主義並不是一種敎條，而是一種行動的指南。也就是說，它是一種活的科學原則，在社會革命的實踐過程中，以它作爲行路的明燈。它是社會主義的唯一的科學眞理，沒有了它，社會主義革命就不會見到光明。所以，對於馬克思主義，不能斷章取義地予以『修』或『改』，祇能整套地

予以靈活的運用。靈活的運用，並不是死守公式，而是根據它的科學分析，予以引申，予以闡揚，予以有機的創造。祇有這樣，社會主義才有眞正實現的可能。否則，就會像各種「修正」的社會主義那樣，它們最多祇能變成很時髦的書生講壇上的社會主義，而不可能成爲革命戰場上的社會主義！

第四章　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社會主義——列寧主義(Leninism)

第一節　列寧的時代、生平與著述

一　俄國的十月革命

「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斯大林語）這句話，說明了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繼續發展，同時，也說明了列寧主義的特殊的時代背景。

十九世紀中葉以後，英國資本主義經濟已發展到帝國主義階段，直到二十世紀初葉，大英帝國始終獨霸資本主義的王座。然而，德國經濟不斷地向外擴張，使英國商品與資本的『生存空間』，受到極大的威脅。爲了爭奪商品市場與世界殖民地，英、德兩大帝國主義終於兵戎相見，把全世界都捲入了第一次大戰的漩渦。

在帝國主義戰爭爆發的前夜（一九一四年），俄國的政治經濟，已經起了根本的變化。虛無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恐怖行動，並沒有推翻恐怖的絕對主義統治；帶有浪漫主義色彩的小資產階級社會運動——即所謂人民主義者（Narodniks）——也不能領導人民進行一次大翻身的革命。十九世紀末葉的工業化建設，也祇是把帝俄變成了列強資本的樂園。可是，隨着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與工會運動思想的輸入，也使俄國的工人階級意識到集體鬪爭的必要。

從一八九五年到一九〇五年，就可稱爲俄國工人運動的勃興期。一九〇五年慘案發生後，工人階級對沙皇制度的血海深仇，已經不共戴天了。儘管在一九〇六年與上次大戰之間，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一八六八——一九一八年）還以御用的國會（Duma）來矯飾民主，終因沙皇政府腐化貪贓，俄國人民的革命情緒，一天高漲一天。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在英、法資本集團的慫恿之下，沙皇突然對德宣戰。作戰不到兩年，國內經濟陷於破產，物價飛騰，怨聲載道。後方人民要求和平，前線士兵要求麵包，廣大農民要求土地。弄得民心叛離，士無鬪志。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發生，尼古拉被迫退位，由各黨派成立混合政府。但因新政府貫澈舊政策，既沒有給人民和平，更沒有給人民麵包與土地，反而勾結帝國

主義，魚肉廣大人民。到十一月七日（即俄歷十月廿四日）在列寧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的旗幟之下，俄國無產階級終於團結起來，推翻了克侖斯基(A. F. Kerensky)政府，創建了有史以來的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所以，俄國的十月革命發生於帝國主義時代，列寧主義就是這個帝國主義時代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具體反映。

二　列寧的生平

列寧（Vladimir Ilych Lenin，一八七〇——一九二四年）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導師，也是馬克思主義的最忠實的信徒。拉斯基教授說他是『近代歷史上最偉大的實際革命家』。

列寧的家庭，堪稱小康。他在求學時代，總是名列前茅。一八八七年，進喀山（Kazan）大學，後因從事政治活動，而被開除。一八九一年春，他再考入聖彼得堡大學。在這段時期，他狂熱地研讀馬克思與恩格斯的著作，他住在工人區，暗中領導罷工運動。同時，結合了一批信仰社會主義的知識青年，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小組。他的理解力與分析力，爲友

罪所景服。從這時起，他已經懷抱着這樣的信念：祇有勞動階級，才能給俄國帶來自由與平等。

列寧的革命生涯，實際從一八九三年就開始了。他在聖彼得堡（即現在的列寧格勒）的時候，曾與少數革命靑年，組織了『勞動階級解放鬥爭聯盟』。有位勇毅英明的女盟員，叫克羅潑斯卡雅(N. K. Krupskaya)，就是列寧後來的妻子。從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〇年，列寧失去了自由，初被祕密警察監視，繼被逮捕入獄，最後，更被放逐到西伯利亞。在放逐期內，他寫成了一部巨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Razvitiye Kapitalisma V Rossii)，他的結論，認爲當時的俄國已被捲入資本主義的漩渦了。

一九〇〇年，他流亡到西歐，協助編印一份革命刊物——『火星報』(Iskra)。他發覺這批同路人身上，都蒙有一層機會主義的灰紗。他不能再與他們合作下去，就與馬克思主義的忠實信徒緊緊地攜起手來，這就是布爾什維克黨的雛型。

一九〇三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倫敦召開大會，分成對立的兩派，一是多數派，稱爲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一是少數派，譯音則爲孟什維克(Mensheviks)。後者是改良派，

他們認爲俄國走進社會主義社會以前，必須經過一個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所以，他們主張有一次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反對發動無產階級領導革命。而布爾什維克則爲革命派，他們相信俄國不必等到資本主義發展成熟，就可通過無產階級領導的民主革命，發展到社會主義革命，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跨進社會主義社會的。這一派爲列寧所領導，在黨內受到廣大的擁護。這個黨內的鬬爭，一直繼續到十月革命時代。

一九〇五年，列寧潛回聖彼得堡，參加工人鬥爭運動。革命失敗後，他前後避居芬蘭、瑞士與法國。一九〇七年，又重到倫敦。這是一個革命的低潮時期，他像馬克思一樣，沉下氣來，埋頭著述。在當時的思想界，新康德派(Neo-Kantian)與經驗批判論的改良主義派(以 A. Bogdanov 與 A. Lunacharsky 爲首)的氣勢，不可一世。爲了掃清思想界的烏烟瘴氣，列寧化了二年多的光陰，從早到晚，孜孜地鑽在大英圖書館與巴黎國立圖書館裏，發掘哲學的眞理。一九〇九年春，他的劃時代作品——『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終於出版。這本書，像一陣巨風，把一切反時代的哲學邪說都吹得無影無蹤了！

從一九一二年起，俄國的民主運動，又慢慢抬起頭來，他與國內的革命力量，取得了更

密切的聯繫。他的革命學說，已經深深地感召與鼓舞了俄國的工人階級。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他預見到國際戰爭就是國內革命的前奏，加緊在國外策劃社會革命工作。他團結了各國革命派的社會主義者，替第三國際的成立先舖平了一條路基。（詳見第二節）

一九一七年四月，他回到了俄國。他看到人民的怨憤，他看到戰亂的慘況，他堅持「不推翻資本主義，就不可能有民主的和平」，他認淸工人與貧農掌握政權是一切革命工作的基本前提。在「一切權力歸於蘇維埃」的號召之下，廣大的俄國勞動人民都跑到布爾什維克旗子下面來了。在那「震撼世界的十日」裏，六分之一的地球上，開始出現了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了。

從一九一七年十月廿五日到一九二四年一月廿三日，列寧的生命脈膊，每一秒鐘都是爲了建設社會主義而跳躍的。他不但給了勞動人民「和平，麵包與土地」，他還擊退了十七個帝國主義的圍攻。他的新經濟政策（N.E.P.）（一九二一年），更使社會主義的根芽牢牢地埋在蘇聯的土壤裏。所以，我們可以稱列寧爲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U. S. S. R.）之父。

三　列寧的思想淵源及其著述

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而帝國主義時代又剛好是各國（包括帝俄）無產階級的革命時代，所以我們又可以說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說得更具體些，列寧主義的一般內容爲無產階級革命的學說與戰略；列寧主義的特殊內容，卽爲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與戰略。「馬克思與恩格斯生長在一個前革命時代，發展的帝國主義還沒有存在，那是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的準備時期，無產階級的革命還沒有一個直接的實際的不可避免性。而列寧——馬、恩的信徒，却生長與工作在一個發展的帝國主義時代，也就是在一個無產階級革命的發展時代。在這個時代，無產階級革命已經在一個國家得到了勝利，已經擊毀了布爾喬亞的民主主義，已經走上了一個無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時代——蘇維埃時代。這就是說明了爲什麼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繼續發展。」（斯大林：「列寧主義的基礎」）

所以，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一種革命的實踐。換言之，馬克思把社會主義從烏托邦

的空想變成一種科學的眞理；列寧又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眞理化爲革命的實踐。在這兒，更可獨見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的邏輯聯繫了。因而，我們研究近代社會主義思想，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爲出發點。理解了馬克思主義，才可能進而領悟列寧主義。同時，祇有研究了列寧主義之後，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思想的發展全程才能有一個整個的認識。也就是說，我們的研究必須又以列寧主義爲歸宿點。我們再三提到『思想是時代的反映』，今天，我們既還沒有越過帝國主義時代，那末，列寧主義的思想，當然可說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面鏡子了！

列寧主義的具體根據，就是列寧本人的著作。其最重要者，除前文曾提及的『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外，有：

（一）『做什麼？』(Chto Dyelat)，一九〇二年版。

（二）『兩個戰略』(Dve Taktiki) 一九〇五年版。

（三）『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Materialism i Empiriokrititsism)，一九〇九年初版。

（四）『帝國主義論』(Imperialism)，一九一七年版。

（五）『國家與革命』(Gosudarstvo i Revolutsiya)，一九一八年版。

(六)『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Proletarskaya Revolutsiya i Renegat Kautskii)，一九一八年版。

(七)『無產階級專政』(Diktura Proletariata)，一九一九年版。

(八)『「左派」共產主義 一種幼稚病』(Detskaya bolezn "Levismy" V Kommunisme)，一九二〇年版。

第二節 第三國際的成立及其宣言

一 從第一國際到第三國際

第一國際成立於一八六四年，我們在第二章裏已經提到了。它的正式名稱是國際勞工協會，它的性質，類似世界工會聯盟，但它是以『共產黨宣言』作爲基本的政治綱領的。它在日內瓦（一八六六年），洛桑（一八六七年），布魯塞爾（一八六八年）與巴斯萊(Basle)（一八六九年）召開過四次大會。這幾年間，第一國際的組織，發展迅速，從西歐各國擴大

到匈牙利、波蘭與美國等地。一八六九年，巴古寧參加進來，鼓吹無政府主義，在第一國際內展開了新的思想鬥爭。一八七二年，在海牙舉行又一次大會，巴古寧派才被開除，第一國際仍舊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思想領導．但普法戰爭(The Franco-Prussian War，一八七〇年)後，歐陸的政治情勢漸趨惡化，第一國際總部就於一八七二年移設紐約。從這時起，它的實際活動幾乎完全停頓了。(後來僅於一八七四年與一八七六年分別在日內瓦與費列得爾菲亞開過兩次大會。)

九十年代以後，在歐洲各國，修正的社會主義思想風起雲湧。各國的社會主義者與工會代表雖也舉行過幾次國際會議，但缺乏一個中心的政治信仰，並不能把第一國際的革命傳統復活起來。直到一八八九年，為了共同抗拒無政府主義者，改良主義派（Reformists）與馬克思主義派(Marxists)才暫時攜起手來，成立了社會主義國際（The Socialist International)，亦稱第二國際。

從一八八九年到上次大戰，第二國際曾在布魯塞爾（一八九一年），沮利區（一八九三年），倫敦（一八九六年），巴黎（一九〇〇年），阿姆斯特丹（一九〇四年），斯吐加脫

(Stuttgart)（一九〇七年），哥本哈根（一九一〇年）與巴斯萊（一九一二年）舉行過八次大會。然而，由於國家主義與機會主義的作祟，始終不能使它變成一個統一的社會主義國際機構。當時各國社會主義者中間，左右派的分化，亦卽馬克思革命傳統和機會主義的對立，日益明顯，一個新的國際機構之組成，日益成爲必要和可能了。

大戰爆發，第二國際無形宣告解體。（大戰後，在考茨基和麥克唐納（James Ramsay MacDonald 一八六六年——一九三七年）等奔走之下，第二國際雖曾死灰復燃，但因缺乏領導，名存實亡。）一九一五年，經過列寧的努力，各國社會主義者又集會於瑞士的全茂華德（Zimmerwald），反對帝國主義戰爭，號召各國人民共爲社會主義而革命奮鬥。這次會議，可說是國際社會主義革命派的大集合，它已奠立了第三國際的始基。

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共產黨宣言』裏的預言，已經變成了革命的現實。一九一九年三月，各國社會主義左派的代表，重聚於莫斯科，正式成立了共產國際（Communist International，簡稱 Comintern），卽第三國際。它繼承並發揚了第一國際的革命傳統。如果說，第一國際是馬克思主義的國際靈魂，那末，第三國際就可說是列寧主義的國際靈魂了！（第

三國際於一九四三年五月自動宣告解散。到一九四七年九月，歐洲九國共產黨另外成立了一個情報局，簡稱 Cominform ，它是共產黨新的國際組織。）

二 「共產國際宣言」的中心內容

共產國際成立時，曾發表過一個宣言，它的歷史意義，不下於一八四八年的「共產黨宣言」。「共產黨宣言」可說是烏托邦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分水嶺；「共產國際宣言」又可說是機會主義與列寧主義的分水嶺。「共產黨宣言」發表後，給烏托邦主義作了一次清算；「共產國際宣言」發表後，也給機會主義作了一次淸算。

從歷史的發展進程來看，「共產國際宣言」實爲「共產黨宣言」的更高發展。它劈頭就說：「……七十二年過去了，……基本上，它是照着「共產黨宣言」所預言的道路而發展的。」接着又說：「共產主義者確信自己是七十二年前所發佈的綱領（指「共產黨宣言」——編）的追隨者與實行者。我們現在的工作，就是要總結勞動階級的機會主義與愛國主義的混淆，並且要團結一切眞正革命的無產階級黨派的力量，以加速共產主義革命的完全勝利。」

此外，『共產國際宣言』的中心內容可以歸納爲下面四點：

第一，它揭示了帝國主義戰爭的禍根。『宣言』上說得非常明澈：『世界大戰的主要原因，在於資本主義國家有產階級的無饜的貪慾。……由於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這戰爭才給全人類帶來了饑饉，殺戮，瘟疫與道德墮落的逆流，……今天，我們正面對着這一個慘烈的貧困現實，它不僅是一個社會問題，並且是一個生理學與生物學上的問題了。』

第二，它拆穿了金融資本的猙獰面目。『宣言』上有着這血淋淋的幾句話：『金融資本把人類投入了戰爭的深淵，……通過了這樣大規模的屠殺，金融資本也完全軍事化了。』

第三，它分清了資產階級的民主與無產階級的民主。『宣言』上赤裸裸地指出：『……整個布爾喬亞世界譭謗着共產主義者，說他們破壞了自由與政治民主，這是無稽之談。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後，說明了資產階級方式的絕對不能適用，它創造了一個更高的勞動階級的民主條件與型式。資本主義發展的全般過程，完全抹煞了政治民主，它不但把一個國家分裂爲兩個不可調和的階級，並且使廣大的小布爾喬亞、半無產階級與貧苦無產階級，永遠呻吟於經濟困疲與政治虛弱中。』

第四，它確立了一個無產階級的革命模型。『宣言』上毫不隱諱地宣稱：『無產階級必須建立自己的工具，作爲統一的紐帶。這個工具就是勞動者的蘇維埃(Soviet)。這個制度包括了一切勞動階級，不分職業，它是一個彈性的組織形式，可以繼續不斷地革新、擴大與吸收新的份子，……這個勞動階級的自治組織，在現階段的鬬爭與將來各國的革命中，是無產階級的一種考驗，它是這個時代無產階級的最高希望與最大武器。……有了這種蘇維埃，如果它能得到廣大勞動人民的擁護，勞動階級必然能在一切國家取得政權。有了這種蘇維埃，一旦勞動階級取得政權後，就可進而控制一切部門的經濟生活與文化生活。』(以上引語，均見『共產國際宣言』)

這就是『共產國際宣言』的中心內容。它雖也像『共產黨宣言』那樣，指出了歷史發展的一般趨勢，但更重要的，就是它具體地顯示了革命戰略的特殊綱領。在第二章裏，我們曾說『共產黨宣言』是資本主義喪鐘的第一響，它指引了一條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歷史道路。因而，在這兒，我們可把『共產國際宣言』視爲資本主義最後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的葬歌的第一聲，它肯定了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勝利。

第三節　列寧主義的哲學基礎

一　列寧在唯物哲學上的貢獻

列寧是馬克思主義的最忠實的信徒，馬克思主義的哲學基礎既建立在辯證唯物論上，列寧當然是一個辯證唯物論者了。

列寧不僅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論，並且還予以發揚。他繼承了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哲學研究，把辯證唯物論建立在一個更完密的理論體系裏。

一九〇七——八年間，反唯物論的傾向，頗有銳不可當之勢。一九〇八年，聖彼得堡出版了一本『馬克思哲學大綱』（載有 Bogdanov 等人論文），歪曲了馬克思的哲學觀點。列寧當時給高爾基(Maxim Gorki，一八六八——一九三六年)的一封信上曾這樣說：『每讀一篇這樣的文章，我的憤激就燃燒得更加熾烈。不，這絕不是馬克思主義！』一年以後，他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問世了，它像在怒潮奔騰的思想汪洋裏屹立起的一座燈塔，任何

海濤與風暴都熄滅不掉它的光明！

除了『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一書外，列寧的哲學思想，更散見於他的其他著述裏，而以他的『辯證法論』，『哲學筆記』等爲最著。列寧頗推崇俄國孟什維克普列漢諾夫(G. V. Plekhanov 一八五七年——一九一八年）的哲學著作，但也給了嚴正的批判。

二　列寧的唯物論

列寧的哲學研究，是以物質爲基本出發點的。他認爲一切以物質爲主、爲本體，精神爲次、爲屬性。他說：

『物質是原始的，精神是派生的。

又說：

『物質、自然、存在，身體、是原始的實在體，而精神、意識、感覺、心靈則爲派生的實在體。』

更說：

『物質是一個界限，心靈是無法越過這個界限的，心靈是物質的產物，而物質却是大於心靈的產物。』（均見『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

所以，列寧完全與馬克思一樣，認定『物質是獨立於感覺而存在的』。（引同上）反過來，『心靈的存在却是依賴於身體的。』（引同上）他把感覺、意識、思想都看成物質的最高產物。他自己說，『這就是唯物論的一般內容。』（引同上）

他更告訴我們：『物質是一個哲學的範疇，它指客觀的實在……這一個實在是被人類的感覺所拷貝、所拍攝、所反射的。但它却獨立於感覺而存在着。』（引同上）

基於這點，他發揮了唯物論的世界觀。他很敏斷的指出：『如果承認我們的感覺是外在世界的拷貝，那就等於承認了一個客觀的眞理，也就是把握了一個唯物論的觀點。』（引同上）

從這裏，我們才會懂得，爲什麼列寧是馬克思主義的忠實信徒了。他當然不是盲目地迷信馬克思主義，他之所以服膺馬克思主義，是因爲『馬克思的學說是客觀的眞理』。（引同上）他非常肯定地指出：『依循着馬克思學說的方向，我們將與客觀的眞理一步步接近；

如果依循着別一條路，我們將會走到混淆與虛假去。」（引同上）

由此可知，列寧所以接受唯物論，並不單單因爲它是馬克思的偉大發現，而是因爲唯物論的本身就是客觀的眞理。宇宙間祇有客觀的眞理，才是眞的，而不是假的。相信客觀眞理的人，就必然會成爲一個唯物論者——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總之，列寧的唯物論，是「承認客觀的眞實的存在（即物質）是獨立於意識、感覺、經驗的，……意識祇是存在的反映，它最多也不過是最接近眞實的反映。」（「列寧選集」卷十一）。

三　列寧對於辯證法的看法

不用說，列寧的唯物論，也是辯證唯物論，而不是庸俗的或機械的唯物論。他的基本觀點，就認爲「辯證法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辯證法論」）馬克思主義既是客觀眞理的寫照，因而，祇有通過馬克思的辯證法——即唯物辯證法，才有認識客觀眞理的可能。這就是辯證唯物論別於「形而上」唯物論的地方。列寧說得非常清楚：

「辯證法是一種活生生的多方面的知識，它有着各種無窮數的接近於現實的形相。比起形而上唯物論來，它的內容含有不可度量的豐富。形而上唯物論的最大苦惱，在於不能把辯證法用到發展學說上去，也就是不能運用到知識的發展過程上去。……在另一方面，從辯證唯物論的觀點來看，唯心論哲學也是一種單方面的、誇大的、臃腫的發展論，祇顧到特殊的一面，或者局限於一個特定的、絕對的知識圈子裏，並且與物質及自然隔離起來。」（「證辯法論」）

所以，列寧是把唯心論比作一種宗派主義的。他又說：

「這個宗派主義（唯心論）所具備的認識論的根源，也不是不可說明的。……它是一朵枯了的花，……僵直性與片面性，拘束性與生硬性，主觀主義與主觀的盲目性——這些就是唯心派知識論的根源。」（「辯證法論」）

在這兒，我們當可明白：列寧把辯證法當作一種認識客觀存在的科學根據的。因而，他與馬、恩的看法，完全一致，認定一切事物的自身，都包蘊着內在的矛盾的。他告訴我們：

「在數學上，有正數（＋）與負數（－），微分與積分；在力學上，有作用與反作用；在物理學上，有陽電與陰電；在化學上，有原子的組合與分解；在社會科學上，則有階級鬥

爭。』（『辯證法論』）他說過一句名言：『發展是指對立物的鬥爭。』（『列寧選集』卷十一）所以，他永遠相信：『沒有鬪爭，就是滅亡！』『對立物的統一，是有條件的、暫時的、過渡的與相對的；而互相排斥的對立物之間的鬪爭，却是絕對的，就像是運動與發展那樣。』（『辯證法論』）

總結起來，我們可以這樣說，列寧對於辯證法的看法，也是與自然的發展規律相一致的。自然的發展規律，是在矛盾中找統一，在否定裏找肯定，而『辯證法就是研究事物本體（自然）的內在矛盾的。』（『哲學筆記』）

第四節　國家觀・無產階級專政・帝國主義論

一　國家是統治階級的剝削工具

列寧的國家觀，見於他的『國家與革命』，這本書，又可以說是恩格斯的『家族，私有財產與國家之起源』的續編。恩格斯說過：『國家並不是加於社會的一種來自外界的權力，

……它是某一發展階段的社會產物；它說明了這個社會的本身，已經陷於不可解決的矛盾，說明了它已分裂成不可調和的對立體。」（『家族，私有財產與國家之起源』）列寧對於國家的看法，也是如此。他說得更加明朗：『國家是階級對立的不可調和性的產物與表現。當階級對立發展到客觀上不可調和的時候，國家就產生了。」（列寧：『國家與革命』）

這個國家形態，與氏族(Gens)社會的組織，是完全不同的，它的第一個特徵，就是把國民結合在一個固定的地域內。這種結合，現在看來，似乎非常『自然』；可是，在實際上，它是經過長期的殘酷戰爭，才從解體了的氏族社會中建立起來的。

國家建立於固定的地域後，就出現了一種特殊的軍隊組織，它被稱爲『國家武裝』，它不僅包了武士，並且還有監獄、警察以及其他的權力機關。列寧與恩格斯一樣，認爲『常備的軍隊與警察是國家權力的主要工具。』（『國家與革命』）同時，『爲了維持一種特殊的國家武力，租稅與國家公債就成爲必要的了。』（『國家與革命』）

當然，這種軍隊、警察、監獄、租稅、公債等，都是些剝削的工具，『不僅古代國家（奴隸社會——鏞）與封建國家是剝削奴隸與農夫的工具，就是近代的代議制國家也是資本

家剝削工資勞動者的工具。』（『國家與革命』）

所以，列寧認定『國家是壓迫階級的剝削工具』，換言之，國家就是少數統治階級對於多數被統治階級的剝削工具。

基於這樣的認識，列甯也與恩格斯一樣，把國家看成一個歷史的範疇。也就是說，國家是一個階級社會的產物，如果在一個社會裏，並無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分，它就不可能有國家形態的存在。列寧轉引恩格斯的一段話，作爲結語．

『所以，國家並不是存在於永恆裏的。過去有些社會的管理，並沒有用到國家，那時並沒有國家與國家權力這樣的概念。當經濟發展到某一階段，由於社會分裂爲各種階級，國家就變成了一種必要。現在，我們很快地發展到一種生產階段，在這個階段，不僅階級的存在不再是一種必要，它甚至變成了主要的生產阻力。它們（指階級——編）不可避免地將會消滅，就像前一階段它們不可避免地出現一樣。伴隨着它們，國家也不可避免地將會消滅。』（『國家與革命』）

由此可知，列寧的國家觀，是與階級剝削觀相一致的。在一個有階級、有剝削的社會裏，才會出現國家形態；當一個社會沒有了階級與剝削，國家形態也必然會消滅了。

二　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武器

從他的國家觀出發，我們才能進而理解列寧的革命戰略——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與恩格斯雖都把無產階級專政看成從資本主義社會過渡到共產主義社會的歷史的必然，列寧却從社會革命的基本戰略說明了它的必要。他認爲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武器。他對無產階級專政下了一個這樣的定義

「無產階級專政並不是階級鬭爭的結束，而是帶有新形式的階級鬭爭的繼續。無產階級專政是無產階級抗拒資產階級的階級鬭爭；因爲，無產階級已經勝利，已經取得了政權；而資產階級雖則失敗，但還沒有根絕，他們並沒有消滅，他們並沒有停止了抵抗，他們反而增強了他們的抵抗。」（「列寧全集」俄文版二十四卷）

因爲，列寧認爲：「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黨主義，代表了一個整個的歷史階段。在這個階段終了以前，剝削者不可避免地還會懷抱復活的希望，同時，這種希望將會導致復活的嘗試。」（「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以下簡稱「無產階級革命」）

同時，列寧還指出，卽使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資產階級企圖復活的力量，依然非常强大。他說：『倘使剝削者祇在一個國家垮台了，他們的力量仍較被剝削者爲强。』（『無產階級革命』）這是——

第一，由於『國際資本的力量以及資產階級國際組織的力量與存在。』（『左派幼稚病』）

第二，由於『習慣的力量與小生產制的力量。……因爲，階級的廢除，不僅意味着大地主與資本家的消滅，並且意味着小商品生產者的消滅。然而，後者不可能一掃而光，我們必須與他們和平相處，他們是可以（也必須）改造與再教育，這祇能通過長期的徐緩的與謹愼的組織工作，才能達到。……不幸得很，這種小生產制是會繼續不斷地產生資本主義與資產階級的。』（『左派幼稚病』）

第三，由於『事實上，在革命後的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剝削者不可避免地還具備着許多優越條件：他們還擁有貨幣（不可能一下子廢止貨幣的）與一部份貴重的動產；他們還有着各種行政上的智能，他們還受過優良的敎育，他們還與高級技術人才保持關係，他們更有無

比的戰爭技巧（這是非常重要的）。」（「無產階級革命」）

所以，列寧認爲在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以後，還要繼續進行階級鬥爭。他說：

「無產階級專政是一種最猛烈，最尖銳，最堅決的新的階級鬥爭，以它抗拒一個更強有力的敵人——抗拒資產階級，因爲他們的拒抗力，比垮台前更增強了十倍，這個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一個持續的鬥爭——流血的或不流血的，暴力的或和平的，軍事的或經濟的，教育的或行政的鬥爭，以它來抗拒舊社會的力量與傳統。」（「左派幼稚病」）

無疑地，這決不是一個暫時的或短期的鬥爭。列寧是把這個時期——無產階級專政時期，當作一個歷史階段的。在這個階段內，不僅要建立一個走向共產主義社會的物質與文化基礎，並且要把成千萬的農民與小資產階級都團結在無產階級的政權下面。他這樣說過：

「在無產階級專政之下，我們要再教育成千萬的農民與小資產階級，以及成百萬的薪水階級、公務員與小資產知識份子，使他們都服從無產階級政府與無產階級的領導，並且要征服他們的布爾喬亞習氣與傳統。」（「左派幼稚病」）

以上各點，就是列寧把無產階級專政看作無產階級革命的主要武器的基本根據。但通過

什麽方式，才能使無產階級完成革命呢？換言之，究竟用和平的方式還是用暴力的方式呢？

列寧告訴我們：

『不用暴力破壞布爾喬亞的國家機構而代以一個新的機構，是不可能有無產階級革命的。』

（『無產階級革命』）

在這兒，列寧雖主張用『暴力』，但他的重點，顯然放在『破壞布爾喬亞的國家機構』上。他的暴力論，是從他的國家觀出發的。前面說過，他把軍隊、警察等武力看成布爾喬亞統治階級的剝削工具，如果要摧毀這種工具，如果要破壞這種工具保護下的布爾喬亞國家機構，當然是需要暴力的。所以，列寧祇把暴力看作無產階級革命的『必要』手段，並沒有把暴力當成無產階級革命的『唯一』手段。不過，他始終認爲『破壞布爾喬亞的國家機構』是達到無產階級專政的『唯一』前提。也就是說，如果不用『暴力』，而能破壞『布爾喬亞的國家機構』，那也未嘗不能達到無產階級專政。這一點，在認識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時，是非常要緊的。列寧之後，斯大林曾予引申，他說：『當然，在很遠的將來，倘使無產階級在最重要的資本主義國家取得了勝利，倘使現在資本主義的封鎖讓位於社會主義的封鎖，那

末，在某些資本主義國家內，一種「和平」的發展，是相當可能的。因爲這些資本主義國家裏的資本家，看到了「不利」的國際形勢，他們就會考慮到「自動地」向無產階級讓步的。但是，這種假定，祇指很遠的與可能的將來，絕不指最近的將來。」（「列寧主義研究」第三集）

其次，列寧又說「破壞布爾喬亞的國家機構」以後，要「代以一個新的機構」。這就是說，在無產階級專政期內，舊的布爾喬亞國家機構破壞後，還得建立一個新的無產階級國家機構，這個新國家機構，列寧稱爲蘇維埃。他說：

「祇有蘇維埃國家組織才能一下子破壞舊的，即布爾喬亞的行政司法機構。」（「列寧全集」二十四卷）

所以，無產階級專政就指一種新的無產階級的國家形態。而蘇維埃就是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國家形態。在這個國家形態裏，還存在着階級與階級鬭爭，因爲它是從資本主義社會到共產主義社會的過渡時期，祇有當一個蘇維埃國家完全進入了共產主義社會以後，階級、階級鬭爭與國家形態才會完全消滅。列寧曾這樣說：

「國家的消滅，一定要等到沒有了任何資本家，沒有了任何階級……爲了國家的完全消滅，百分之百的共產主義是必要的。……國家愈民主，它也愈加變得不必要，……祇有共產主義才能給予我們一個眞正的完全的民主。國家愈變得民主，它也愈加變得不必要而終於衰亡。」（「國家與革命」）

上述這些，就是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它是列寧全套革命思想的精華。所以斯大林稱「無產階級專政論爲列寧主義的核心」。（「列寧主義問題」）

三　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與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

「思想是時代的反映」，列寧生長在帝國主義時代，他的無產階級革命論就是帝國主義時代的反映。他認爲帝國主義一方面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或最後階段；另方面又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前夜。」（「帝國主義論序言」）他給我們指出了帝國主義的五大特徵：

（一）生產與資本集中，建立了獨佔資本；

（二）金融資本與工業資本的合倂，在金融資本上建立了金融寡頭；

(三)資本輸出；

(四)資本主義的國際獨佔；

(五)列强瓜分全世界。

帝國主義旣具備了這些特徵，它就必然會引起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因爲——

第一，『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金融資本的獨霸，……股票與債券的發行……資本的輸出，……金融寡頭的萬能，……所有這些，都暴露了獨佔資本主義的寄生性，它使資本主義托辣斯與新迭克(Syndicate)臃腫了一百倍，它增加勞動階級抗拒資本主義制度的激憤，它把廣大羣衆驅向無產階級革命，覺得這是他們唯一的出路。』(『帝國主義論』)

第二，『資本輸出到殖民地與屬國。……「勢力範圍」的擴張……把資本主義變成了金融奴役與殖民剝削的世界制度，……這些因素，……把全世界人口分裂爲兩大營壘：極少數「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它們搾取與剝削廣大殖民地與屬國；與極多數的殖民地與屬國，它們被迫而鬪爭，要把自已從帝國主義的覊絆中解放出來。』(『帝國主義論』)

第三，『勢力範圍與殖民地的獨佔，各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平衡發展，……帝國主義戰爭

……所有這些，都將削弱帝國主義……而加强革命無產階級與殖民地解放的統一戰綫。」（「帝國主義論」）

這三個因素——國內革命無產階級的强大，殖民地解放運動的高漲與帝國主義互相矛盾的尖銳——結合攏來，列寧認爲它將無可避免地導致社會革命（祇是時間的遲早問題），所以，他稱帝國主義爲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前夜！

總之，列寧把帝國主義看成資本主義的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它是一種獨佔的資本主義，寄生的資本主義與垂死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獨佔性、寄生性與垂死性，使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物質前提更形成熟了。它的本身，充滿了政治危機與經濟危機。這個危機，就孕育了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必然勝利。

第五節　列寧主義的革命價值

上面兩節，我們敍述了列寧主義哲學基礎與政治經濟學說，在本質上，它與馬克思主義是完全一致的，它是馬克思主義的引申與擴大。它把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一個更高的階段，前

而我們已經提到：馬克思把社會主義從烏托邦的空想變成一種科學的眞理，列寧又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眞理化爲革命的實踐。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與列寧主義的革命性，就像一雙歷史的巨輪，把人類推向社會主義最高理想境界裏去。這當然並不是說，馬克思主義祇有科學性而無革命性，也不是說列寧主義祇有革命性而無科學性。因爲科學性與革命性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既爲人類歷史走向新社會的雙輪，當然是缺一不可的了。唯其因爲馬克思主義是一種科學的眞理，它才可能化爲革命的實踐。也唯其因爲列寧主義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我們才能找得出它的科學根據來。同時，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代表着兩個時代，馬克思主義產生於前帝國主義時代，列寧主義則產生於帝國主義時代。而社會主義革命一定要到帝國主義時代，才進入成熟時期。馬克思生長在前帝國主義時代，他看到了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與無產階級力量的日益強大。所以，根據科學的分析，預言了資本主義的必然死亡與無產階級革命的必然勝利。而列寧則生長在帝國主義時代，他才能把社會主義科學眞理——馬克思主義，化爲革命的實踐。我們所以稱「列寧主義爲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原因在此。如果從社會主義的思想發展全程來看，馬克

思主義祇是列寧主義的『開來』，列寧主義則爲馬克思主義的『繼往』，它們是一脈相承的。我們實應把兩者倂稱爲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Marxism-Leninism)，或簡稱爲馬、列主義。

由此可知，列寧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實踐。前面說過：離開了馬克思主義，任何社會主義的思想，不是一種『空想』，就是一種『妄想』；不是『無知的幼稚』，就是『故意的歪曲』；同樣地，離開了列寧主義，任何社會革命運動，不是一種『衝動』，就是一種『妄動』；不是『左傾的幼稚』，就是『右傾的投機』。列寧主義的最大革命價值，就在於能把社會革命導向勝利——並且是必然的勝利！俄國十月革命的偉大勝利，就是列寧主義革命價值的最具體的說明了！

結語

現在，我們對於社會主義的思想發展，可有一個輪廓的認識了。大體說來，在「共產黨宣言」（一八四八年）以前的社會主義思想，我們統稱爲空想的社會主義或烏托邦主義；在「共產黨宣言」發表以後，社會主義才發展爲一種科學，我們稱它爲科學的社會主義或馬克思主義，它是社會主義思想的正統。從十九世紀九十年代起，產生了各種修正的社會主義思想，它包括了費邊主義、社會民主主義、柏斯泰因主義、考茨基主義、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與基爾特社會主義，我們泛稱爲改良主義。俄國十月革命以來，則產生了列寧主義，它一方面承繼與發揚了馬克思主義，另方面又給改良主義一個總的清算。

這就是社會主義思想的幾個發展階段。當然，我這樣劃分，並不是把各個階段，一刀切爲兩段。我主要是從它的時代背景，說明在某一歷史階段裏，有着那一種社會主義思想取得主導的地位。如在「共產黨宣言」發表以前，烏托邦主義是社會主義思想的主流，而在

「共產黨宣言」發表以後，馬克思主義就取而代之了。儘管五十年代以後，還有人高唱烏托邦主義，如美國的貝拉梅（Edward Bellamy，一八五〇——一八九八年）、意大利的赫茨卡(Theodor Hertzka)與英國的威爾斯（H. G. Wells）等，但他們的實際影響是不足重視的。

其次，我將社會主義思想分爲烏托邦主義、馬克思主義與改良主義，這也並不是說，這三者已經包括一切社會主義思想了。我主要是把它們當作三大派系，至於其他各種派系的社會主義思想，一則因爲限於篇幅，我無法一一詳爲介紹，二來這些「支派」的許多見解，也都是出自「三大派系」的。辨清了「三大派系」，也一定可以找到「支派」的淵源。舉幾個例吧，像英國摩里斯（F. D. Maurice，一八〇五——一八七二年）與金斯萊（Charles Kingsley，一八一九——一八七五年）所領導的基督教社會主義（Christian Socialism），無非是宗教的烏托邦主義與政治的烏托邦主義的混合；像德國華格納（Adolph Wagner）與希莫勒(Gustav Schmoller)等所領導的「講壇社會主義」(Katheder Sozialism)，無非是社會民主主義的別名；像孫中山先生所主張的民生主義，無非是一種接近費邊主義與柏斯泰因主義的社會主義。再像托洛斯基（Leon Trotsky，一八七九——一九四〇年）所創導的「世界革命

論」，也祇是一種左傾冒險主義（或左傾改良主義）而已。

最後，我們要問：社會主義發展到今天，究竟是那一種思想站在領導地位呢？前面我們再三指出：馬克思主義是社會主義的科學眞理，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我們今天正處於帝國主義與無產階級革命時代，因而，馬、列主義是我們這個時代社會主義的唯一的科學眞理，這是無可置疑的了（也因此，我特地把列寧主義另立爲一章）。儘管各種修正的社會主義思想，現在還頗盛行，但「時間是最大的考驗」，它們遲早會像烏托邦思想那樣被時代所淘汰的。從世界大勢來看，馬、列主義與改良主義的思想鬭爭，還得經過一個時期。「眞理永存」，我願用這句話，作爲全書的總結。同時，這一句話，也可指明社會主義思潮的總趨勢！